

目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I
中文文摘.....	V
目录.....	IX
绪论.....	- 1 -
第一章 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概况.....	- 9 -
第一节 闽东地区历代方志修编概况.....	- 9 -
第二节 闽东地区修志兴盛的原因探析.....	- 19 -
第二章 闽东地区特色方志评述.....	- 25 -
第一节 详核赅善的《福宁府志》.....	- 25 -
第二节 独具特色的《寿宁待志》.....	- 30 -
第三节 甘棠堡历史的活化石——《甘棠堡琐志》.....	- 37 -
第三章 闽东地区旧方志的特点.....	- 43 -
第一节 时代特点.....	- 43 -
第二节 地域特点.....	- 46 -
第三节 纂修者个人特点.....	- 49 -
第四节 方志演变特点.....	- 50 -
第四章 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文献价值及评价.....	- 53 -
第一节 正确认识史、志关系.....	- 53 -
第二节 闽东地区旧方志的价值.....	- 55 -
结论.....	- 69 -
附录1 闽东地区现存旧方志目录提要.....	- 71 -
参考文献.....	- 87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97 -
致 谢.....	- 99 -
个人简历.....	- 101 -

绪论

方志，在《辞海》中解释为：“记述一方事物的志书。‘方’或指先秦一个邦国，或指秦汉以后一个政区，或指一地区；‘志’通‘识’、‘誌’，即记述。”^[1]而2005年5月国务院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是这样界定地方志书的：“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2]地方志滥觞于周秦时期，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地记、隋唐五代的图经，至宋代以降，融合图、志优势的方志逐渐形成了以文字记述为主要形式，以人物、文籍为主要内容的独特体裁，内容和体例也逐步固定下来，明、清两朝方志发展到极盛。现存的八千多种地方志，占我国现存古籍总数的1/10以上，同国史、谱牒一起镌刻着华夏历史演进的脉络。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方志，顾名思义，它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性著作，也就是前人所讲的“郡县之书”。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地方志作为地方文献的重要保存载体，囊括当地的档案、谱牒、传记、汇编等珍贵历史文献资料，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作用，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史料可以补充、校正史书典籍之不足，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地方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笔者田野调查所获数据统计，宁德现存地方志42部，其中，行政区划性质的方志共31部：明代方志10部、清代方志15部、民国方志6部。又有专志11部。闽东地区历史上不乏优秀的志书。有州府志，如闵文振纂嘉靖《福宁州志》、李拔纂乾隆《福宁府志》等；有县志，如张景祁纂光绪《福安县志》、冯梦龙纂《寿宁待志》等；有乡镇志，如陈一夔纂《甘棠堡琐志》等；有专志，如谢肇淛《长溪琐语》、《太姥山志》，刘家谋《鹤场漫志》等。闽东地区旧方志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具有很强的政治效用和经济效益，为我们研究地方的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对闽东

^[1] 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8月，第926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

地区旧方志的研究必将有益于弘扬闽东的优良传统，整合地区资源优势，必将助力于闽东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近年来，随着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对解决“中国礼仪之争”、“清代教案”、“三都澳历史”、“廊桥古建筑”、“倭寇”、“海防”、“甘棠港”、“畬族”等学术问题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促进作用，其功用不可忽视。然而，目前，闽东地区利用方志本身进行纯粹研究的较少，一般还限于利用旧方志进行专题研究的阶段，并没有任何专著对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总体状况做过梳理，甚至连个案研究也寥若星辰，本文试图以闽东地区为研究区域，对闽东旧方志的存佚、版本、特色、价值、利用等情况做一次有效的梳理和探索，一则使那些被人们遗忘的旧志走出历史的故纸堆，走进学人的研究视野；二则充分挖掘旧志“存史、资政、教化”的功用价值，对其进行评判推介，以期引起人们重视，为闽东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二、闽东地区旧方志研究综述

闽东地区即今宁德市所辖的行政区域，含蕉城区，福安、福鼎二个县级市和霞浦、柘荣、寿宁、古田、屏南、周宁六县。闽东地区界闽浙之交，山雄水秀，人杰地灵，素有“海滨邹鲁”之称。尽管，受崇山阻隔，陆路交通极为不便，经济亦不甚发达，却有着优良的修志传统。闽东的修志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如：北宋《长溪县记》、南宋《韩阳志》等，这些旧方志由于年代久远，均已佚失。现存最早的全地区性方志是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知州谢廷举主修的《福宁州志》，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笔者田野调查所获数据统计，闽东地区现存旧方志42种，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其中蕴藏着闽东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自然等各方面丰富的资料，是研究闽东历史宝贵的地情资料库。正是鉴于此，闽东地区自建国初期就着手整理、研究和利用地方志。

（一）、闽东地区方志整理、点校情况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0年以前。建国初期，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受当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地方志整理、研究、利用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成果不多。仅六十年代福安县政协文史委组织用白话文翻译《福安县志》一部，然并未正式印刷出版。改革开放后，1979年始有福安县文化馆组织油印并在县内发行《福安乡土志》一部。这还应包括上世纪80年代初宁德地区文化局艺术科陈煜奎先生据日本拍摄回来的缩微胶卷校点，1983年6月由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寿宁待志》铅印本。这个阶段地方志价值意义还不为社会所普遍认同，读志用志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整理点校工作主要由地方政协文史部门和地方文化部门承担。

第二阶段：1981年到1999年。1981年4月，宁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全国修志机构相继成立的浪潮中应运而生，是闽东地区最早设立的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为工作机构，开始抽调人员着手点校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刊本《宁德县志》，1983年内部刊行。到2000年首轮修志基本结束时，闽东地区先后点校旧志13部：清光绪十年版《福宁府志》、清光绪十年版《福安县志》、民国十八年版《霞浦县志》、清乾隆十六年版《古田县志》、乾隆五年版《屏南县志》（油印本）、清光绪三十四年版《屏南县志》、清康熙二十五年版《寿宁县志》、民国二十七年编《周墩区志》、辑录民国霞浦县志有关柘荣内容点校的《柘洋方志》、清嘉庆十一年版《福鼎县志》、民国十六年刊本《甘棠堡琐志》、清康熙八年修《宁德支提山图志》等，这13部志书均为内部刊行。除民国《屏南县志》和《甘棠堡琐志》为油印本外，其他均为铅印本。这一阶段对旧志的整理点校均系专门修志机构（《甘棠堡琐志》亦为福安市甘棠镇志编委会组织点校印行）有组织地进行，版式除乾隆《宁德县志》和民国《屏南县志》为十六开本，《周墩区志》、《寿宁县志》为三十二开本外，其余均为大三十二开本。内文一律简体横排。这一时期所校旧志因为专门机构刚设立，点校人员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所参照、依据的版本有限，所以点校中尚存在一些失误和不足之处。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即首轮修志结束后。新方志出版发行后志书逐渐普及，读志用志之风兴起，社会对整理点校出版珍稀旧志呼声强烈。这一期间，明万历《福安县志》，共印行了三个版本，其中两个版本为内部印行，一个版本列入“福建旧方志丛书”，2009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万历《古田县志》校点后列入福建文史丛书《万历福州府属县志》（含永福县志、罗源县志、古田县志），2007年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周瑞光先生校点的民国卓剑舟等编《太姥山志》一书，以明万历年间的《福安县志》为校点的底本；周瑞光点校的民国《太姥山全志》及缪品枚点校的明谢肇淛《长溪琐语》、毛万汇《韩阳拙令》、清杜臻《粤闽巡视录》、刘家谋《鹤场漫志》合称《太姥山全志（外四种）》，列入“文史全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寿宁县委宣传部组织陈元度注释的《寿宁待志注译》本，2009年9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由蕉城区李怀先点校的乾隆《宁德县志》也于2009年重新点

校完成，现正在组织出版之中。这一时期点校本多由市、县方志、文化部门组织，省相应部门统一审稿，并组织正式出版，版式相应统一为三十二开，简体横排，点校本质量相应高些。

(二)、闽东地区研究、利用地方志的成果。改革开放前，志书并不普及，读志用志限于政府文化部门和政协文史部门少数文史工作者，真正有计划目的的整理应用旧志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地县两级地方志编纂机构的普遍设立，“盛世修志”，整理点校旧方志、挖掘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成为地方党、政部门的共识，地方志的整理点校与研究利用工作逐渐受到地方的关注和重视，宁德市、县政协文史资料、《闽东报》、《宁德晚报》、《宁德侨乡报》副刊，《闽东通讯》、《三都港论丛》等成为了发表研究文章的平台。闽东地区文史专家、学者，特别是缪品枚、林校生、施景西、李怀先、周瑞光、汤鸣统、李健民、罗承晋等先生，先后在刊物上发表了相当数量具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文章和专著，逐渐形成了一支各具擅长领域的地方文史专家群。

1、地方书刊上登载地情文章概况：上世纪80年代以来，闽东地区发表的与旧志有关的文章有两千多篇。其中宁德市（地区）、县政协文史委编的文史资料是刊载与旧志有关文章的最大平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宁德市、县（市、区）两级共编辑“文史资料”150多集，收入文章3000多篇，其中有将近1000篇涉及到使用 and 引用旧志资料。《闽东日报》、《宁德晚报》、《宁德侨乡》、《宁德通讯》、《三都港论丛》刊登使用旧志资料文献1000多篇，各县及乡镇内部刊物（如《霍童文史》等）亦有数百篇。这些文章涉及地域环境资源分析、建置沿革、自然灾害、名胜古迹、城乡建设、文化教育、军事民政、工商旅游、宗教民族、民间信仰、科举人物等方方面面。

2、依据地方志写成的地情专著：地情专著有单位组织编写和文史专家个人专著两类。（1）单位组织编写的。首先是宁德市、县（市、区）两级政协文史委编写的文史资料专集。有福安市政协文史资料中的：《廉村》、《谢翱研究》、《刘忠藻》、《白云山》、《畚族》专集；蕉城区文史资料中的《支提山》、《三都澳》、《南漈山》专集；福鼎文史资料中的《旅游》专集；寿宁文史资料中的《冯梦龙》专集；宁德市文史资料中的《闽东古镇》、《宁台文化》、《闽东名人故居》、《闽东历史名人》、《闽东虹桥实录》、《闽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不完全统计有30多集。其次是市、县（市、区）宣传文化部门组织编写的地情专著。如宁德市（地区）宣传文化部门编的《宁

德》、《闽东风物志》、《闽东史话》、《闽东茶叶》；宁德市（地区）台办编的《寻根览胜话宁德》；宁德市（地区）古文明研究会编的宁德文明之光丛书：《宁德史话》、《宁德人物》、《宁德风情》、《宁德诗文》、《宁德霍山》、《宁德文物》；宁德市（地区）闽学会编的《朱子学刊-闽东朱子理学研讨会专辑》；宁德市（地区）抢救与发展畲族文化领导小组组织编写的《畲族民间信仰》、《畲族谱牒》、《畲族乡村》、《畲族文物》；宁德市（地区）地名办组织编写的《宁德地名故事》一、二集；蕉城区（原宁德市）方志委组织编写内部印行的《宁德县志故事》（第一集）、《宁德支提寺志选》；屏南县甘国宝研究院会编的《清代成台名将甘国宝》；霞浦县空海研究会编的《空海研究论文集》等，共约 30 多部。（2）个人专著。原宁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凌著有冯梦龙研究专集《七品芝麻官》、《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周瑞光著有《摩宵浪语》、《太姥传音——闽浙边历史文化丛谈》，主要立足福鼎，兼写闽浙文化的渊源与互动，交流与影响，另有《太姥诗文集》，主要从《太姥山志》、《太姥指掌》诸志中辑录诗文，分类汇编，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福鼎历史文化。宁德市方志委缪品枚著有《长溪钩沉》，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再现闽东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情况。福安市李健民的《长溪入海流》重点介绍福安地方传统文化。霞浦县方志委汤鸣统的《冬果集》亦为地方文史专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曾任宁德地委书记的陈增光所著《超越贫困》引用大量旧志资料分析了导致宁德地区贫困现状的历史原因，并指出宁德走跨越式发展道路的对策，应为读志用志高瞻远瞩之类。

3、研究专题与成果：研究专题主要集中在地理环境、经济物产、名胜遗迹、民族宗教、历史人物、政治事件上，尤其是霍童山、支提寺、太姥山、三都澳海关、畲族、倭患海禁、赤岸空海、廉村、甘棠港、茶叶、廊桥、谢翱、冯梦龙、甘国宝、朱熹、薛令之、陈普、陆游、戚继光、林聪、张以宁、陈靖姑这几个专题做得比较深入。

综上所述，闽东地区在旧方志的整理、点校和利用旧方志史料进行专题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遗憾的是，并没有学者对整个闽东地区的旧方志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也就是说微观方面的研究颇多，宏观方面的研究不足。因此，本文将从宏观角度对闽东地区旧方志加以考量，并甄选具有代表性的方志进行个案研究，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很好的结合起来，展现闽东地区旧方志之全貌。成文后，将形成一份比较全面、比较完整也便于研究的方志目录提要。

三、基本史料

经过广泛搜罗,本文的基本史料涵盖三个部分:一是闽东地区现存的 42 部志书,即嘉靖《福宁州志》十二卷<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刊本>、万历《福宁州志》十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刻本>、万历《福宁州志》十六卷<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刊本>、乾隆《福宁府志》四十四卷<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嘉靖《宁德县志》四卷<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刻本>、万历《宁德县志》八卷<明万历十九年(1591 年)刊本>、乾隆《宁德县志》十卷<清乾隆四十六(1781 年)刊本>、万历《福安县志》九卷<明万历二十五(1597 年)刻本>、崇祯《福安县志》九卷<崇祯年间版>、康熙《福安县志》九卷、乾隆《福安县志》三十卷、乾隆《福安县志》二十六卷<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刊本>、道光《福安县志》十二卷<清道光十二年(1832 年)刻本>、光绪《福安县志》<清光绪十年(1884 年)版>、光绪《福安县乡土志》二卷<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京师京华书局排印本>、万历《古田县志》十二卷<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刊本>、崇祯《玉田识略》八卷<明崇祯刻本>、乾隆《古田县志》八卷<清乾隆十六年(1751 年)刊本>、光绪《古田乡土志略》不分卷<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排印本>、民国《古田县志》三十八卷<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震文江记印务局排印本>、民国《霞浦县志》四十卷<民国十八年(1929 年)排印本>、嘉庆《福鼎县志》八卷<清嘉庆十一年(1806 年)刊本>、乾隆《屏南县志》八卷<清乾隆五年(1740 年)刊本>、道光《屏南县志》六卷<清道光九年(1829 年)稿本>、光绪《屏南县志》十卷<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抄本>、民国《屏南县志》三十一卷<民国三十年(1941 年)稿本>、崇祯《寿宁待志》二卷<明崇祯十年(1637 年)刊本>、康熙《寿宁县志》八卷<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刊本>、民国《周墩区志》六卷<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排印本>、民国《甘棠堡琐志》二卷<民国十六年(1927 年)刊本>、万历《长溪琐语》一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福建龚氏大通楼抄本>、道光《鹤场漫志》二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刻本>、万历《支提寺志》六卷<清同治十一年(1873 年)刊本>、《支提寺志》六卷<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汪大润等刊本>、《支提寺山志》六卷<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刊本>、《太姥山志》一卷、《太姥山志》三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刊本>、《太姥山续志》三卷<清光绪江本侃抄本二册>、《太姥山指掌》一卷<清光绪江本侃抄本>、《游太姥山图咏》<清道光十三年(1833 年)同安林树海

刊本》、卓剑舟《太姥山全志》十八卷以及这些线装方志的点校本,如:清乾隆四十六年刊《宁德县志》、光绪十年刊《福宁府志》、清光绪十年版《福安县志》、民国十八年版《霞浦县志》、清乾隆十六年版《古田县志》、清光绪三十四年版《屏南县志》、乾隆五年版《屏南县志》(油印本)、清康熙二十五年版《寿宁县志》、民国二十七年编《周墩区志》、辑录民国霞浦县志有关柘荣内容点校的《柘洋方志》、清嘉庆十一年版《福鼎县志》、民国十六年刊本《甘棠堡琐志》、清康熙八年修《宁德支提山图志》。二是地方志的工具书和方志学著作,工具书如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文献书目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上海古籍书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殷梦霞《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续编》、金恩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孙学雷《地方志·书目文献丛刊》、清华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王德毅《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福建省天象资料组《福建省地方志普查综目》、福建师范大学古籍组《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方宝川,陈旭东《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福建省文史研究馆整理《万历福州府属县志》;方志学著作如郭天沅的《闽志谈概》、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来新夏的《方志学概论》、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黄苇的《方志学》等等。三是地方志研究的论文,如职方氏的《东南方志经眼录》(东南,1943年1月第1卷第1期);来新夏的《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1期);巴兆祥的《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林衍经的《再论地方志的兴利功能》(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6期)等等。

四、研究对象及范围的界定

在本文写作之前,有必要对研究对象及范围做一明确界定。我国的方志有新志和旧志之分,所谓新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修方志,所谓旧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历代所修方志,本文研究对象为闽东地区旧方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闽东地区历代所修方志;本文的研究范围为狭义的闽东地区,广义的闽东指福建东部地区,包括福州、宁德两市。狭义的闽东地区是现福建省宁德市的俗称,本文研究的范围为狭义的闽东地区,即1998年撤地建市后现宁德市所辖的行政区域。

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凡阅志书一千余部”，写就名闻遐迩的《天下郡国利弊书》，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利用旧志材料，撰成了著名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可见旧方志研究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定能有所作为。笔者智钝才拙，不敢自比顾、竺二位大学者，然亦期以绵薄之力，为方兴未艾的闽东旧方志研究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文稿初成，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章 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概况

闽东地区即今宁德市所辖的行政区域，含蕉城区，福安、福鼎二个县级市和霞浦、柘荣、寿宁、古田、屏南、周宁六县。闽东地区界闽浙之交，山雄水秀，人杰地灵，素有“海滨邹鲁”之称。尽管受崇山阻隔，陆路交通极为不便，经济亦不甚发达，但是，早在北宋圣绍年间(1094~1097年)闽东地区就开始编修地方志，此后一直延续着优良的修志传统。本章主要介绍闽东地区的历史沿革、历代旧方志编修的概况及闽东地区修志兴盛的原因。

第一节 闽东地区历代方志修编概况

闽东是福建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宁德霍童镇的两岸早在一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商周时期，闽东地区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集镇。晋朝年间随着八姓入闽，大大增加了闽东的人口，同时带来了中原先进技术与文化，极大的促进了闽东地区的开发。闽东地区优良的修志传统与其优良的地理位置、丰足的经济状况、昌盛的文化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闽东地区概况简介

早在新石器时期，闽东境内就有古越先人繁衍生息的踪迹。先秦为闽越族驻地，周为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后属会稽郡。三国时期，东吴在境内的三沙湾内设立“温麻船屯”，掌建造海船。晋太康三年(282年)以“温麻船屯”地分设温麻县，辖境包括今宁德市的大部和政和、连江、罗源等县地。唐武德六年(623年)以温麻废县设长溪县，属泉州(州治今福州)；唐开成年间(836—840年)增设感德场。五代唐长兴四年(933年)升为宁德县，取宁川、感德场各一字，名为宁德县，此即“宁德”地名之由来。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升长溪县为福宁州，辖福安、宁德2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福宁州为福宁府，并就府治设霞浦县，同年增加建宁府的寿宁县。乾隆四年(1739年)增设福鼎县，计辖霞浦、福安、宁德、福鼎、寿宁5县。1935年所设周墩、柘洋2特区，1945年改为周宁、柘荣县。

闽东地区经济不甚发达，财政收入长期居于全省末位。不少人认为闽东乃“穷山恶水”之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文化凋敝，不能与闽南、闽中之兴盛相提并

论。其实不然，闽东地区是福建开发较早的地区，据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记载，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就在宁德三沙湾设立“温麻船屯”。闽东的“支提茶”、“坦洋工夫”等茶叶贸易在明清即蜚声海内外。在解放初的土改期间，仅福安坦洋一村就评出 72 户地主，足见其经济之盛。从地理位置上看，“福宁界闽浙之交，大海环其南，群山拱其北，东西横亘，藩围千里。”^[1]由于闽东三面环山，北有太姥山脉，西有洞宫山脉，南有鹞峰山脉，一面滨海，地理位置形成一个天然屏障将她阻隔在中原的政治风暴和血雨腥风之外，宛如一个世外桃源藏之于群山之中。历史上，从三国、隋唐至五代、南宋、南明期间都有大量中原人民至闽东造船、采药炼丹、躲避战乱等，进而居住下来，为闽东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闽王王审知疏凿甘棠港（今福安市下白石港）后，直至北宋期间闽东地区经济极其繁荣，以至“长溪椎务不劳而办”，海路畅通时闽东经济之可观于此可见。清代宁德训导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描绘宁邑兴盛景象曰：“宁之盛时，百货骈集。出镇静门外数里，两岸帆樯如织，酒楼、茶肆，雾属云连，故有‘小杭州’之目。其时家无甚富，亦无甚贫。人咸重廉耻，崇礼义，彬彬乎有上国之风。”^[2]这些都足以证明，闽东地区历史上就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没有纷扰的隐逸之所，无怪乎历史上有“一汴二杭三闽四广”之美誉。

闽东历代颇重教化，然科举及第不多。唐神龙二年（706 年）福安进士薛令之“破天荒”成为八闽第一进士。降至宋代，自南宋都城南迁和朱子莅闽东讲学后，闽东的书院教育和文化事业获得极大的发展，士风、学风鼎盛。南宋，都城南迁至浙江，闽东界闽浙之交，受到近距离的文化辐射作用，教育文化日趋兴盛。宋庆元间，朱子以伪学之禁被罢黜，应古田门人林用中之请至古田讲学，开八闽理学之先。在古田期间，朱子于古田蓝田书院等地讲学，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兴盛。后又讲学于长溪（含今福安、霞浦、福鼎）、宁德（今蕉城区）等地，足迹遍及闽东。朱子的闽东讲学对闽东文化、教育、士风、文风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后，闽东士人逐渐形成好学向上之学风，乾隆《福安县志》有一段关于士风的描写：“宸为朱子讲学之地，圣贤所过则化，故士多知读书求道。絃诵之声不独朱门也，即白屋绳枢，亦往往不绝。明知县孟充诗：‘醉踏甘棠桥上月，家家灯火夜攻书。’其风至今尤盛。”^[3]闽省科举历来无名，然而，自朱子讲学之后，宋代闽省科举居全国第一，闽东科

^[1] [清]李拔：《乾隆福宁府志》，曹绳柱序，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 1 页。

^[2] [清]刘家谋：《鹤场漫志》，卷上，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刻本，第 13 页。

^[3] [清]侯谨度修，陈从潮纂：《福安县志》，卷十一，风俗·士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刊本，第 2 页。

举及第人数突飞猛进,人才辈出,“迨宋迄明,理学、政事、文章,风节以科目显者,联袂接踵,烈烈煌煌,几与上国齿。”^[1]据缪品枚先生统计:“自唐神龙二年(706年)薛令之进士及第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林栋考中进士,在长达1197年的时间内,闽东共有507人考中文进士。”^[2]其中宋代进士高达422人,约占总数的83%。

二、闽东地区修志历史

尽管受崇山阻隔,陆路交通极为不便,经济亦不甚发达,闽东地区却有着优良的修志传统,其修志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长溪县令熊浚明组织编修《长溪县记》,南宋时期,福安曾编写《韩阳志》等,这几部志书由于年代久远,均已佚失。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是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福宁州知州谢廷举主修的《福宁州志》,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自宋代发轫以来,闽东地区方志编修出现过三次修志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明嘉靖年间,嘉靖十七年(1538年),福宁州首次系统地组织修志,至嘉靖二十七年,除纂成《福宁州志》(嘉靖十七年)12卷,还纂有《宁德县志》(嘉靖十七年)、《福安县志》(嘉靖十七年)、《寿宁县志》(嘉靖二十七年)3部县志;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万历年间,纂成《福宁州志》2部,《宁德县志》、《福安县志》、《古田县志》、《太姥山志》各1部;第三次高潮为清康熙、乾隆年间,这也是闽东地区历史上成书最多的一个时期,共编成《福宁府志》1部,《福安县志》3部,《宁德县志》2部、《古田县志》、《屏南县志》、《寿宁县志》各1部,以上几部,除崔嵒的《宁德县志》书稿无存,未刊行外,余下俱存。此外,现存的其他时段编修的志书有:明崇祯年间修《寿宁待志》、《福安县志》、《玉田识略》各1部,清嘉庆年间修《福鼎县志》1部,清道光年间修《福安县志》、《屏南县志》各1部,清光绪年间修《福安县志》、《屏南县志》、《福安县乡土志》、《古田县乡土志》各1部,民国时期修《古田县志》、《霞浦县志》、《周墩区志》、《福鼎县志》各1部。据统计,自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闽东首部志书起修至民国三十一年(1941年)最后一部旧志《古田县志》刊行,八百多年时间中,闽东地区共编修方志近70部,现存42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闽东宝贵的地情资料库。由于闽东地区历史上编

^[1]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十九,选举上,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第1页。

^[2] 缪品枚:《长溪钩沉》,《闽东进士趣谈》,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51页。

修的志书版本繁多、或存或佚，为更直观地展现历史上闽东志书编撰情况，笔者特绘制《闽东地区历代志书编纂情况简表》，具体如下。

附表 1：闽东地区历代志书编纂情况简表

志书	编纂起止时间	版本	卷数	主修	主纂	保存情况
州府志						
秦川志	北宋绍圣年间 (1094-1098 年)					佚
秦溪志						佚
福宁志	永乐十六年(1418 年) 明正统十年(1445 年)		5		郑 宪	佚，仅存序
福宁州志	明成化十一年(1475 年)		4	刘 象	邱秉中	佚
福宁州志	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	明嘉靖十七年 (1538 年)刊本	12	谢廷举	陈应宾 闵文振	宁波天一阁文物保管 所 9 卷；中共科学院图 书馆藏刻本 7 卷
福宁府志 续略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		18		释如一	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 书馆
福宁州志	明隆庆元年(1567 年) 明隆庆二年(1568 年)		12	黄希宪 李 纪	盛 继	佚
福宁州志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	明万历二十一 年(1593 年)刻 本	10	史起钦	林子燮	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 内阁文库、中国社科院 历史研究所各藏刻本 1 部
福宁州志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	明万历四十四 年(1616 年)刊 本	16	殷之谔	朱 梅	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刻本 上海、北京、福建和福建 师范大学等图书馆藏残本 (10~11 卷)
福宁府志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	清乾隆二十七 年(1762 年)刊 本	44	朱 珪	李 拔	故宫博物院明清部、南京 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 等存有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年)刊本
县志						
长溪县记	北宋绍圣间(1094-1098 年)			熊浚明		佚
宁德县志	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	明嘉靖十七年 (1538 年)刻本	4		闵文振	浙江天一阁存明嘉靖十七 年(1538 年)刻本。

第一章 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概况

志书	编纂起止时间	版本	卷数	主修	主纂	保存情况
宁德县志	万历十八年(1590年) 万历十九年(1591年)	明万历十九年 (1591年)刻本	8	舒应元	陈 琯	残卷存于蕉城区档案馆
宁德县志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				崔 崧 黄中美	书稿无存, 未刊行
宁德县志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清乾隆四十六 (1781年)刊本	10	卢建其	张君宾 胡家琪	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清乾隆四十六(1781)刊本
韩阳志	宋淳祐五年(1245年)					佚
福安县志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					佚
福安县志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明万历二十五 (1597年)刻本	9	陆以载	陈世理	藏日本前育德会尊经阁文库
福安县志	明崇祯年间		9	巫三祝	陈晓梧	北京图书馆存2部
福安县志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		9	宋嗣炎	李襄猷	藏于北京市图书馆
福安县志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30	程志洛	张伯漠	未刊行, 抄本留存福安县方志委员
福安县志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清乾隆四十八 年(1783年)刻 本	26	侯谨度	陈从潮	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均有藏本
福安县志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	清道光十二年 (1832年)刻本	12	刘之葛	陈拔、杨 进才	福建省图书馆、师大图书馆均有藏书
福安县志	清光绪八年(1882年)	清光绪十年 (1884年)版	38	张景祈	张景祈	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均有藏书
福安县乡土志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师京华书局排印本	2		周祖颐	京师京华书局排印 北京大学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均有存书
古田县志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修 万历三十年(1602年)续修	万历四十三年 (1615年)刊本	12	刘日旸 王继祀	李元若等 祝尧年等	藏于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玉田识略	明崇祯六年(1633年)	明崇祯刻本	8		杨德周	福建省图书馆存胶卷, 福建师大图书馆存7-8 残卷

志书	编纂起止时间	版本	卷数	主修	主纂	保存情况
古田县志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刊本	8	辛竞可	林咸吉 蓝孙璇	福建师大藏有台湾的缩印本、福建省图书馆藏有木刻版本
古田县乡土志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排印本			曾光禧	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均藏有木刻版本
古田县志	民国九年(1920年)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民国三十一年震文江记印务局排印本	38	陈元璋 黄澄渊	余钟英	藏于古田县档案馆、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图书馆
霞浦县志	民国六年(1917年) 民国十六年(1927年)	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40	罗汝泽 刘以藏	徐友梧	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藏有民国十八年排印本
福鼎县志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刊本	8	谭 抡	王锡龄 高 昊	南京图书馆存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刊本
福鼎县志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4		黄鼎翰	
福鼎县乡土志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刊本			黄鼎翰	
福鼎县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高 穰	周梦虞	残本存于上海图书馆
屏南县志	清乾隆五年(1740年)	清乾隆五年(1740年)刊本	8	沈 钟	沈 钟	故宫博物院明清部存清乾隆五年(1740年)刊本, 福建省图书馆存清乾隆十七年(1752)沈宗良增补刊本
屏南县志	清道光九年(1829年)	清道光九年(1829年)稿本	6	梅鼎臣	陈之驹	福建省图书馆存清道光九年(1829年)稿本六卷
屏南县志	清同治八年(1869年)			程廷耀		稿本半毁于火, 未刊印
屏南县志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抄本	10	江若干	黄学波	未刊印 故宫博物院明清部、屏南县档案馆藏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抄本
屏南县志	民国九年(1920年) 民国三十年(1941年)	民国三十年(1941年)稿本	31	何树德 陆章铨		未刊印 县档案馆存有手稿本

第一章 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概况

志书	编纂起止时间	版本	卷数	主修	主纂	保存情况
寿宁县志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			张鹤年		佚
寿宁县志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			戴 镗		佚
寿宁待志	明崇祯十年(1637年)	明崇祯十年 (1637年)刊本	2	冯梦龙		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寿宁县志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清康熙间刻本	8	赵廷玘	柳上芝	上海市、福建省、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有清康熙间刻本
周墩区志	民国六年(1917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排印本	6	郑谟光	陈赞勋	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市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排印本。
乡镇志						
霍童志		明万历年间			林示鉴	佚
莒洲乡志						佚
埔原乡志	元				尚炫辑 明林秀才 良璞续辑	佚
甘棠城志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刘廷赞	
甘棠堡琐志	民国十六年(1927年)	民国十六年 (1927年)刊本			陈一夔	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专志						
支提寺志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清同治十一年 (1872年)刊本	6		谢肇淛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支提寺志		清康熙三十三年汪大润等刊本	6		明陈希拯等撰 清释照微增补	北京市图书馆
支提寺山志	清康熙八年(1659年)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刻本	6	崔挺修	释济明增补	福建省图书馆 厦门大学图书馆
长溪琐语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民国二十二年 (1933年)福建 龚氏大通楼抄本	1		谢肇淛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存抄本

志书	编纂起止时间	版本	卷数	主修	主纂	保存情况
鹤场漫志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刻本	2		刘家谋	福建师范大学存抄本《芭川先生合集》
长溪土产录		明			丁桂	佚
福宁乡贤传	明弘治十年(1497年)				闵 鸷	佚
太姥山志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刊本	3		谢肇淛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存抄本《国家图书馆藏中华山水志丛刊》，山志卷，第33册。
太姥山续志	清光绪辛丑年(1901年)	清光绪江本侃抄本	3		王孙恭	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太姥山指掌	清乾隆甲子年(1792年)	清光绪江本侃抄本	1		邱古园	福建省图书馆
太姥山续志艺文选录					王孙恭辑 佚名选	福建省图书馆
游太姥山图咏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同安林树海刊本			林树梅	福建省图书馆
太姥山全志	民国31年(1942年)		18		卓剑舟	福建省图书馆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笔者田野调查所获数据统计，闽东地区现存 42 部志书。各类志书均齐备，现试从州府志、县志、乡镇志、专志四个方面来介绍。

1、闽东地区历代的州府志。州府志即以一府一州为记述范围的方志，州府志一般以知府为主修，并延请一般官吏、乡绅、地方文人等总纂其事。闽东地区历史上曾多次编修州府志，最早的州府志为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编修的《秦川志》和《秦溪志》，均已失传。明清两朝，在中央政府修志高潮的推动下，闽东地区州府志编修也大为兴盛。有明一代，闽东地区曾 7 修州府志，今仅存明嘉靖版、万历二十一年版、万历四十二年版。永乐十六年(1418年)，举人郑重纂修《福宁县志》(明洪武二年，福宁州降为县，故称福宁县)。是志于正统十年(1445年)，增补成《福宁志》5 卷，今已佚失。成化九年(1473年)，福宁县恢复州建制。成化十一年知州刘象主修《福宁州志》4 卷，今亦佚失。现存最早的一部是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知州谢

廷举主修的《福宁州志》，全志 12 卷，分元、亨、利、贞 4 集装订出版。隆庆元年(1567 年) 盛继编修《福宁州志》，版本已失，仅存盛继序。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知州史起钦，延邑绅林子燮等在嘉靖志和隆庆志基础上增补成《福宁州志》10 卷。万历四十四年，知州殷之辂主修，朱梅等纂修成《福宁州志》16 卷。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 升福宁州为府。分巡道朱珪修，知府李拔撰《福宁府志》44 卷，为清代闽东地区唯一的州府志，是志始修于乾隆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付梓，记载起于东汉末年孙吴置温麻船屯到清雍正十二年升州为府以来一千七百多年间福宁全郡的历史。

2、闽东地区历代县志。县志即以一县为记述范围的志书，现存的县志约占全国方志总数的 70%。闽东地区所辖的九县市，即蕉城区，福安、福鼎二个县级市和霞浦、柘荣、寿宁、古田、屏南、周宁六县，其中宁德、霞浦、福鼎、福安四县濒海，其余五县皆地处内陆。在闽东九个县市中，各县修志的多寡、良莠不一，修志达五次以上者，仅宁德、福安、古田三县，其中，尤以文风昌盛的福安最为频繁，约为十三次，最少的为柘荣县，1946 年立县之初，拔贡陈善臣曾主纂过《柘荣县志》，稿本已成，经费不足，未予付梓，后原稿遭焚毁。柘荣县也就成为闽东地区唯一一个志书无存的县，直至 1985 年，柘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从民国版《霞浦县志》中辑录史料，编成《柘洋方志》一部，才改变其没有方志的历史。鉴于其成书年代较晚，不将其列入本文研究范围之内。在修志的各县中，以周宁县为最少，仅于置县前编辑过一部《周墩区志》，为该县唯一一部志书。从时代来讲，宁德、霞浦、福安三县，宋代就草创志书，开邑志之先，如北宋的《长溪县记》，南宋的《韩阳志》，然均以失传。元代闽东地区的修志历史，在志书中仅有凤毛麟爪的记述。明清两朝是闽东地区修志最盛的时代，各县修志情况如下：宁德建县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历史上曾 7 修志乘，而刊行者有 3 部。现存嘉靖十七年(1538 年)，宁德训导闵文振主持编纂的《宁德县志》四卷；万历十九年(1591 年)，县令舒应元主修，邑人陈琯总纂的《宁德县志》八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知县卢建其主修，张君宾总纂《宁德县志》十卷。福安县为闽东地区修志最多的县分，自置县以来，共修志书 13 次，目前存志 8 部，约占闽东地区现存州府县志总数的 1/4。宋淳祐五年(1245 年) 福安建县后，曾编纂《韩阳志》一部，开邑内修志先河。最早以县志命名的为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 修《福安县志》，今已佚。此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万历十二年(1584 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和崇祯十五年(1642年)先后6次组织编修,今仅存陆以载主修、陈世理主纂(万历)《福安县志》九卷和巫三祝主修、陈晓梧主纂(崇祯)《福安县志》九卷,余俱亡佚不存。清代分别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道光十二年(1832年)、光绪八年(1882年)6次组织纂修《福安县志》,其中除乾隆四十五年知县萧绍所修不存外,余俱存,其中尤以光绪八年修(十年版)《福安县志》传本为多,另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周祖颐编《福安县乡土志》一部。古田县志编修始于明万历年间,由知县刘日旸首修《古田县志》十二卷,今存,明清两朝凡四修,今存明崇祯六年(1633年),县令杨德周编纂《玉田识略》八卷,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县令辛竟可总修《古田县志》八卷,另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县令曾光禧编《古田乡土志略》。霞浦历史上是温麻、长溪县治与福宁州治、府治所在,明清两朝凡6修志书,现存3部,均以州志命名。福鼎建县于乾隆四年(1739年),方志编修较晚,仅存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刊《福鼎县志》一部。屏南建县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明清两朝曾5修志乘,现存清乾隆五年(1740年)知县沈钟创修《屏南县志》八卷,道光八年(1828年)知县梅鼎臣主修《屏南县志》稿本六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知县江若干主修、黄学波纂《屏南县志》稿本十二卷。寿宁建县于明景泰六年(1455年),曾5修志书,仅存二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知县张鹤年首修县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知县戴镗重修;清康熙二十二年(1583年),知县毕九皋重修,后因毕九皋逝世,未能及时付印,均已失传。现存有崇祯十年(1637年)知县冯梦龙修的《寿宁待志》一部,存于日本尊经阁文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知县赵廷玠修《寿宁县志》一部。民国时期,闽东共修县志4部,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震文江记印务局排印本《古田县志》,民国十八(1929年)年铅印本《霞浦县志》、民国三十年(1941年)稿本《屏南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排印本《周墩区志》。

3、闽东地区历代乡镇志。乡镇志包括镇志、里志、场志等等,是以县以下行政单位为记述范围的方志。相对于州府县志来说,乡镇志的记述范围小,记述内容简略,但是乡镇志亦有其独到之处,即对乡镇这一行政区域的记载更为详尽,触角更加严密的涉及乡镇的方方面面,往往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闽东地区乡镇志编修并不频繁,仅有《甘棠城志》、《甘棠堡琐志》二部。其中《甘棠城志》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修纂,为甘棠镇第一部地方志,由甘棠廩生刘廷赞主纂,手抄本宣纸

书写，布封面，14开本，1990年6月在外塘首次发现残本。《甘棠堡琐志》为清甘棠例贡陈一夔主纂，民国十六年铅字刊印，分上、下册，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各藏1部。

4、闽东地区历代专、杂志。闽东现存有11部专、杂志。专志即专记某一项或主要是某一项内容的志书，还可以细分为寺庙、道观、山水、物产、风土、人物、艺文等，如《支提寺志》、《太姥山志》等。杂志一般为私人著书，在书中记述一地之舆地、政治、经济、民俗等情况，如谢肇淛《长溪琐语》，刘家谋《鹤场漫志》等。

在上述42部志书中，根据记载的地域范围和对象不同，可以分为州府志、县志、乡镇志、专（杂）志，其中州府志4部，县志26部，乡镇志1部。这31部志书根据成书时代的不同，可以分为明代方志、清代方志、民国方志，其中，明代方志10部，约占1/3，清代方志15部，约占1/2，民国方志6部，约占1/6（以上统计均不含专、杂志）。根据体例不同，可以分为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著述体、仿图经体、类书体、三宝物、四纲体、无纲多目体，有纲有目体等，其中以有纲有目体居多，如万历《宁德县志》、乾隆《福宁府志》等；也有无纲多目体，如明嘉靖《福宁州志》、明嘉靖《宁德县志》，乾隆《古田县志》等等，但是无纲多目体志书往往过于琐碎，为世人所诟病，明清志书较少采用；根据版本不同，可以分为手稿本、抄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手稿本，如梅鼎臣修《道光屏南县志》、何树德、陆章铨修《民国屏南县志》；抄本，如程志洛修《福安县志》、杨德周《玉田识略》；木刻本，如舒应元修《宁德县志》，刘之葛修《福安县志》；铅印本，如罗汝泽、刘以臧修《霞浦县志》等等，其中以木刻本居多；根据志书修纂群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官修和私修两类，自隋代禁止私人修志以来，官修志书在州府县志中基本处于一统天下的局面，具体到宁德亦是如此。在闽东地区现存的州府县志中，除了明崇祯间冯梦龙的《寿宁待志》带有私修色彩，《甘棠堡琐志》为民间组织编修之外，其余均为官修。而专志则多为私修，如谢肇淛的《长溪琐语》、《太姥山志》，刘家谋的《鹤场漫志》等等，可谓官修与私修交相辉映，相互补充。

第二节 闽东地区修志兴盛的原因探析

闽东地区方志编修自北宋圣绍年间（1094~1097年）首修至民国三十一年（1941

年)闽东最晚的一部旧志《古田县志》刊行,八百多年间,不论朝代更替、社会变迁,修志活动从未中断。这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全社会对于地方志功能的认同、宗族观念的牵引、地方士绅的参与是分不开的。

一、明清《一统志》的编修对闽东地区方志编纂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记载全国舆地的总志,《一统志》首现于元。明清两代,《一统志》编纂进入兴盛时期。立国之初,明太祖就倡导编修《一统志》,并多次督令各地纂修志书上报。洪武三年,修成《大明志》;迨至永乐年间,朝廷两次颁降修志凡例,令各地遵行。降至清代,地方志编修承续明代时期的繁荣景象,成为清政府巩固统治、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重要手段。乾嘉年间,《大清一统志》凡三修,又对清代方志的普遍编修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促进作用。在朝廷的三令五申下,地方志的编修开始蔚然成风,形成了以《一统志》为主干,以省、府、州、县各级行政单位为枝干的树状方志编修体系。由于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和提倡,地方志编修进入了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明清两朝各省、府、州、县都设有志局或专馆,方志编修的组织机构更加完善;明永乐十六年,朝廷颁布“修志凡例”十六项,使得地方志体例更趋规范、统一;中央王朝还明确规定各省、府、州、县志书六十年一修,使得地方志编修逐步制度化。上述三点进步促成了全国上下的修志高潮。“据当今学者的研究统计,中国历代所修方志共有八千多种,十多万卷,而明清两代的方志即达六千四百多种,九万二千余卷,其中明代所修的地方志据估计达一千四百多种,一万二千余卷,也有人统计多达二千八百九十二种,总之明代的方志在中国历代方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1]具体到闽东地区亦是这种情况,在闽东地区历代旧志中,明、清两朝编修的府(州)县志约为 50 部,现存 30 部,另有 1 部乡镇志,数量上大大超过宋代以前历代方志编修的总和。

全国性的修志高潮对闽东地方志编修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方志数量的增加上,还表现在修志高潮的同步并行上。“据一些学者的统计数据,明代已知的 2892 种方志中,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有 1622 种,占据半壁江山还多。”^[2]这跟明代统治者对地方志编修的重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闽东地区曾出现三次修志

^[1] 白寿彝:《中国通史》,中古时期-明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04 月版,第 74 页。

^[2] 白寿彝:《中国通史》,中古时期-明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04 月版,第 77 页。

高潮：明嘉靖年间、万历年间、清康熙、乾隆间，共修行政区划性质地方志 19 部，三次修志高潮所修志书占闽东地区现存方志总数的 3/5。这三次高潮正好和全国范围内的修志高潮相重叠。这恰恰反映了明清两朝中央对于地方志编修的高度重视和提倡，促成了全国各地修志成果遍地开花的大好局面，闽东地区方志的编修，亦得益于此。

二、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牵引

地方志“资治、教化、存史”功能，使得地方官以修志存史为“有司责也”，从而促进了各地方志的编修。中央的重视和提倡对各地方志编修具有明显的导向性作用，但是真正将方志编修落到实处的则是地方官员。那么，为什么地方官如此热衷于方志编修呢？原因有三：

其一，“存史”的职责荣誉的驱使是主因。志为“一方全史”，在人们普遍认同的志书“存史、资治、教化”三功能中，“存史”是第一位的，“资治”和“教化”都是“存史”这一功能的延伸。志是地方的史，是国史的最好补充，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方志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1]，这都充分的彰显了志书“存史”之功效。封建官员对“国有史，郡县有志，家有谱”有普遍的认同。郡县若无志，就如国无史，家族无谱一样，渊源来处不明，是十分不光彩的。“窃惟郡县有志，犹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也。”^[2]；史、志、谱是一国、一地、一家族的渊源所系，文化所在，荣誉攸关，而“州郡之志责在守土之人”^[3]，所以地方官往往自觉地担负起修志之责，卢建其在《宁德县志》序中道：“予于己亥秋，承乏斯邑，下车之日，首披志乘，率多漫漶，不禁抚卷流连，叹继起之文献无征，将前此之贻讥谏陋，斯志之修其可缓乎？”^[4]重修《福安县志》序中，徐承禧道：“若更迟之又久，文献以远而无征，稗乘以非而淆是，传闻失实，稽考无从，亦守土者之过欤。”^[5]道出了封建地方官吏以修志、保存文献为官员责任，并认为文献湮没无征是自己的过失。正是

^[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转引自曾星翔、李秀国编：《中国方志百家言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版，第 46 页。

^[2]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十，《艺文志·序·征修福宁及五县志事实序》，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 30 页。

^[3] 张其曜：《重刊福宁郡志序》，见于李拔：《福宁府志》，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 1 页。

^[4] 卢建其修，张君宾纂：《宁德县志》，序，宁德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83 年 12 月点校本，第 1 页。

^[5] 张景祁：《福安县志》，徐承禧《重修福安县志序》，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刊本，第 3 页。

基于对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普遍认同，地方官将“修志存史”内化为“有司之责”，融入到地方官的执政理念当中，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不少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以修志为一项重要任务，甚至在离任时仍然坚持修志。如：李拔在任福宁知府时，见“不惟府志阙如，即五县志亦残蠹无复存者”，不禁惆怅曰：“嗟乎，郡之须志，犹家有谱，国有史，天下之有图籍也。一或不备，上之人欲求治，而曷以更化；下之人欲景贤，而奚以观感？”^[1]于是，命五县地方官员、县绅复修阙志，汇总编修府志，未及成，李拔调任福州，仍念念不忘完成府志编修工作，在调任福州后，他长期坚持利用公务闲暇之余对稿本进行增删考订，“常至丙夜弗未休”^[2]，至乾隆二十七年府志既成，县志亦就。

其二，“资治”情结的催生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资政”道出了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重要原因，而这也是属于史学范畴的方志经久不绝的关键所在。“郡志犹国史，可以劝惩资治，莫先城此”^[3]地方志被誉为“一方之全史”，方志中记载的地理沿革、典章制度、政治得失、风俗民情等，无疑是地方官了解地情、民俗，守土安民的珍贵资料。寿宁县令戴镗在康熙《寿宁县志》“旧志序”中谈及：“夫县有志何为哉？志以备一方实录，示传信于后，俾有位者一批阅之，可以识民情、知土俗、酌利病而镜古昔也。故考亭朱父子守吾郡南康，他务为遑，首取志阅之。彼岂不谙政要，而顾为是不急之务哉？诚知志之关于郡县者甚钜也。”^[4]因为方志拥有强大的“资治”功能，所以朱熹于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赴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为官，下车便问《南康军志》，这也正说明了地方志在古代“资政”的意义。新官上任，捧读方志，则“不必询于耆逸，而民风之淑慝有灼见矣；不必听于闾阎，而民务之缓急无遁情矣；不必（是）身履郊圻，而山川、疆域之盘错，有以经理而区画之矣。”^[5]方志在“资治”上无可替代的作用，催生了地方官编修方志的热情，无怪乎萧绍在书成之日作序道：“则是书之成，虽不比古之良史，谓非守兹土者之急务哉？谓非俾后之人有所持循而勿失者哉？”^[6]萧绍谦逊的认为修志之功虽不

^[1]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十，艺文志·序·福宁府属五县志序，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33页。

^[2]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十，艺文志·序·福宁府属五县志序，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33页。

^[3] 盛继：《隆庆福宁州旧志序》，见于李拔：《福宁府志》，旧志序附，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2页。

^[4] 赵廷玠：《康熙寿宁县志》，戴镗序，第1页。

^[5] 侯谨度修，陈从潮纂：《乾隆福安县志》，萧绍序，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刊本。句中“是”应为多字。

^[6] 侯谨度修，陈从潮纂：《乾隆福安县志》，萧绍序，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刊本。

及修史，但是对于后世的垂鉴作用亦是不容小觑的。

其三，“教化”是地方志编修的又一动因。古代地方官牧民之术，一曰“法”，二曰“教化”。秦朝以法治国，依靠取天下之暴力守天下，最终民怨四起，江河日下，走向穷途末路。汉代时，贾谊在总结秦亡教训时称：“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1]在总结秦亡原因时，汉代人逐步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进一步认识到法家思想的局限性。那么，既然法家的思想行不通，牧民要靠什么呢？陆贾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教化之使然也。”^[2]在陆贾、贾谊、董仲舒等儒生的推动下，汉代统治者逐步将法家的君权至上和儒家的仁爱孝道思想结合起来，开始推行儒家的仁爱之道，重视教化的力量。教化于民逐步成为历代明君贤臣共同认知的为政之道。“修纂者，词臣之责也。儒者入登兰台，为天下厘一统之纪；出司牧民，为一方备外史之征；责有大小，其所以扶治道，裨风化一也”^[3]。具体到闽东地区亦是如此，纵览宁德地区历代方志，均有忠节、孝友、儒林、文苑、义利、贤媛、节孝等条目，修志者企图通过旌表模范典型，发挥辐射作用，移风易俗，教化于民。在记载内容上更是如此，如：《寿宁待志》中，冯梦龙“立月课”，亲自为民讲学，发公告禁止溺女，都是出于教化的目的。可以说，闽东旧方志从条目设置到内容，无不体现修志者利用方志教世化民的淳淳之心。

三、地方大族宗族观念作用下的自觉参与

鼎盛的宗族社会、世家大族的积极参与，有力地推动了闽东地区方志的编修。福建的宗族制度始于北方士民南迁的历史进程，宋代以后，这种制度趋于完善。迨至明清，则发展到顶峰。与之相伴随，作为同宗共祖的血亲记载本姓本族世系发展与先人事迹的史类文献——族谱也日益丰富。“县之有志，犹家之有谱，国之有史，天下之有图籍也。典纂重哉！”^[4]国史、方志、族谱，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家、家乡、国家三个层级宗族观念在文献领域的反映，是宗族

^[1] 贾谊：《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09月版，第九卷，大政，第65页。

^[2] 陆贾：《陆子》，商务印书馆1939年12月版，第15页。

^[3] 刘之嵩：《福安县志》，序，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刻本，第1页。

^[4]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郭萃序，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1页。

观念在文化建构的不同层级上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托宗族制度的族谱对方志的编修有着正面的垂范意义。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一些世家大族把一定的经费、人力从家谱转移至地方志书的编修上。如:《甘棠堡琐志》中对世家大族浓墨重彩的描写,又如是志后附各氏族的捐赠刻印志书名单,均可以反映出世家大族对于编修方志的情结。除了族谱与方志关联,进而对方志的编修有所促进外,宗族与志书正面互动的更为深层的动因则在于:通过方志编修,溢美乡邦,赞誉先人,从而获得整个家族更为宽泛的依归、认同和自豪。在这种情况下,世家大族会更加自觉地参与到地方志书的编修中。如福安县城韩阳望族上杭陈氏,是福安多次修志的鼓动参与者,其族人陈世理是万历二十五年《福安县志》的主纂,陈晓梧是明崇祯《福安县志》主纂,陈从潮是乾隆四十八年《福安县志》的主纂,陈拔是道光十二年《福安县志》主纂,陈思化是未果的民国《福安县志》的主修,宗族与地方志的关系可见一斑,也正是由于闽东地区家族社会的鼎盛,方志编修得以源远流长,代代相传。

四、地方文化名人的推动作用

前及“志乃史裁”,方志既为史学的一个分支,修得好,同样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就吸引了一些著名文人、学者参与修志。可以说,地方文化名人推动了方志的编修。闽东地区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自从朱子莅闽讲学以来,理学人才辈出。闽东地区历代方志的主修、主纂均为鸿儒雅士,如《道光福安县志》主修刘之藹、光绪《福安县志》主纂张景祁均曾名列史馆,参与编修国史,习之体例;乾隆《福安县志》主纂陈从潮为“八闽第一解元”,文采卓著;谢肇淛乃晚明著名的方志家,编有《方广岩志》、《太姥山志》、《鼓山志》、《支提山志》、《万历永福县志》等,方志著述宏富。这些人均在闽东方志的编修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综而言之,对闽东地区方志编修兴盛原因的剖析,大体不出上述四点:明、清《一统志》促成的修志高潮;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牵引;地方大族宗族观念作用下的自觉参与;地方士人“入世”情结的转移。当然,这四点并不是绝然独立的,很明显,点与点之间牵连、互动颇多,这些牵连、互动也促成了推动闽东地区方志编修的一股合力。

第二章 闽东地区特色方志评述

闽东地区历史上不乏优秀志书传世，本章将从州府志、县志、乡镇志中各选出一部，即“详核赅善的《福宁府志》”、“独具特色的《寿宁待志》”、“甘棠堡历史的活化石《甘棠堡琐记》”三部志书，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对其成书背景、体例特点、学术价值及作者的修志思想进行研究探讨，以期能达到披沙沥金、窥一斑而见全豹的目的，展现闽东地区方志之全貌。

第一节 详核赅善的《福宁府志》

《福宁府志》由分巡道朱珪修，知府李拔撰，始于乾隆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付梓，是志记载起于东汉末年孙吴置温麻船屯到清雍正十二年升州为府以来一千七百多年间福宁全郡的历史。全志四十四卷，首一卷，分十门一百一十目。卷首为府及属县图、序、旧志序、修志姓名、修志凡例，正文部分依次为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食货志、学校志、秩官志、选举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诸志前皆有论，论述颇为精辟。主纂李拔乃一代名流，颇工于地方志乘，他主张修志要“贵效用、重经济”，因此是志资料翔实、粲然可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志有“详核赅善”之称。《福宁府志》是有清一代闽东地区唯一一部全区性方志，全面系统的展现了闽东地区的人文历史和地方特色。今天看来，它不仅保存和承载了丰富且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对地方发展也具有其独特的“辅治”作用。笔者将就是志的内容、特色和价值作一简要介绍。

一、福宁府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变迁

福宁府，辖区含今霞浦、福鼎、柘荣、福安、宁德、周宁、寿宁七县市。位于闽浙交界处，距福州东北五百四十余里，北部群山环绕，南部濒临大海，境内山多岭密，叠嶂奇峰更是不可名状，有“闽头浙尾，海内奥区”之称。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有段话描述福宁州的地理位置：“闽兴、泉、福、漳之地皆滨海要冲，然莫有如福宁之尤险者……而福宁又在东南，突出海中如吐舌然。其左为瓯括海，居东面，其右为福兴海，居南面，福宁独当东、南、北三面之冲。岛夷入寇，必先犯

此，故防为最急也。”^[1]由于福宁府属于海防要冲，历史上均受到统治者不同程度的重视。从其历代行政区划的设置就可以发现：该区秦汉时期为闽中地，晋太康三年（282）以温麻船屯地置县，称为温麻县。唐武德六年（623年）改名为长溪县，隶属泉州。宋为福安县，元至元二十三年（1268年）升县为州，取福安、宁德首字称“福宁州”，属福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年）又改为县，成化九年（1473年）升为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州上升为府后，割建宁府属地寿宁，附之以霞浦，乾隆四年又置福鼎县属之。

二、乾隆《福宁府志》成书背景及作者李拔

在乾隆《福宁府志》之前，福宁府曾多次编修志书，除无从稽考志书外分别为：明正统十年（1445年），霞浦进士郑宪以《永乐县志稿》（明永乐十六年辑稿）为蓝本纂《福宁志》五卷（已佚）；明成化十一年，刘象修《福宁州志》（已佚）；嘉靖十七年（1538年）郴州举人谢廷举倡导，宁德训导闵文振主纂《福宁州志》十二卷（存宁波天一阁，不全；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福建省图书馆收藏有胶卷）；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释如一辑《福宁府志续略》十八卷（存日本国会图书馆，不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均藏有原刻胶卷）；隆庆元年（1567年）盛继纂《福宁州志》十目十二卷（已佚）；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知州史起钦修、林子燮纂《福宁州志》十卷（原刻藏于日本国立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存影印本，福建省图书馆残存卷九和卷十）；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殷之辂修，朱梅纂《福宁州志》十六卷（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北京、福建等馆有残卷）。《正统福宁县旧志序》中有叙“邑之前辈尝修矣，草率一时，未及殒梓，流传未广，抄录者又未免鲁鱼亥豕之讹，久而失真。元季兵燹，泯没罕传。间有存者，又多残缺，文意不可晓……乃取永乐戊戌所修志稿，并掇拾残篇断简，断以己意而增损之，辑而成志。”^[2]可见，元以前及永乐十年都曾修志，却不曾广泛流传。如此看来，就该地而言，修志者虽多，流传者甚少。清雍正十二年时福宁升州为府，共设五县，虽然其体制规模和以前相比有很大改观却依然沿用旧志。而旧存州志如前所述，内容体制简陋不说保存尚不完备。乾隆二十四年在知府李拔的组织下，参考五县旧志书及《福建通志》另作修纂，于是便有乾隆《福州府志》的问世。

^[1]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六，福建二，光绪二十七年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2] 李拔：《福宁府志》卷首，旧志序附，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1页。

关于此志的作者，这里有必要做一介绍。李拔，四川犍为州人，字清翹，号峨峰。清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曾出任知县，同知。乾隆二十四年由楚北郡丞升任福宁知府，第二年调任福州知府。此人政事清明，文学素养深厚，公事之余著述甚广，主持修纂《重修犍为县志》、《衡州续艺文志》、《长阴县志》、《福宁府志》以及《福州府志·艺文志》（补四卷）等地方志书，著有《理学探源》、《四书旁注》、《壮游见闻》、《地理探源》、《东西行录》等多部著述，其他散文诗词更是不胜枚举。李拔对编修《福宁府志》尽职尽责，在《福宁府志》尚未完工之时便调任福州，他认为此志“自我始之，必自我终之，未敢诿为邻封事也。”^[1]结稿之后又进行了精心校讎，直到圆满结束，这种善始善终的态度当下传为佳话。李拔任福宁知府时，政绩突出。每到一处都会考察其城池堤坝，确保公共事业的稳定，对当地的水利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福宁府志》中收录的《修理福宁郡西山三坝记》、《重修福鼎护城堤记》等文章，不仅详细描述了修筑堤坝的总过程，也充分展现了李拔本人的卓越文采。李拔对民生问题也很关注，由于福宁地区依山傍海，耕地面积有限，人们着重依附渔业谋生，不擅农业，谷麦较少，李拔了解到当地的传统后，提倡种植包谷，即可作主食，副产品还能养猪作肥等，这一具有“集约化农业生产”意识的政见在《请种包谷议》一文中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他还把种桑养蚕的技术传到当地，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模式。《福鼎县志》对此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三、《福宁府志》的价值

1、作为重要的地情载体，《福宁府志》中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史料。李拔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公事之毕，好吟咏诗文，常常纵情山水，题词于名胜古迹之中，因而，在《福宁府志》中有较多关于自然景观的描写和诗文的收录，如在“山川”一目中记载霞浦县温麻里有十奇峰，展旗峰、文笔峰、石鉴轩、寿山屋、翠罗屏、湛恩池等十处，“清幽明削，观者忘倦”^[2]。李拔曾为各峰题诗，如石鉴轩“顽石可为鉴，灵犀一点圆。云台磨得净，方悟有心田。”^[3]偃杉塔诗云：“凌霄十丈塔，惟以偃杉开。谁知杉蔚起，便是栋梁材。”^[4]类似的还有“瓢峰山，在四十都。因产瓢

[1] 李拔：《福宁府志》卷首，曹序，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1页。

[2]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地理志·山川，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7页。

[3]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地理志·山川，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7页。

[4]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地理志·山川，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7页。

木得名。山苍水清，览者忘倦。”^[1]《福宁府志》对人文景观的记述也颇多，如浮瀛山“大将军林国祥辈皆居于此。宋知县刘镇有诗。元人林景节有‘天马腾空’、‘沙龙障海’诸咏。”^[2]又如：李拔等人诗于宁德县西南的白鹤岭上，赞其“诚一邑之大观也。”^[3]不仅《山川》、《古迹》等大篇幅的介绍名山胜迹，《艺文志》中亦相应收录大量描写自然、人文景观的文章诗词，如李拔《游太姥山记》将太姥山的地理位置，景观特点以及他本人的所观所感等一一阐述，他赞太姥山为“太姥摩霄第一峰”^[4]，并用“仰观三极星辰近，俯视四垂日月低”^[5]来赞其雄壮。如上所述，《福宁府志》中对于旅游资源的记载和评价，对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2、军事方面的记载。《福宁府志》中“地理”、“建置”、“祥异”等条目保存了许多重要的海防史料，如《地理·山川》记载“斗米澳，《万历志》：浮瀛山延袤四澳，控压海道，最为要害。宋知县刘镇有‘绝顶试穷千里目，烟波深处是琉球’之句。”^[6]突出了其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地理位置及军防价值，切实而有远见。又如：“城池”一目载郡守李拔初到福宁阅城之时，看到城墙破落几近坍塌的局面，感慨虽恰逢太平盛世，贤主明君，然而，作为东南门户的福宁府防卫如此松懈亦是不明之举，当为守土者之过。正所谓“蛮夷震慑，帝城拱护。”^[7]自古以来，海疆便是海上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是为兵防重点。明代由于海防疏漏而让倭寇有机可乘，致使闽东地区久罹战火，民不聊生。李拔以其敏锐的防卫意识，提出“海疆要地金汤永固，实久安长治之一道”^[8]，并捐资修筑。在《福宁府志》的类目设置中，增加《海防》一目，征引《尚书》、《山海经》、《史记》、《汉书》等各朝史书，以及《三山志》等志书，阐明历代海防的情况，称为“海上故实”，“俾后之览者，触目而加警焉。”^[9]。又简述霞浦、福鼎、福安、宁德四县的港口，水寨等，作为“防守冲要”内容。此外，“艺文志”中还收录了众多关于海防的奏折、序、跋等，足见李拔对于福宁府海防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这对于当今加强海防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3、翔实的考证，指出旧志的误记。李拔在编纂志书的过程中较为重视志书记载

[1]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地理志·山川，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8页。

[2]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地理志·山川，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11页。

[3]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地理志·山川，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34页。

[4] 李拔：《福宁府志》卷三十九，艺文记，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33页。

[5] 李拔：《福宁府志》卷三十九，艺文记，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33页。

[6]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地理志·山川，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11页。

[7] 李拔：《福宁府志》，卷六，建置志·城池，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7页。

[8] 李拔：《福宁府志》，卷六，建置志·城池，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7页。

[9] 李拔：《福宁府志》，卷三下，地理志·海防，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1页。

的真实性,对于旧志所载内容不泥古、不盲从,详加考订。如:“祥异”一目载:元“至元二年,宁德县治灾,及民舍百余家”^[1]李拔后附按语考订曰:“旧志讹作二十二年。”^[2]又如卷一“天文志·节序·端午”中载:“相传闽王以五日薨,民怀其德,是日不饮酒。”^[3]万历《福安县志》中亦有类似记载:“端午日,门悬蒲艾,相传闽王以五日薨,是日不忍饮酒为乐。”^[4]李拔对这一问题查找《五代史》、《年谱》后附按:“闽王王审知以冬十二月卒,非五月也。方言无据,大都如此。”^[5]对于重新考证仍然未明的记载予以标明,做存疑状态。如卷四十三“艺文志·祥异”:“(元)十三年正月初一,贼至福州,官兵追袭至汤,黄善退屯连江县,发病死。江二蛮殄而焚之。”^[6]然后又记“今《福州志》、《昭代典则》俱言:连江巡检刘浚子健擒善二帅府磔之,犹未得其实,故补之。”^[7]也有存在歧义的事件,是志会用史料加以解释,如“艺文志·祥异”载:“(元)二十年十月,国公大耳赤以照会升袁天禄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政。《皇明通纪》、《昭代典则》俱书:天禄,福建参政。《州志》则书江西。今查《东莞志何真传》:元末,江西、福建合为一省耳。”^[8]正是由于乾隆《福宁府志》这种据实考证的修志思想使得其所存史料翔实、可信,实为是志一大优点。

尽管如此,《福宁府志》亦存在其不足之处。首先,李拔文人气息较浓,比较重视文辞优美,有时不免有浮夸之嫌。同时,鉴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竭力维护本朝利益,有些记载也有失公允,如在乾隆八年版《福宁府志》中,把明末抗清死难烈士刘中藻列入“祥异”之中,附加污蔑言语等。其次,是志整体上体例较为精当,但如“祥异”、“外记”等本应归属“杂志”一门,是志却收入《艺文志》,亦属体例失当。再者,如“艺文志·外记”中对祷雨、祈梦、仙道等迷信之举也有详细记载,有悖于科学。尽管如此,《福宁府志》“存史”、“资政”之功是不容掩盖的,无论是海防地理还是政治经济,无论是风俗祥异还是文学教化,对于当今闽东现代化建设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1]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十三,艺文志·祥异,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2页。

[2]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十三,艺文志·祥异,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2页。

[3] 李拔:《福宁府志》,卷一,天文志·节序·端午,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4页。

[4] 陆以载:《福安县志》,卷一,輿地志·节序,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见于书目文献出版社编《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991年11月版,第125页。

[5] 李拔:《福宁府志》,卷一,天文志·节序·端午,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4页。

[6]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十三,艺文志·祥异,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6页。

[7]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十三,艺文志·祥异,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6页。

[8]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十三,艺文志·祥异,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6页。

第二节 独具特色的《寿宁待志》

《寿宁待志》(以下简称《待志》)修于明崇祯年间,是寿宁县令、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宦游寿宁期间所作的一部别具一格的志书。寿宁建县于明景泰六年(1455年),除《待志》外,寿宁历史上还曾4修志书: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由知县张鹤年第一次纂修县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知县戴镗重修,此二本已佚。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毕九皋组织修志,后因毕九皋去世,志书未能付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知县赵廷玠以“自戴公纂修以后及今,数十余年,其间缺略已多,甚迷殆甚”^[1],于是“爰谋诸绅士,重搜遗佚,详加校讎,缀以旧闻,添以新知,而授之梨枣焉。”^[2]对毕志进行增删考订,纂修成《寿宁县志》八卷。由上可知,《待志》是寿宁现存最早的志书,是研究寿宁一邑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冯梦龙生平及其政治思想最原始的方志文献,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是志国内已佚,日本存有藏本。1983年经陈煜奎点校,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失传多年的志书得以问世。《待志》共两卷,整体上采用横排门类,纵贯时间的方式,卷上依次为:疆域、城隘、县治、学宫、香火、土田、户口、升科、赋税、恩典、积贮、兵壮、铺递、狱讼、盐法、物产、风俗、岁时;卷下依次为里役、都置、官司、贡举、坊表、劝诫、佛宇、祥瑞、灾异、虎暴。除此之外,是志还收录了冯梦龙创作的八首诗歌以及文告。是志记述时间起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终于崇祯十年(1637年),实际上是对戴志的续修。

一、冯梦龙及其修志思想

冯梦龙,字犹龙,别号龙子犹、顾曲散人、莫憨斋主人等,明末苏州府长洲县人。据《寿宁县志》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为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六十一岁高龄的他不畏艰险,跋山涉水来到偏僻小镇寿宁就任邑令。此前,他已经写就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一位才华横溢,著述等身,满腹经纶的封建文人。他在文学上的卓绝成就带给《寿宁待志》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将文学手法和治学观念运用到志书编纂中,使得《待志》写法简洁、明白通顺,详略得当,叙议结合,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志;他重视实地考察,《待志》除部分参照旧志外,基本是冯氏任上的亲身经历或微服查访的调查研究,书中多用“余”或

^[1] 赵廷玠:《寿宁县志》,赵廷玠序,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刊本。

^[2] 赵廷玠:《寿宁县志》,赵廷玠序,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刊本。

“吾”等第一人称叙事，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他偏重风俗，重视志书的教化功用，使得《待志》充满浓厚的人文特点。他的修志思想也在《待志》中得以体现。

1、谦逊严谨，直言不讳。自隋代禁止私人修志以来，地方志编纂基本为官府所垄断。《寿宁待志》记寿宁一邑之事，却不以“县志”命名，而独辟蹊径称之为“待志”。缘何？冯梦龙在“小引”中解释的很清楚：“曷言乎待志？犹云未成乎志也。曷为未成乎志？曰：前乎志者有讹焉，后乎志者有缺焉，与其贸焉而成之，宁逊焉而待之。何待乎？曰：一日有一日之闻见，吾以待其时；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吾以待其人。”^[1]“言待不言续，总之未成乎志云尔。旧以待余，余以待后之人。”^[2]冯梦龙一面谦逊的认为自己的志书搜罗不足无以称之为“县志”，另一方面又感叹，寿宁县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知县戴镗纂修以来，已40余载未曾修志，文献淹没，人事无征，“司牧者可以不兢兢乎哉！不敢志，不敢不志。待之为言，欲成之而未能也。”^[3]故称之为《待志》。《待志》之名，不仅在福建修志历史上，乃至全国志书的命名上都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体现了冯梦龙谦逊严谨，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严谨的态度不独表现在志书命名上，还表现在全志的内容中。在志中，冯梦龙对先前志书进行了考订，行文中多附按语，在志书最后还附有“旧志考误”一则。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不避讳，秉笔直书的史德。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三》中对史德做过阐述：“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4]。正如章学诚所言，史德才是修志者最重要之品格和素养。如果说谦逊严谨反映的是史家态度层面的东西，那么直言不讳的史德反映的就是史家技术层面的东西，是志书的生命线。冯氏秉笔直书的史德在志书中处处可见：在谈到民风的时候，冯梦龙并不曲护，称寿宁民众“性悍而量窄，虽锥力之细，骨肉至戚死不相让。不知法律，以气相食，凌弱蔑寡，习为固然”^[5]，直言寿邑民风彪悍，气量短小，恃强凌弱，争强好胜，甚至于骨肉相残。显然，冯梦龙对于这种习气是厌恶的。又如：冯梦龙对于寿邑典妻赁妻、不以为讳的恶习也颇有微词，寿邑女子没有地位，遇到家中急需，男子将妻子

^[1] 冯梦龙：《寿宁待志》，小引，第一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55页。

^[2] 冯梦龙：《寿宁待志》，小引，第二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55页。

^[3] 冯梦龙：《寿宁待志》，小引，第二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55页。

^[4]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3页。

^[5]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第四十六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80页。

典卖他人或租赁给别人生子是解燃眉之急的方法，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受到道德的谴责，相反，邑人均“不以为讳”；为了生计，寡妇在为丈夫守孝期间就改嫁，甚至连白发苍苍的老妇也觅一老翁为伴，谓之帮老。作为封建文人，冯梦龙认为这不合礼数，不近人情，反对男子轻视女性，更悲叹“女亦自轻，悲夫！”^[1]这与官修志书中溢美乡邦，美化乡贤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与“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征实”^[2]的官修志书完全不同。同样，对于有益教化的人事，冯梦龙同样不吝惜给予激赏。如“孝子”一目中载柳必用，父亲染病眼睛几乎失明，医生都无法医治，柳必用每日焚香祷告，并用舌头将父亲眼中秽毒吸出，日日如此，后父亲复明，至八十岁仍双目有神，其母得痼疾，伏枕三年，柳必用为其亲尝粪便以备诊疗，母丧后与弟弟相依为命，兄友弟恭，弟丧后能抚孤侄。冯梦龙对于这种孝行也给予了激赏，赞其曰：“性行醇谨，孝友天成”^[3]。冯梦龙秉持直言不讳、秉笔直书的史德，既是官修志书无法做到的，亦是私修志书之优越性所在。

2、重视风俗记载，体现人文精神。根据《康熙寿宁县志》收录的戴镗的《寿宁县志序》中的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知县戴镗重修的《寿宁县志》在参见张志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删考订，删除了戴镗认为无关于政治的东西，即“中间可采者因之，无关于政治者删之，秩官文物未增入者补之，不数月而成。”^[4]这就奠定了戴志是一部政治色彩浓厚的志书，戴镗以政治为重的修志思想必然导致对于风俗民情记述的简略。恰恰相反，冯梦龙十分重视采风问俗，因此，实际上，寿宁大量的风俗材料是靠《寿宁待志》得以保存的。此说可以通过对比《康熙寿宁县志》中风俗一目来论证。康熙《寿宁县志》将“风俗”归于“地輿志”一门，含“岁时”约略500字，内容极其简略。所记载的内容也几乎均来源于《待志》中风俗的记载。如：康熙《寿宁县志》“风俗”一目有一条为：“独其崇信师巫，修设斋醮，甚非雅俗。”^[5]《待志》中非常详细：“俗信巫不信医，每病必召巫师迎神，邻人竞以锣鼓相助，谓之打尪，犹云驱祟。”^[6]甚至还进一步描写出打尪时，邻人争相在病人家喝酒吃肉，如果家有病人而不打尪，甚至会被邻居所诟病。打尪时候，举家观望，无

[1]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第五十一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83页。

[2] 章学诚：《文史通义》，第四册，卷八，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页。

[3]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下，劝诫·孝子，第五十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311页。

[4] 赵廷玠：《寿宁县志》，寿宁县志旧序，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刊本，第1页。

[5] 赵廷玠：《寿宁县志》，卷二，輿地志·风俗，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刊本，第8页。

[6]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第五十三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84页。

人照顾病人，甚至病人都已经逝世，身体冰凉还无人问津。

3、重视志书的教化功能，体现民主思想的闪光。在古代男耕女织的社会中，男性凭借身体优势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处于弱势，我国古代素有重男轻女的传统。在寿宁，民众“生女多不肯留养，即时淹死或抛弃路途”。^[1]冯氏上任以来，见此陋习，决定严厉禁止。《禁溺女告示》是由冯氏亲自执笔，他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道：“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肉，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况且生男未必孝顺，生女未必忤逆……”^[2]除了教化之外，冯梦龙还对寿邑溺女的恶习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如：对于那些冥顽不灵，扼杀骨肉的人，邻居予以举报的，赏银五钱，溺女者重责三十大板，枷一个月；邻居隐瞒不报的，实行连坐，与溺女者同罚。对于那些确实没有能力抚养的家庭，可以上报县衙，由县衙安排收养，收养人家赏银三钱，女子养大之后生身父母不得认领。冯梦龙的告示通俗易懂，措施简单易行，对寿宁县移风易俗起到了显著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冯梦龙如此重视女权，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实属可贵，体现了冯梦龙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

二、《寿宁待志》的价值

1、《待志》是研究冯梦龙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

首先，志书中明确写明冯梦龙为“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县人”，自《寿宁待志》出版后，学术界关于冯梦龙是长洲人还是吴县人的争论得以平息，为后人研究冯梦龙提供切实的证据。

其次，《待志》中处处体现了冯梦龙的政治思想。《寿宁县志》称冯梦龙“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有恩，待士有礼”^[3]，观其任上具体作为可知，此赞誉绝非溢美过誉之词。莅任之初，冯梦龙就大刀阔斧，解决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如：“重立四门谯楼”^[4]，重新修缮崩塌损毁的城墙，加强守备，以防患倭寇侵扰；“又置大鼓一面，设司更一名于县之门楼。”^[5]以加强巡防，改善治安；“又修复东坝”^[1]，

[1]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禁溺女通告》，第五十一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83页。

[2]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禁溺女通告》，第五十一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83页。

[3] 赵廷玠：《寿宁县志》，卷四，官守志，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刊本，第25页。

[4]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城隘，第二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58页。

[5]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城隘，第二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蓄水于城内。针对由徽商败本、倭寇侵扰而导致的食盐不足、私盐贩卖等问题，冯梦龙经过深思熟虑，用招徕盐商的方式来解决关系民生的食用盐不足问题，从源头上遏制私盐贩卖。针对寿宁县没有仵作，每有讼案必到邻县请仵作，这来回一切费用都要摊派到县府以及犯人身上，于是“特招仵作一名”^[2]。闻西门外虎暴伤人畜，于是捐俸造捕具，又重建西门城楼，虎患遂除。针对寿邑学风不盛，科举无名的现状，“立月课，且颁《四书指月》亲为讲解，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将来或未量也。”^[3]从冯梦龙任上的具体作为来看，冯梦龙花甲之年，千里迢迢奔赴寿宁，确实是满腔忠君泽民之热血，可无奈自己只是个贡举，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下，他切身的体会到了人微言轻的无奈和痛苦。寿县大宝银矿于嘉靖年间封闭，撤回守军，留下十名守卫，经冯梦龙调查，实际上，并无一名守卫到岗，针对这一状况，冯梦龙请求收回守军的军饷，用于招募隘兵，以防矿盗，然而，知府以军粮有定制为由不予批准，冯梦龙叹曰：“俟后人图之，余不敢再详矣。”^[4]又如：政和九铺是寿宁传递公文，来往福宁府的必经之路，由于工食费用均为政和支出，各铺对寿邑公事故意拖延怠慢，以至于公文延误、出行困顿。冯梦龙曾条陈，建议与政和兑换钱粮项目，将铺递纳入寿邑管辖，以考其勤惰。此事也因与政和钱粮兑换尚无成议而无果，冯梦龙称：“俟邻县高明有和衷者，终冀相成耳。”^[5]然而，最让冯梦龙感觉到“肘掣于地方，幅窘于资格”的是升科问题，冯梦龙称寿宁建郡石国，用“水无涓滴不为用，山任崔嵬也要耕”^[6]来形容寿邑土瘠民贫，并无升科之数。因此，“欲以本邑所升之数，即抵本邑所悬之数”^[7]，以殷实虚粮，减轻寿邑百姓赔累之苦。然而，升科是官员升迁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事关政治前途，为民减负一事也因遭到了各方压力而妥协。冯梦龙想起当年任丹徒训导时对石令景云的苦心劝诫，今日自己却不

33 册，中国书店 1992 年 12 月版，第 258 页。

[1]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城隘，第二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 册，中国书店 1992 年 12 月版，第 258 页。

[2]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狱讼，第三十九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 册，中国书店 1992 年 12 月版，第 277 页。

[3]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第四十七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 册，中国书店 1992 年 12 月版，第 281 页。

[4]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铺递，第三十七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 册，中国书店 1992 年 12 月版，第 276 页。

[5]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铺递，第三十八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 册，中国书店 1992 年 12 月版，第 276 页。

[6]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升科，第十七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 册，中国书店 1992 年 12 月版，第 266 页。

[7]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升科，第十七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 册，中国书店 1992 年 12 月版，第 266 页。

行其志，“当下数升愧汗矣！”^[1]由于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本是体恤百姓的他无奈只好妥协退让，这也反映了以冯梦龙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在“仕途”与“泽民”上的艰难抉择，在“赋税”中有《催征》小诗一首：“不能天雨粟，未免吏呼门。聚敛非吾术，忧时奉至尊。带青砦早稻，垂白鬻孤孙。暗的烽烟息，敷天颂圣恩。”^[2]这首诗表达出冯梦龙的无奈，这亦是所有满腔抱负、为民请命的封建官吏的无奈。封建官场的“潜规则”迫使他们只能在不触犯、不影响仕途的前提下适度为民请命，否则乌纱帽尚且保不住，又谈何为民请命呢？而冯梦龙能心感有愧于民比起那些在宦海浮沉的纯政客已属弥足珍贵了。冯梦龙在《待志》中极言寿令之不易，却又抱着：“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若夫升沉明晦则天也”^[3]的心态，如斯邑令，实为寿邑之福祉也。

第三，《待志》可以与“三言”互为佐证。冯梦龙的政治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作品“三言”中，如果说“三言”是其政治理想的思维结果，那么《待志》就是他政治理想的实践所得。特别突出的是，《寿宁待志》中描述的几个判案的例子，在案中，冯梦龙仿佛化身为“三言”中明察秋毫的判官，微服私访、旁敲侧击、声东击西。在审理姜廷盛诬告刘世童砍伤其弟一案中，为了取证，冯梦龙亲自走访邻里亲戚，而不是听信一面之词，妄下论断，终于了解到姜廷盛和刘世童因里役一事旧有纠葛，加之姜廷盛因弟弟残废，恶其坐食，故有意伤害弟弟，以达到诬告刘世童和除去累赘双重目的。真相大白后，姜廷盛受到应有的惩罚。冯梦龙自许曰：“假使余不躬往或往而不密，必为信理所误矣”^[4]。这些都可以在“三言”中寻找故事中主人的影子，与之参照，在处理案件中借用“三言”主人翁的做法，足见《待志》即其政治理想之结晶，是他将“三言”付诸实践的例证。《待志》中的记载可以与“三言”互为佐证，是从侧面研究冯梦龙文学作品及其思想的重要文献。

2、《待志》是研究寿宁县历史的宝贵地情资料。

《寿宁待志》是寿宁县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保存了许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民俗物产等原始史料，是研究寿宁县历史的宝贵地情资料。首先，《待志》中的疆域、

^[1]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升科，第十八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66页。

^[2]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赋税，第二十七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71页。

^[3]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下，官司，第二十二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302页。

^[4]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狱讼，第四十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77页。

城隘、县治、兵壮、狱讼、官司等都是有关政治的内容，如卷上，“狱讼”中记寿宁县法律之简陋、司法程序之因陋就简、没有仵作等情况，都反映了寿宁县的偏僻和落后；其次，《待志》反映寿宁经济的贫困和物质的匮乏。如：在“岁时”一目中，冯梦龙介绍寿宁县民间的端午节是初四过，比官方先一日，原因在于曾出现过“民与兵争市肉至相杀”^[1]的场面，端午节本是喜庆的日子，竟然会出现为了争肉而相杀的场面，足见寿邑物质匮乏程度，又如：“风俗”一目载寿宁县因地处山区，若燕窝、西施舌、江瑶柱等虽出闽海，寿宁县大家族甚至从未见过，寿宁鲜有鲜鱼，民众多以咸鱼佐餐，“猫亦食惯，偶以鲜鱼投之，摇尾而去”^[2]。冯梦龙用非常生动、有趣的笔调写出了寿宁县经济之贫困、物质之贫乏，读来十分可信；第三，《待志》反映了寿宁县落后的文化状况。“学校虽设，读书者少。自设县至今，科第斩然。经书而外，典籍寥寥。”^[3]冯梦龙通过亲身访查，发现寿宁并非像旧志中记载的“家藏法律，户有诗书”，甚至连书商都不愿意来寿邑卖书，邑中学风不盛，科举无名。这些实地调查的资料都真实的反映了寿邑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状况，是研究寿宁县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最后，冯氏对寿宁一邑之风俗尤为关注，风俗是该志笔墨较浓重的一部分，因此，《寿宁待志》对于研究寿宁县的风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冤家宜解不宜结，在寿宁有结怨者，不用其他方式，竟是用认亲来解恩怨，奇怪又有趣！“又两姓构怨不休，亲知欲为解纷，使乙子拜甲为父，立券而罢。或夙逋不偿，亦用此法”^[4]。在福建多盛行土葬时，独寿宁多使用火葬，原来是寿宁土地稀少，并非旧志所载是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还有奇怪的迎土牛之俗：“迎土牛，居人竞以砂砾掷之，中者新年有采，虽呵禁不止，比至县，牛无完肤矣。”^[5]这些风俗的记载，生动活泼，饶有趣味，在民俗学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如：在“风俗”中还介绍寿宁地区男女服饰，冯梦龙称寿宁民众男女衣服微分长短，领缘无别，比较特别的是“男子必服袴，而女子既嫁则否，寒则添裙”^[6]，且男子无论长幼，无论天气寒暖，均着肚

[1]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狱讼，第三十九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77页。

[2]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第49页。

[3]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岁时，第五十六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85页。

[4]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第五十三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84页。

[5]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岁时，第五十六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85页。

[6]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第五十二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83页。

兜,而且“妇人虽暑月亦不蔽乳”^[1],这些关于衣着服饰的记载颇为有趣,正是因为冯梦龙对于民俗的关注,使得《待志》成为寿宁县民俗研究的宝贵源泉。

三、《寿宁待志》的不足

当然,由于《待志》为冯梦龙一人所著,一家之言。因而,它也存在着些许不足。其一,体例上存在缺陷。《寿宁待志》并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没有分门别类,以类系事,因而体例较为杂乱,如卷上已有“狱讼”一目,卷下又列“官司”一目,所载内容无异,完全可以合为一目;其二,内容过于简单。《待志》毕竟为志书之支流,因限于篇幅,城隘、人物等目内容过于简单,略显遗憾;其三,考订稍欠精审,如“城隘”这一类目中载:“相传,议县时议割政和、福安、宁德三县之地,宁德林庄敏公聪,时为大司寇,闻之,嘱巡方使者:‘梓里一草一木毋动。’使者示意道府,故议割止二县。”^[2]这一记载完全是以讹传讹,根据清乾隆四十年《宁德县志》记载,当时林聪并未担任过刑部尚书一职,更谈不上示意使者不动宁德一草一木之说,这一瑕疵与全志严谨的考据风格颇为不符。然而,瑕不掩瑜,《寿宁待志》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已经为学术界所公认,而冯梦龙在寿宁的政绩和对闽东方志的贡献亦可昭日月,正如闽东籍当代著名易学专家黄寿祺教授所赞:“三言世上流传遍,海内皆称眼识高。寿宁四载留政绩,先生岂独是文豪。”

第三节 甘棠堡历史的活化石——《甘棠堡琐志》

《甘棠堡琐志》内容丰富,搜罗广泛,从朝廷奏折到契约文书均有记载。因为涉及范围较小,作者又是当地的常住居民,对风土人情的熟悉,更容易把握地方特色,因而是志内容虽比较琐碎但和当地居民关联密切。如:《围筑土堡先后是由》、《地师方少山问答拾遗》、《四门名义》等篇叙述甘棠堡筑堡前后事由,对甘棠围塘筑堡一事的来龙去脉有清晰的交待;《咏堡内四门》、《咏堡内六境》、《咏棠江十二景》等篇是对甘棠堡内景色的直观描述;《防旱官坝碑文》、《水利碑文》、《堡内水井》、《宪批设闸勒石》等篇是描写水利设施。又以祥异类记诸如干旱、水患、火患等;

^[1]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风俗,第五十二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83页。

^[2]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城隘,第一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57页。

以氏族、乡绅、耆老、节妇、妇寿等记堡内人物及民风；以公业、自治会、保卫团、防盗会、农会等记团体组织。此外，还有买卖契约、神仙灵显等记载，内容杂而实，是研究甘棠堡历史重要的参考资料。

一、甘棠堡的由来

甘棠堡，位于今福安县甘棠镇境内。东临赛江，和赛歧镇隔水相望，西连宁德市赤溪镇，北临溪潭乡、赛歧镇，南接下百石镇。甘棠初名三塘。宋元丰年间，林氏先祖林美和世居福安长溪，一天访客途中见门首海地，可以围塘筑邑，与朱、金、郑等各宦家谋划筑堡。于是，林围于南，叫做“南塘”，朱、金、郑围于中，又都为官宦人家，叫做“官塘”，陈、苏、郑围于外，叫做“外塘”。“先因筑海成田，后遂即其他而居焉。三塘之名始于此。”^[1]自宋以来的几百年间，该地区民风淳良，日趋繁盛，无论人口物产，均居其它乡镇之上。明嘉靖年间，福建沿海地区多遭倭寇骚扰，福安也未幸免于难，军民合力顽强抵抗，配合戚家军歼灭海贼。知县卢仲佃便发动三塘百姓及避难到此的乡绅，组织筑堡自救，卢仲佃“手书火牌谕招三塘百姓并避倭在县老民而慰之曰：‘尔等皆豪杰有志之士，久离乡土，何不相其地利，围筑土堡（余）助尔一半城工。’”^[2]三塘居民筑堡期间曾受到倭寇及官绅的多次阻隔，历经三年终于竣工。此堡的修筑依赖于卢公的恩泽，故当地居民改名为“甘棠堡”，即见城思卢，如同周人“见棠思召”，以纪念卢公的恩德。地方志中如是记载：“三塘堡（在下二十九都甘棠。明嘉靖三十八年，倭攻福安，乡民离散。知县卢仲佃檄谕三塘百姓筑堡自卫。民感其德，因更其名曰‘甘棠’，周围四百七十五丈。）”^[3]知县刘枢曾经赋诗赞其曰：“海门且喜海无波，一望平畦绿意多。田外青山山外树，雨鸠声和插秧歌。”^[4]将甘棠堡其乐融融的鱼米之乡风貌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甘棠堡琐志》的成书及特色

甘棠堡自明筑堡以来没有完整的修志，以至于前事湮没，堡内先贤也曾提议修志，都因前事难辑而中断。民国十六年，金华居士陈一夔（祖籍浙江金华，世居福

[1]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上，甘棠迁城立堡记，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9页，“余”字疑为脱漏。

[2]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上，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11页。

[3] 张景祁纂修：《福安县志》，卷五，城池，土堡，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第8页。

[4]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三十六，艺文志，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第19-20页。

建福安甘棠乡)以“本堡之志自明季迄今,三百余载,未之辑修。虽非云‘不孝’,而前事湮久弗传,世故沧桑,咎之重,在所难免”^[1],再次倡导修志,以古书簏捡到的《立堡先后事由》为蓝本,并多方访查,《甘棠堡琐志》问世。从类型来说,《甘棠堡琐志》当属乡镇志,然而,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在内容和体例上有其独特之处。

从内容上讲,是志具有明显的“族谱”味道,对于家族内容有浓墨重彩的描写,是志前附陈一夔序,序中写到:“当如族谱之相传弗替”^[2]。我们知道家族是以血缘或婚姻关系结成的亲属集团,每个家族都是一个社会的细胞,是一个缩影。家谱、族谱记述和反映了一个家族的历史面貌,其内容很广泛,不仅记述人物,也有政治、经济、风俗等的记载,可作为一个地区编史修志的凭证。一部完整的族谱通常包括以下内容:谱名、谱序,相当于族谱的前言,明确家族的发展背景;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和人物传记,用以记录家族的繁衍史;至于祠堂、坟茔、家训家规、恩荣录、艺文等记载了族权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家族兴衰历史的全记录;之后会有纂修人名、领谱字号等,清晰了每次修谱的始末。总之,族谱是中国历史文献重要的组成部分。《甘棠堡琐志》不同于此,首先,《甘棠堡琐志》记载的不是一个家族,而是以一个区域内各姓氏居民为主体,然而同样是某几个家族在一个地区的繁衍发展历史。《甘棠堡琐志》为能够具体地考证家族世系,参考各氏族谱特列“氏族”一目,详述各家族的来龙去脉,又详列各族祠堂及祭祀活动。如林氏家族为甘棠堡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在《甘棠堡琐志》中就载有:“唐乾符二年(875)进士林嵩,居长溪赤岸。至宋元丰间(1078-1085)裔孙美和由赤岸迁本都斗南,再迁南塘,裔孙梅溪由南塘分迁堡之西门。建祠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坐亥向己兼壬丙。”

^[3]林氏家族尊奉唐代进士林嵩为始祖,林氏本支由宋元丰年间由赤岸迁入斗南,进而与陈、郑、金等家族围塘筑堡的迁徙过程一目了然。在修志过程中还据实考证,修正了个别家谱的错误。如刘氏家族有记“至明景德间……再迁本都于大排。”^[4]因为明朝只有宣德、正德和景泰年号,并无景德年号,所以应为宋景德年间。“氏族”中对于各姓家族历史浓墨重彩的描写,“宫庙”中对家族祠堂、宫庙建造和重修情况的详细记载,都带有宗族色彩的特殊印记,如前文讲到修筑“三塘”始末时,林、

^[1]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上,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2页。

^[2]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辑修甘棠堡琐志序,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1页。

^[3]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下,氏族,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6页。

^[4]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下,氏族,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6页。

郑、苏、陈诸姓合力筑塘，正是依靠自身的家族力量和政治地位得以实现的，这些均构成了《甘棠堡琐志》浓厚的宗族色彩。

从体例上讲，《甘棠堡琐志》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不分门类，杂陈史实，体例上更接近于清末民初的“乡土志”。著名的方志学家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曾指出修志有“三长”，即：“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1]，章学诚将“识足以断凡例”列为修志“三长”之首位，可见严其凡例可谓修志之第一要务。一般地方志为官方倡修，遵循一定的范式，有较为严谨的体例，《甘棠堡琐志》虽然同样以地域记载为中心，描述不同时期该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但是，在体例上却较为随意。《甘棠堡琐志》所载内容长则千言，短则片语，将该地的情况以文学（如《礼仪图序》、《论郊祭》及诗词等）、陈述（如《围筑土堡先后事由》、《请虎马将军香火路记》等）、列举（如《氏族》、《祥异》等）等方式展现出来，千姿百态，收诸笔端，内容颇为详实可观，具有相当水准的史料价值。

三、《甘棠堡琐志》的史料价值

《甘棠堡琐志》收录了自建堡以来较多的史料，无论是私人文件还是官方文书，群搜博采，或记游，或述异，或志人，或状物，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史料，其中，特别以倭寇和民间信仰史料最有特色。

1、对倭患和贼寇资料的记载。闽地宋元以来就有建造城堡的传统，明代中期福建沿海地区经常受到倭寇和海盗的侵扰，更加促进了具有军事防御性质城堡的建筑和发展。万历《福安县志》曾曰：“三塘堡：南塘、官塘、外塘，宜堡不宜邑”^[2]，道明了三塘所在区域在海防上的战略防御地位，甘棠堡从建堡之初就具有防卫倭寇侵扰的意图。因而在《甘棠堡琐志》中尤详于倭寇的记载，如“倭贼”中就详细记载了明嘉靖三十四年、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明崇祯九年，隆武乙酉二年（顺治二年），清顺治丙申十三年、丁酉十四年、戊戌十五年、己亥十六年、庚子十七年、辛丑十八年等共12次倭患和贼寇，如：“（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四月初十日，倭奴万余扎住仙亭山，攻陷福安县，鱼肉生灵，掳掠少艾，官居房舍，一炬焦土”^[3]，倭寇和贼寇的不时侵扰让百姓“乘夜奔走，恐莫言状”^[1]。三塘地区惨遭荼毒，

^[1]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修志十议，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1页。

^[2] 陆以载：《福安县志》，卷二，营缮志，乡堡，见于书目文献出版社编：《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991年11月版，第4页。

^[3]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下，倭贼，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39页。

“至三塘之地，概为瓦砾；男妇掳杀，奚啻千万！古称地利之雄，转为倭之行巢矣！”

^[2]除了对倭寇和贼寇侵扰的记载外，还有当地民众英勇抗击倭寇、贼寇，组织自救的记载。如：明崇祯九年，倭寇进犯白马门，海滨居民，遭受荼毒，次日，倭寇直入外塘，三塘男妇老幼闻风纷纷避难于青阳山、坑里堂、莲花山，甚至逃完外乡。是时，堡内组织哨丁乡男数十人出城，“贼闻知来势凶猛，丧胆入舟矣”^[3]，哨丁趋船追赶至长崎江对敌，后因火绳失顾，哨桶发火，勇士林洛九抱硝桶投水，英勇就义，全舟性命得以保存无虞。倭贼不谙于港道，弃一舟而逃。三塘勇士此举保全了三塘人民的安全，林洛九也因英勇赴死而被尊为“义勇”，立碑嘉奖。除此之外，甘棠堡内还组织民兵团练，分为外塘、南塘、上塘、港边四社，贼寇有所顾忌，不敢贸然侵扰。《甘棠堡琐志》所载百余年间甘棠堡遭遇倭寇和贼寇的史诗实，往事历历在目，对于如今我们加强海防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2、对民间信仰的记载。民间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甘棠堡琐志》较为侧重对于民风民俗的记载，因而保存了许多有关民间信仰的史料，很有代表性。据《地师方少山问答遗言记》所载，筑堡之初，当地人民曾请地师方少山为之规划，方少山观三塘堡后曰：“诸君三塘立堡，若符留馘，真福地也”^[4]，遂“画一城图”，为三塘堡谋城布局，并称：“依吾之议，万无一失。……秘教之言，诸君传示子孙而志之，他日庶见吾言之不妄耳。”^[5]被时人敬若神明，所以称其“此功德遍及三塘，千古不朽矣！”^[6]甘棠堡内各姓氏都有自己的寺庙和供奉的神灵，如薛家薛厝宫供奉忠平侯王、临水夫人；张家平水宫，王、陈两家的临水宫以及郑、陈共建的朝阳宫主要供奉五显大帝等。《甘棠堡琐志》列举了各姓的宫庙、祠堂，乡民虔诚礼佛遵行的不同风俗，如：《请虎马将军香火路记》中详细记录民国时期请虎马将军香火的全过程，《神仙灵显记》中描述五显大帝、五谷仙公以及马氏真仙显灵的事件。又如《旱魃》载：“清乾隆癸丑二十八年（1763），禾苗枯槁…在朝阳宫五显大帝座前，祈求顶礼。即日滂沱……十年丰登。”^[7]志书中还有一些关于神明的记载，使得整部志书融合族权、乡权、神权为一体，颇具特色和价值。

诚然，《甘棠堡琐志》是注重“琐”这个字，因而事无巨细，无不备载，内容涉

^[1]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下，倭贼，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39页。

^[2]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下，倭贼，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39页。

^[3]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下，倭贼，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39页。

^[4]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上，《地师方少山问答遗言记》，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23页。

^[5]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上，《地师方少山问答遗言记》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24页。

^[6]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上，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16页。

^[7]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下，旱魃，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44页。

及广，信息多。但是，作为民间组织编修的志书，《甘棠堡琐志》亦有其较为不科学的方面，如篇目设计方面略显杂乱，对迷信的记载笔墨较重，有些内容主观色彩较浓等等。然而，《甘棠堡琐志》呈现了甘棠堡围塘筑堡和繁衍发展的历史缘由及生活模式，保存了珍贵的地方史料，对研究甘棠堡这一区域历史而言价值非凡。

第三章 闽东地区旧方志的特点

关于方志的特点,谈论的文章很多,如朱士嘉先生在《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一文中有提出:地方志有四个特征: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又如来新夏先生在《方志学概论》一书中提出地方志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五大特征。再如梁寒冰先生在《关于编修新方志的几点意见》中提到:地方志要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而地域性和资料性则是地方志固有的特性。这几种说法,有共性亦有个性,可见,对于地方志特点的认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本章试从时代特点、地域特点、纂修者个人特点、方志演变特点四个微观层面予以阐述。

第一节 时代特点

古人云:隔世修史,当代修志。地方志记当代之事,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而地方志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特点的影响,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记。闽东地区现存的方志主要是明、清、民国三个时期所修,三个时代的不同特点在闽东方志中均有明显体现。

一、明代闽东方志的特点是“统”

明永乐十年,明政府曾颁布“修志凡例”17项^[1],依次为:“一、建置沿革、分野,二、疆域、城池、里至,三、山川,四、坊郭、乡镇,五、土产、贡赋,六、风俗形势,七、户口,八、学校,九、军卫,十、口舍,十一、寺观祠庙、桥梁,十二、古迹,十三、宦绩,十四、人物,十五、仙释,十六、杂志,十七、诗文”^[2]每条之下附有详细说明。其后,永乐十六年,明政府又颁降“修志凡例”21项,记载在正德《莘县志》中,内容与十年所颁凡例差异不大。此二则凡例与《明一统志》一起构成了中央对于地方志书体例的指导性意见,对闽东地区方志的内容和体例产生重大影响。如: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所修《福宁州志》,全书四卷,卷一目次为建置沿革、分野、邑名、疆域、形胜、风俗、城池、乡都、山川、土产、

^[1] 白寿彝《中国通史》作16项,经笔者核实,实为17项。

^[2] 李思悦:万历《重修寿昌县志》,《大明永乐十年颁降凡例》,其中八、九、十三项阙,据正德《莘县志》增补。《重修寿昌县志》和《莘县志》均见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数字方志)。

户口、田赋、贡办、徭役；卷二目次为公署、学校、宫室、坊表、津梁、坑冶、坛壝、祠庙、墓冢、寺观、古迹；卷三目次为历官、科贡、荐辟、恩例、武功；卷四目次为名宦、人物、烈女、仙释、文籍、景物、祥异、杂志。全志类目虽有略微调整，但基本与明政府所规定的修志内容一致。闵文振在《福宁州志凡例》中称：“分列条类，悉依《大明一统志》，遵王制也。但《一统志》志天下势当略，州志志一方宜详，如城池、乡都、田赋、科贡、荐辟之类，《一统志》所阙者，以次增入，其大书分书亦仿其例。”^[1]除了志例统一外，明季地志崇古、名目品类丛生、纲目混乱等痼习在闽东地区现存旧方志中亦有体现。如万历《福安县志》中，“人物志”之外又单列“名贤志”一卷，改“营建志”为“营缮志”，“职官志”为“历官志”，在文字和内容上也颇有崇古之风，语言晦涩难懂。如万历《福宁州志》，改“职官志”为“官政志”，增列“人文志”，并将“宦绩”归于“人文志”下，亦属有乖志体。

二、清代闽东方志的特点是“考”

清代是考据学发展的兴盛时期，以戴震、洪亮吉、章学诚、钱大昕及其所代表的地理派、舆地派、历史派和史地两性派对方志的性质进行论争，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进一步推动了方志理论的成熟。考据之风盛行成为清末方志的一大特点，在闽东地区旧方志中亦有明显体现。张景祁纂修的光绪《福安县志》博采史料，参阅《大清一统志》、《福建通志》、府志、州志，摘录、征引书目达120多种，颇有考据之风。如“进士”一目中载薛令之一条，下附按语：“韩昌黎《送南安欧阳詹》云：‘闽人举进士，自詹始。’考詹贞元八年进士，令之神龙二年进士，闽进士实自令之始。昌黎失检，岂以与詹同登，知有詹不知有令之耶？抑唐姚康《登第录》、李奕《登科记》俱漏令之名耶？然自昌黎一误，而蔡襄《题名录》与《唐史》俱误矣。”^[2]这则史料，张景祁考订出八闽第一进士为闽东薛令之，而不是韩昌黎所言的南安欧阳詹，并指出蔡襄《题名录》与《唐史》中的相应错误。又如：在“卷二十二，人物”“陈骏”后按语：“按《通志·儒林传》：陈骏，宁德人，字敏仲，号仁斋先生。乾道五年，郑侨榜进士，与《选举》所载福安陈骏，自是两人。又陈成父字玉汝，《通志》、《府志》均作宁德陈骏子，父子合传，与福安无涉，旧志

^[1] 陈应寅修，闵文振纂：《福宁州志》，凡例，见于朱鼎玲、陆国强主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5页。

^[2]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十九，选举上·科目·唐·进士，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第2页。

误收，今删之。”^[1]再如卷三十八“杂记”《宋文公文集》一条，在朱熹门人黄幹下加按曰：“福州黄幹字直卿，即勉斋；福安黄幹字尚质，皆朱门弟子。且福州‘幹’旁从‘木’，福安‘幹’旁从‘干’，字亦不同。”^[2]无怪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曰：“是书搜集既富，考核尤精，且逐条皆注出典。”^[3]如杂记类所引用书籍，若《闽书》、《全闽诗话》等多达数十种，参订之富，于此可见。而“其最足使人惬意者，尚不在其能增新，而在其且能补旧与订误。”^[4]

三、民国闽东方志的特点是“新”

民国时期，是一个战乱不安的多事之秋。尽管如此，闽东的有识之士从未停止编修方志。这一时期闽东方志大部分吸收延续明清方志的优良传统，而在技术、内容方面有所创新。

1、技术新。在技术方面，民国方志引进了摄影、制表、比例图等先进技术，主张图文并茂，重视数据统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方志中图、表的引入。如：民国《霞浦县志》中“霞浦县山川统系图”采用比例尺图绘制，再以树状图一一标明统属；民国《古田县志》中采用平面图来绘制“古田县政府”、“中山堂”、“玉屏中心学校”、“古田县中正公园”、“古田县立公共体育场”等，而不同于以往的手绘示意图，使得图示内容更加科学、规范、准确。在地理沿革的记述中，采用了表格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如：民国《霞浦县志》，卷首附“疆界沿革表”一张，横向列代别、县别、属地别、统属别、历代疆界别、历代说明别，纵向列唐虞、夏商、周、秦、汉、东汉、（三国）吴、晋、（南朝）宋、齐、梁、陈、隋、唐、（五代）梁、唐、晋、汉、周、宋、元、明、清、民国诸时代，透过“疆界沿革表”，霞浦一邑之疆域、统属、地名沿革一览而尽收眼底。同样，还有《霞浦县内江潮汐时刻一览表》、《霞浦县外海内江潮汐时刻一览表》、《霞浦县关隘一览表》、《霞浦县海口关隘一览表》，都起到清晰、明确、便捷的效果。正如章学诚所言：“图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则非图之所得概焉，是以随其形象之沿革而各为之图，所以使览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5]图表的应用，除了起到形象直观的作用外，还可起到“爽豁眉目，省约篇

[1]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二十二，人物，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第4页。

[2]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三十八，杂记，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第6页。

[3]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0，齐鲁书社，第271页。

[4]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0，齐鲁书社，第271页。

[5] 章学诚：《文史通义》：第三册，卷七，外篇二，《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2页。

章”^[1]的作用。

2、内容新。在内容方面，民国时期，闽东方志普遍注重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实业、物产等内容的记述，增加了外交、歌谣、方言、实业、建筑、城市、刑法等新门类，方志的语言也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浅显易懂，富有时代特点。民国时期，以警察代替衙役，出现了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交通工具、商业发展，对应的志书中就出现了新的内容，这些都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在志书内容上的体现。如：古田地处山区，陆路山岭崎岖，车不能通，水路溪险滩急，船不能行。古时候传递文书，运输货物均有赖于驿站、铺递与人力，往来以轿子代步，交通异常不便。民国时期，古田县各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在民国《古田县志》对应也增设“交通志”以记载交通发展情况：“今者公路纵横，汽车往复，而邮政电报、电话、飞机场、广播、收音机亦相继成立，消息灵通，往来便捷”^[2]；还增设“建筑志”记录古田县内各中心小学、初级中学校、国民学校的设立情况；民国《霞浦县志》中增设“警察志”、“实业志”、“交通志”、“司法志”、“外交志”、“金石志”等等，在“外交志”一门中记载反映清代霞浦民众与基督教会传教士之间激烈冲突的“教案”，如松山教案、涵江教案、姜宏图教案等，都反映了民国时期闽东民教冲突之频繁。民国方志中的新内容，正是清末民初社会变迁的事实在闽东地区志书中的体现。

第二节 地域特点

前及方志是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的，哪怕是同时期的方志，沿海和内陆，边疆与中原，所记述的内容和侧重点都各具特色。能否突出地域特点是衡量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闽东偏居东南一隅，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境内海拔在千米以上的山峰有 999 座，山路交通极其闭塞，清乾隆间，李拔知福宁府，在《道里图记》中写到：“予蜀人也，栈道剑阁之雄，实亲见之。先青莲公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其崎岖险隘未有如宁郡之甚者。”^[3]发出了“闽道更比蜀道难”的感慨。然而，与闭塞的山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闽东坐拥深水良港三都澳，海上交通极其便利。正是基于这种封闭性与开放性兼备的特点，较之福建省内同时期闽西、闽北的方志，闽东方志兼具山海特点。

附表 2：沿海与山区府志对比

^[1] 章学诚：《文史通义》：第四册，卷八，外篇三，《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年 3 月版，第 25 页。

^[2] 黄澄渊修，余钟英等纂：《古田县志》，卷十八，交通志，民国三十一年霞文江记印务局排印本，第 1 页。

^[3] 李拔：《乾隆福宁府志》，卷三上，地理志·疆域，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 3 页。

府别	山海别	赋税记载	兵防记载	祥异记载
福宁府志	沿海	户口、田赋、寺租、商 税（船税、关税）	海防一卷、城池、 土堡、关隘一卷， 兵制、塘汛、烽隧、 粮饷、屯所一卷	自然灾害 倭患、海难
建宁府志	山区	户口、土田、税粮	仅城池一卷	自然灾害 山地流寇作乱 倭寇入袭寿宁一条
汀州府志	山区	屯丁、贡料、四差、屯 田、驿站、榷政、税契、 仓储、籍田、盐课、恤 政	关隘、塘汛、民壮 合一卷	自然灾害 山地流寇作乱

上表的比较正体现了这种山海的差异：在赋税记载方面，《建宁府志》、《汀州府志》、《延平府志》均只有田赋记载，而《福宁府志》“赋税”一门除田赋、寺租外，还有商税一项，记载福鼎、霞浦、福安、宁德四个滨海县的船税和关税征收情况，分别体现出山地与沿海迥异的特点。在兵防记载方面，同为清代所修方志，《建宁府志》、《延平府志》均只记载城池、关隘、民壮等陆地防御，《福宁府志》则在地理志中单列一卷记述海防，而且内容颇为丰富，包括引用《明史》、《筹海图编》、《读史方輿纪要》等大量文献，考订海防，记载驻防情况、造船、倭患等史实。在祥异记载方面，《建宁府志》、《汀州府志》记述自然灾害，兼记流寇占山作乱等史实，颇具山地特点。仅在《建宁府志》“杂志”一门中有一条记载倭寇来犯史料：“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倭寇自浙江太顺县突入寿宁犀溪武（曲）地方，人遭杀掠。”^[1]而《福宁府志》“祥异”中，除记载自然灾害外，大量的篇幅记述海啸、海难以及明、清两朝倭寇自海上来犯，焚村杀人的血腥事实。如：《万历福宁州志》卷十六，“时事”中载正德三十一年，倭寇来犯一事：“三十一年倭百余掠古县，千户吴清往征，阵亡。六月，劫三沙。”^[2]此后，正德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均有倭患记述。不仅府志如此，闽东各县志中亦有大量与海洋有关的记载。从上述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自三国东吴在长溪设立“温麻船屯”始，闽东的海洋文化虽历经挫折，却从未断裂，这一地域特点在明、清闽东的方志多有映射。

地域特点的差异不单存在不同的州府之间，闽东地区各县之间也存在差异，这

^[1] [清]张琦主修，邹山纂：《建宁府志》，卷四十六，杂志一，兵氛，南平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 年 8 月内部印行，第 1077 页。

^[2] [明]殷之辂修，朱梅纂：《万历福宁州志》，卷十六，杂事志下，第十三-十四页，见于书目文献出版社编：《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 7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10 页。

在各县志书中也有相应体现。以民间信仰为例,在沿海的福鼎、福安、霞浦、宁德四县志书中,多长篇累牍的记载海神天后信仰,在靠山的屏南、古田、周宁、寿宁志书中,多记载山神、猎神信仰。如:民国《霞浦县志》卷二十四,“祠祀志”中记载天后庙修葺、天后信仰由来、历代褒封等,还描述了福宁天妃信仰的盛况。“其他官军、商贾往来海上者,罔不叠见显应,呼为‘妈祖’。庙貌遍于天下,而闽省尤盛,如福宁所建,固未足当大观也。而宁人每逢诞日,少长咸至,供献丰洁,冠履杂沓,诚诚恳恳,揆诸有感必通之义,神固无往而不在云。”^[1]据民国《霞浦县志》记载,仅霞浦一邑就有松山、下六都横山、三沙东澳境、三沙东关境、东冲、东冲下位塘、盐田下街七座天后宫,可见天后信仰在闽东沿海之盛况,也折射出沿海人民以海谋生的社会生活状况。而在闽东山区县志中多有山神、猎神、扶危济困神明的记载。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林公大王信仰。周宁、古田、屏南一带信仰最盛。如:民国《周墩区志》卷二“建置志·坛庙”载:“林忠平王庙,一在周墩西门内。……一在周墩东门内。……各乡皆有。神于宋时升华,肇迹杉洋,善搏虎,明封忠平大王。”^[2]据乾隆《宁德县志》、光绪《福安县志》记载:明清时期宁德北门外,碧山樟树下,周墩东门、西门,杉洋、瓮窑、浦源、萌源、端源、洋尾;福安潘溪镜岩、潘溪桥头锦水、桂林坂、甘棠鹤里、福安二十二、二十三都均建有林公宫,可见信仰之盛。“山哈”畲民每年都要到周宁县玛坑乡杉洋村林公宫祖殿求取一炉香火,以佑全村一年平安、兴旺。又如屏南的江夫人信仰,光绪《屏南县志》卷九“祠祀志·坛庙”中引用《玉田识略》载:“神江氏处女,年十七成道于石龙岗。能制猛虎。兄枢官宋御史,以王师平寇,夫人显圣助战,封九天巡按江氏夫人。”^[3]江夫人信仰在屏南盛行,时人称之为:“自来迄今,英灵未泯,孝子得援,咆哮莫逞。保民保赤,咸赖慈悲,临水之外,莫盛于斯。并称圣母,谁曰不宜?”^[4]在山区民众心中江夫人可以与扶危助产的临水夫人齐名。山区人民常年在山间耕作,常受猛虎袭击,所以,在闽东山区,志书中多载能保佑牲畜、搏击猛兽的英雄,甚至演变成为一种具有地域特点的信仰。这种沿海和山区在神明信仰上的不同既折射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也反映了两地地理位置的迥异,民众依照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塑造神灵,并以实用功利性的心态对待之。

[1] [民国]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霞浦县志》,卷二十四,祠祀志·天后庙,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40页。

[2] [民国]郑谟光修,陈赞勋纂:《周墩区志》,卷二,建置志·坛庙,民国二十七年(1938)排印本,第35页。

[3] [清]江若干修,黄学波纂:《屏南县志》,卷九,祠祀志·坛庙,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抄本,第111页。

[4] [清]江若干修,黄学波纂:《屏南县志》,卷九,祠祀志·坛庙,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抄本,第111页。

第三节 纂修者个人特点

地方志是资料性的著作，以记述事实为主，一般不参杂纂修者个人的观点。但是，纂修者个人的涵养、喜好，却通过语言风格、材料取舍等赋予地方志鲜活的个体生命和特征。试举三例说明之。

张景祁，浙江钱塘人。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武英殿协修。光绪三年，暂署福安知县，八年回署。由于张景祁曾位列史馆，修过史书，习知体例，使得乾隆《福安县志》成为闽东方志之佼佼者，是难得的精品。张景祁是著名的词人，《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收录了他的《一枝春》、《小重山》、《望海潮》、《曲江秋》等。他对谢翱十分景仰，又因谢翱曾寓居杭州，因而他在《福安县志》大量征引谢翱的诗文。

李拔于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任福宁知府，在其任上曾编修乾隆《福宁府志》，李拔关心文治，好舞文弄墨，吟咏诗文，闽东各地山水间常见其题咏、石刻。他对于诗文的狂热明显的体现在其主修的乾隆《福宁府志》中，仅“艺文志”一目收诗255首，又有“山川”、“水”、“古迹”三目共选用诗文367首，其中，李拔个人诗文约150首。在全志行文中，李拔寓诗词于山水古迹之中，使得全志文史并茂，充满文化气息。

冯梦龙，明末小说家，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升任寿宁知县。深受“三言”影响，在他编著的《寿宁待志》中，他用通俗的语言记述了许多离奇精彩的“公案”小说。如：卷下“劝诫”中记载了冯梦龙惩治恶霸陈伯进一事，先叙述陈伯进杀人越货的恶行，表达对其买通官府得以逍遥法外的痛恨，“陈伯进，……因与盗通家，道渐起，……遂为一方之霸。杀人屡案，皆以贿脱，固已弄官府于掌上矣。”^[1]再述官府在捉拿陈伯进中遭遇的阻挠，“县差至，阖其门，挈汤壶从楼窗灌下，溃面而返。”^[2]再述冯梦龙“亲往索之，而进纠西溪恶党朱仙堂等持挺相抗。”^[3]整篇文章通俗易懂，读来大快人心。如今在寿宁县还流传着许多冯梦龙断案的传说，如石桌案、审蛋案、断鸡案等等。冯梦龙特别重视记述寿邑风俗民情，卷上“香火”中描述寿宁民众马仙信仰，“六月十六日为马仙诞辰，县官设祭。里中岁聚敛为迎仙社月，置一

^[1] [明]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下，劝诫，第五十六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314页。

^[2] [明]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下，劝诫，第五十六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314页。

^[3] [明]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下，劝诫，第五十六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314页。

人谓之‘仙首’。自十二日迎之出宫，一日两斋，午斋则轮家供养，晚斋则架台于街次，鼓吹彻夜。如此三日，城中已遍，则往乡，又二日乃还宫。”^[1]冯梦龙以通俗小说家特有的诙谐生动的语言赋予了志书以鲜活的生命，使人顿生身临其境之感。整篇志书不同于以往的县志，写法简洁、明白通顺，详略得当，注重叙议结合，冯梦龙将文学手法运用到志书的编纂当中，使其成为一部雅俗共赏、饶有趣味的志书。正是这些文人学者、鸿儒雅士的参与，使得闽东地区旧方志被赋予了各具特色的鲜活生命。

第四节 方志演变特点

来新夏先生在《方志学概论》中称：“我国方志的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并认为，“《周礼·春官·外史》之‘外史掌四方之志’和《周礼·地官·诵训》之‘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中的‘方志’即是‘方志’一词的初见，可谓方志之起源。”^[3]尽管，学术界对于方志的起源仍处于众说纷纭阶段，但无论持何种观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方志最迟发轫于周秦，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地记、隋唐五代的图经，至宋代以降，融合图、志优势的方志逐渐形成了以文字记述为主要形式，以人物、文籍为主要内容的独特体裁，内容和体例也固定下来。元代的方志基本承继宋代并有一定创新，特别是纂修成《元一统志》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明、清两朝方志发展到极盛。

方志的发展演变始终贯穿着两条规律，一是方志内容所涵盖的领域逐渐扩展。方志在起源之初，是以记述地理、风俗为主的地理书。宋以后，方志才转向记录人物、文籍。明清时期，方志的触角不断扩展，逐渐触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及至民国时期，地方志记载内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民情，可谓包罗万象，蔚为大观。具体到闽东地区方志，亦是如此。为更为直观的展示闽东旧方志发展演变规律，笔者特绘制《不同时期州府志对比表》和《不同时期县志对比表》，具体如下。

附表3：不同时期州府志对比表

志别	卷数	门类	字数 (约)
嘉靖福宁州志	12卷	不分门，分元、亨、利、贞四集装订成册	缺4-6卷

^[1] [明]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香火，第十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62-263页。

^[2] 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页。

^[3] 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2页。

			35万
万历福宁州志 (二十一年本)	10卷	十门：舆地、营缮、兵卫、食货、历官、选举、名宦、人物、艺文、杂记	17万字
万历福宁州志 (四十四年本)	16卷	八门：地志、建置志、祀典志、兵戎志、食货志、官政志、选举志、人文志、艺文志、杂事志	25万字
乾隆福宁府志	44卷 首1卷 110目	十门：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食货志、学校志、秩官志、选举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	108万字

附表4：不同时期县志对比表

志别	卷数	门类	字数(约)
万历古田县志	12卷 88目	封域志、山川志、经略志、食货志(2卷)、官师志、秩祀志、文教志、选举志、人物志、恩遇志、艺文志(2卷)、杂述志	11万字
乾隆古田县志	8卷 47目	不分门，杂陈百科	25万字
民国古田县志	38卷 首1卷	疆界、纬候、大事、山川、水利、城市、建筑、名胜、户口、赋税、物产、度支、职官、学校、选举(上、下)、武备、实业、交通、刑法、外交、礼俗、惠政、祠祀、艺文(上、下)、金石、列传、儒林、文苑、独行、孝友、忠义、方技、循吏、列女、流寓、方外、杂录、小史	40万字

通过上表中不同时期州府志、县志的比较，可以发现地方志从简到繁的演变规律，时代越晚，篇幅和内容越繁。从卷数上看，明代方志一般为十多卷，清、民国时期，少则二十多卷，动辄三、四十卷，从类目上看，也是一个由少到多，由简入繁的过程，从字数上，更是显而易见，万历《古田县志》仅11万字，乾隆《古田县志》约25万字，民国《古田县志》40多万字，是其4倍。以上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上的体现，方志发展由简到繁更深刻地表现为方志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翔实，更加注重考订上。

二是方志类型逐渐增多。从体例上说，方志可以分为图经、记、传、志、录、乘、乡土志等几大类。按照行政区的不同，方志又可以分为通志、州府志、县志、乡土志等几大类。按照记载对象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山水志、寺庙志、场志、关志、土司志、卫所志、书院志等等，统称为专志。据朱士嘉先生统计：“方志各依历代地理沿革不同而异其种类，约举之，凡得二十二种……通志、都会志、路志、府志、道志、直隶厅志、厅志、直隶州志、州志、军志、监志、卫志、守卫所、宣慰司志、

关志、县志、设治局志、镇志、乡志、乡土志、里志、村志。”闽东地区方志的发展也符合这一特点。明清时期，闽东地区方志的种类日渐增多。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专、杂志。如：谢肇淛的《支提寺志》、《长溪琐语》、《太姥山志》，刘家谋的《鹤场漫志》，卓剑舟《太姥山全志》等。这些志书是对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州府县志的有益补充，如：刘家谋《鹤场漫志》，收录前人遗事、时贤佚闻、风俗物产等共157条目，后人对其评价甚高，称其可补宁志之不足。黄宗彝谓其“正旧志之伪事者十四五，补其未备者又十四五。志人志事，大则有裨风化，小则亦足以备一方之掌故。”^[1]这一评价甚为中肯。刘家谋《鹤场漫志》卷上援引林正青《榕海旧闻》，记述宋、元、明、清多条有关盗寇、大疫、干旱、飓风、雷击、雨雹、地震等数条自然社会杂记，可补《宁德县志》之不足，其中有关郑成功的过闽事件记录，尤为珍贵。“又《榕海旧闻》：顺治十年十二月，郑成功督师取罗源、宁德县，舟师至梅溪登岸，由飞鸾白鹤踰至罗源邑”^[2]，可补邑志之不及。清末民初，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清政府颁降《部颁乡土志例目》规定初等小学堂“故必有乡土志，然后可以授课”^[3]，并详细制定乡土志的编修例目。乡土志作为小学乡土教育教材应运而生，为方志大家族增添了新成员。乡土志虽为小学教材，但又具有一般教材所没有的编纂组织形式、体例结构、内容趋向，一般分历史、地理、人类、物产等等。清末民初，闽东地区亦有编修乡土志，然今仅福安、古田等县存。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闽东地区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方志呈现出“统”、“考”、“新”三大特点；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闽东地区的方志兼具海陆特点，鲜明的反映在海防、民间信仰等领域；受到编纂者的影响而各具特色，有的文史并茂，有的偏重考据；受到方志自身演变的影响，在单纯的字数和涉及内容上均呈现出由简入繁的规律性。尽管这些特点非闽东地区方志所独有，当恰恰都是受到时代、地理、编纂者和方志自身演变规律影响而具备的。

^[1] 刘家谋：《鹤场漫志》，黄宗彝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刻本，第1页。

^[2] 刘家谋：《鹤场漫志》，卷上，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刻本，第6页。

^[3] 《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方志大辞典》，（光绪）《部颁乡土志例（节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8页。

第四章 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文献价值及评价

笔者认为地方志研究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原因在于一些学者不能正确的区分史、志的关系,常常以“史”的标准苛求“志”,因而,近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于方志研究的热情有所上升,但地方志研究始终没有进入主流学术的视野。本章将在客观分析史、志关系的基础上,对闽东地区旧方志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存史”之功进行评判推介,以期引起人们重视,为闽东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第一节 正确认识史、志关系

要正确的评价地方志,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史和志的关系,其二,以何为标准来判断地方志的良莠。

首先,史和志的关系。史和志的关系是学术界长期争议并悬而未决的问题。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1]“志乃史体”^[2]、“方志为国史要删”^[3]这些观点均点出了方志与正史同源而异流的关系。要正确的评价一时、一地的方志,必须先弄清“史”、“志”的关系,建立正确的史志观。总的来说,史和志有几点不同:其一,从编纂体例来说,正史是“先纵后横”,即以时系事,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记述历史。而方志是“先横后纵”,即“横陈门类,纵列史实”,属于以类系事的体例。其二,从记述内容上讲,史侧重于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记述,史有主线,而志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政治、经济、人文、历史、自然、社会,包罗万象,内容宏富,即史简志繁。其三,史“详古略今”,以记述过去为主,兼及现在,资料主要来源于书籍;而志“略古详今”,以记述现在为主,兼及过去,资料来源于正史、政书、实地调查、采风问俗等。其四,史的功能在于“鉴”,重论述,重史观,因而,针砭时弊,评价得失,“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的主要作用在于“用”,重记述,重史实,因而,平铺直叙,不作议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那么志与史相比,其特征和优越性到底表现在哪里呢?笔者认为资料性是方志的首要特征,也正是方志的优越性所在。地方志所保存的资料较之正史有以下三点

^[1] 章学诚:《文史通义》,第三册,卷六,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3月,第4页。

^[2] 章学诚:《文史通义》,第四册,卷八,外篇三,《方志立三书议》,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3月,第3页。

^[3] 章学诚:《文史通义》,第四册,卷八,外篇三,《覆崔荆州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3月,第26-27页。

长处：其一，更加丰富详实。王世贞在《朝邑志·跋》中谈到：“古史之失在于简略，而方志之得在于详尽”^[1]，道出了方志在保存地方史料上的优越性。史简志繁，正史记一朝一代之事，叙事范围广，记述时间长，于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略有涉及但不深入，而方志则专记一时一地之事，具体而详实。因而，“各种社会制度之隐微递嬗，不见于正史及各书者，往往于方志中见之；历朝人物应登正史而未列，或在日无入正史之资格，而以今日眼光视之，其人靡重者，亦往往见于方志；遗文轶事赖方志以存者甚多；地方经济状况如工商各业，物价、物产等，其变迁多见于方志中；建置废兴，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2]地方志丰富详尽的史料加上代代传修的传统，使得地方历史得以传承和延续，起到保存史料，垂鉴古今的作用。其二，未加工。正史也有旁征博引古籍文献，亦有“存史”之功，但是，由于正史知往鉴今的作用决定其重史观，重视借用史料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正史中的资料往往已经经过作者解读，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内涵，属于经过加工的成品资料。而志中的资料，直叙本末，不作评论，不加褒贬，不添加主观色彩，客观记录史实，从而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解读史料提供了可能。其三、略古详今。俗语说：“隔代修史，当代修志”有其必然性因素，史家以观点立言，就难免对人对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下定论，在中国社会“盖棺定论”的传统下，于朝代尚未颠覆、事件尚未平息、当事者尚未死亡的情况下，对其评头论足，是不公允的行为，这就使得当代修史失去了现实可能性；而地方志以史实立言，不存在针砭时弊、评头论足的嫌疑，这就使得当代修志成为可能，“时近则迹真，地近则易核”^[3]，正是因为当代修志，所以记述之事，或为近闻，或为亲见，比较足以征信。这也正是地方志在“存史”上的优势所在。

“志即郡县之史也。然史之善者，称马迁、班固、陈寿、欧阳修诸家，而郡县之志未有为文士所脍炙者何？”^[4]既然地方志有上述诸多的优越性，为什么志书的影响远不如史书呢？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声音。其一，认为方志编纂者多为不具备

^[1] 王世贞：《朝邑志·跋》，转引自曾星翔、李秀国编：《中国方志百家言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2] 李泰棻：《方志学》，转引自曾星翔、李秀国编：《中国方志百家言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3] 章学诚：《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载于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23页。

^[4] 魏裔介：《重修广平府志序》，转引自曾星翔、李秀国编：《中国方志百家言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史才的乌合之众；其二，认为方志多有溢美乡邦，美化圣贤的嫌疑。其实，志书之所以不如史书，真正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受到地域范围的限制，魏裔介在《重修广平府志序》中将修史和修志进行了对比，从而得出志书不如史书影响之大主要在于志书记载的地域狭小，内容琐碎，名人、佳作不多。“其地狭隘，其事琐碎，其品行骏伟者不过数人，其文章卓犖者不逾数篇。即有龙门之高才，扶风之家学，摭摭网罗，终无以与瑰玮奇丽之观已。”^[1]其三是众手成志，得于全面，失于芜杂。因此，单一的一部志书很平常，整体的看又是弥足珍贵的，是其他著作不可取代的。

综上所述，要正确的评价地方志，就要把史和志区别开来，不以“史”的标准来苛求“志”，不用“非精英论”、“无见解”等“史”的标准来否定“志”。“夫以史料之根据，文章之典瞻论，方志诚不如正史，若论内容性质之记载，较合于现代应用，正史固未必绝对优于方志也。”^[2]与正史、文学作品相比，正史好比是碑塔，建筑，建成后逾千百年而不需刊刻；文学作品好比是江南园林，亭台楼阁，水榭回廊，而地方志好比是建筑材料市场上的建材，供研究者自行采购，不同的研究者阅读方志，会得到不同的启迪，对于史料的解读运用也会不同。如果你是一位好的建筑师，你会发现地方志中可供采摭的史料，俯拾皆是，将在方志这个建材市场中挖到宝藏，建成坚而不摧的建筑，反之亦然。

第二节 闽东地区旧方志的价值

地方志是以资料立言的，一部志书的成败得失都寓于资料之中。在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三大功能中，“存史”是其最基本、最首要的功能，其它功能均为派生出来并依附于“存史”功能而存在的，离开了丰富的史料，“资治”、“教化”功能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没有载体和依附的。因此，鉴别一部志书优劣，要看这部方志资料是否全面，编纂者对于资料的取舍是否得当，考证是否精确，编排是否合理。鉴于此，本节将着重从方志资料文献价值的角度出发，客观评价闽东地区旧方志。闽东地区旧方志作为闽东自然和社会发展历史的载体，保存了闽东地区的山川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尤其是自然领域的天象、物候、水文、地震、旱涝、灾异以及社会领域的经济、风俗、民情等，是对闽东历史进行微观研究最有效、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也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

^[1] 魏裔介：《重修广平府志序》，转引自曾星翔、李秀国编：《中国方志百家言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2] 吴宗慈：《论今日之方志学》，转引自曾星翔、李秀国编：《中国方志百家言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一、保存了许多闽东历代经济史料

闽东地区旧方志中诸如食货、田赋、户口、钱粮、物产、水利、人口、手工业、商业等门类专记一地社会经济情况,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地当时的农、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对保存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史料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是对闽东地区各县经济进行微观研究最有效、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有关农业方面的史料:中国古代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在“民以食为天”的社会利益驱使下,统治者重视农业发展,在科举考试中“重农”的论题多得难以计数。然而,与这种重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研究农业生产的著作极少,与时文、公牍相比,农业始终为下层,正如吴德铎先生所说,“在一个号称有数千年重农传统的我国古代思想学术界,有一个自相矛盾的怪现象:一方面,众口一词,无不推崇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像贾思勰、徐光启等脚踏实地的研究农业生产的著作却寥若星辰”^[1]。据李兹然《四库全书书目表》统计,共收书3462部,其中农家类只有10部,所占比例为0.28%。农业文献数量上本就稀少,再加之不受重视,大抵就只有佚失的命运了。因而,闽东旧志中对于当地农业的记载显得尤为珍贵,特别是一些躬身实践所得的经验,对于现在发展农业生产仍有借鉴作用。闽东地区旧方志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农业生产的文献。一些讲求务实致用的志书编纂者,如乾隆《福宁府志》的编纂者李拔,他认为:“夫所贵乎志者,非徒夸富丽,侈灵奥之谓,实有不敝之道,无穷之治焉”^[2],即修志不是为了浮夸争名,而是以有易于政事为目的的,大至疆域、城防,小至谷物、蔬菜,凡有益于民生者皆可收录。因而,他在志书中收录了诸如《福宁五县水利考》、《蚕桑说》、《种棉说》《种树说》等多篇经济类文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蚕桑说》中李拔指出养蚕必先树桑,按照压桑、子桑、花桑不同的种类授以树桑之法,中间还提及压桑和子桑的嫁接之法。在“养蚕之法”中,他除了教授养蚕之法外,还历数养蚕过程中的几大禁忌:先说蚕初眠醒来后,“初放食不可多,多则伤食,病死如螺,名为螺节。”^[3]又谈到蚕喜欢温暖,应该把蚕放在向阳洁净的地方,“毋使近阴暗及污秽、恶臭等

^[1] 吴德铎:《对金薯传习录的再认识》,载于农业出版社编辑部编:《金薯传习录·种薯谱合刊》,1982年10月,第179页。

^[2] 李拔:《福宁府志》,李序,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2页。

^[3] 李拔:《福宁府志》,卷三十八,艺文志·艺文说·蚕桑说,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41页。

物，犯则死者过半，若瘟疫然。”^[1]因此，蚕妇不进丧门，不吃蒜苗、韭菜等。接着还介绍了缫丝之法，有火丝和水丝之别，兼及湖州、蜀中的缫丝之法。又如《霞浦县志》的“物产志”、“实业志”中均有大量关于渔业的记载，卷十一“物产志”共介绍海产品91种，每种详列说明，如：“马鲛：青斑色，无鳞有齿，小者名剪眼，芒种、夏至时，沿海产之，尤以三都关井洋……为最盛，竹江一带渔民争往捕之”^[2]。卷十八“实业志”叙述农田、森林、牧畜、果业、茶业、靛业、矿业、渔业、蛎业、杂业、商业，其中尤其以得地利之便的“渔业”记载最为详尽，可见其发展之兴盛。在“渔业”一目中，对于霞浦县内渔业的总体状况进行了介绍，包含渔船种类、渔季、鱼饵、捕鱼方法、渔民信仰等等。有关于渔船的记载，如：“捕黄瓜鱼者曰黄瓜罟，黄瓜罟之船可载物百余斤，亦分春冬二季捕讨，船与钓船同船，须二艘，一大一小，渔民谓之姑母姑子”^[3]。此外，还有关于艍船、对舸等船只种类的记述。“艍船之用不拘春冬二季，所得多虾苗，其艍之孔甚小而密，长可六丈余，用法与黄瓜罟大异。”^[4]有关于渔季的记载，如：“分二季捕讨，二月至五月止，名曰春海，八月至明年正月止，名曰冬海。”^[5]有关海产品加工的方法，如：“乌贼上水，以小刀剖其腹，挖其卵与烟，将腹部摊开，伸其须，……晒于日，至于为度，谓之墨鱼”^[6]。有关于捕鱼之法的记载，如鱼的种类、渔时、鱼饵等等。还有关于渔民信仰的记载，渔民出海必先自天后宫延接香火置于船中，归来后，复往天后庙备礼酬神的记载。霞浦县土地贫瘠，居民以海为田，渔业乃霞浦县支柱产业，因此是志还收录了大量关于渔业的论说，如清拔贡张彦俦的《捕马鲛说》、张曲楼的《官井捕鱼》、郑鸿图的《蛎埔考》等等，均收录于《实业志》内，以彰其实用，其中所载捕鲛方法、插竹养蛎等经验知识对于今日闽东渔业发展仍有重要作用。

工业方面：闽东地区三国时期就设置“温麻船屯”，开八闽造船之先，晋代就能烧制砖瓦，唐代有酿酒制曲，宋元时期，境内冶银、制陶、造纸均已相当普及。明代闽东冶金业较为兴盛，志书中多有关于冶金的记载，如：据嘉靖《宁德县志》卷二记载，宁德县内有新兴铜坑、按岭铜坑、阳护山铁坑、八房后洋铅坑、李家铜坑、黄柏银坑、地龙铜坑、宝丰银场、宝丰铅场、宝瑞银场、车孟铜场共11个，包含银

^[1] 李拔：《福宁府志》，卷三十八，艺文志·艺文说·蚕桑说，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41页。

^[2]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十一，物产志·鳞属·马鲛，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16页。

^[3]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十八，实业志，渔业，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8页。

^[4]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十八，实业志，渔业，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8-9页。

^[5]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十八，实业志，渔业，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8页。

^[6]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十八，实业志，渔业，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9页。

坑、铜坑、铅坑、铁坑等等，详细记载每个坑场的地点、矿种、产量、兴废，甚至连驻兵情况都有记载。如：“新兴坑，在十都，银、铜、铅并输，亦名南屏峰坑。”

^[1]又如：民国《霞浦县志》中详细记载铁矿的冶炼之法：“绕以土，下有孔，层炭层沙，或至二十余担，以满炉为度。火壮铁熔，穿孔注地，为隍以贮之。既冰，以锤敲碎再炼作长方形，长六、七寸，阔约二寸，厚一、二寸，名曰‘铁砖’，实为生铁（笔者按：应为熟铁）。如以制器，尚须再四炉冶也（笔者按：四疑为回字）。”^[2]宋代，古田产铁盛极一时。《宋史·食货志·坑冶》载：全国“产铁之务二十，闽中三，汀州一，古田二。”民国《古田县志》载：“邑产之铁，甚有名于世界，据调查实业家言：‘可与罗马产品同等云’”^[3]，且不论这一记载是否具有过誉的成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闽东的钢铁冶炼行销世界，质量可与工业化的欧洲相媲美，足见明代闽东冶金业之发达。清末，马江造船厂用的就是古田生产的铁。”此外，民国时期的方志中还有大量关于桐油、制盐、造船等记载。

商业方面：特别是有关对外贸易、港口、海关和茶叶贸易等方面的史料尤为珍贵，甚至成为解决学术界争议的重要史料。如：近一二十年来，“甘棠港”的所在地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了甘棠港在福安一说外，还有人提出甘棠港在连江黄岐和福州港二说。然，闽东旧方志中多有关于王审知开凿甘棠港的记载，如：乾隆《福安县志》中有：“黄崎镇先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多覆溺，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尝欲凿之而惮于力役，乾宁五年，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言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甫往设祭，祭未毕，海内灵怪俱见，山甫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观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鬃赤，凡三日夜，风雷始息，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驿来以闻，赐号‘甘棠港’。”^[4]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对黄崎镇的记载：“北宋置，属长溪县。即今福建福安市东南下白石镇。明徙白石巡司于此。”^[5]在闽东的旧志中还有关于薛令之六世孙薛念为显应王的传说，亦可以互相佐证。诸葛计先生的《闽国史事编年》和廖大珂先生的《福建海外交通史》就是利用大量方志史料对甘棠港所在地问题进行了论述，引用李拔《福宁府志》和张景祁《福

^[1] 闵文振纂修：《宁德县志》，卷二，坑冶，见于《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四十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772-773页。

^[2]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十八，实业志，矿业，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7页。

^[3] 黄澄渊修，余钟英等纂：《古田县志》，卷十七，实业志，铁业，民国三十一年震文江记印务局排印本，第4页。

^[4] 侯谨度修，陈从潮纂：《福安县志》，摭遗志，第2-3页。

^[5] 史为东主编，邓自欣、朱玲玲副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309页。

《安溪县志》等方志,明确指出:甘棠港即福安白马港,从而使得“闽国何处甘棠港”这一问题得以解决。此外,闽东山地丘陵多,适合于种苧、种菁,特别以畲民种植最盛,闽东地区的旧方志中因而保留了大量关于种苧、种菁的记载,“苧,在县在乡皆有,惟十三都青岩村所出最佳,名丝苧”^[1]又“菁靛,旧志按:‘本县山场无论城郭乡村,除附近庐舍坟墓者始为民业,高山深谷俱官山也。’”^[2]其中“在县在乡皆有”、“无论城郭乡村”道出了苧、菁种植之普遍。“又有种菁之业,善其事者汀民也”^[3]所谓汀民即指畲民,畲民以种菁为生,成为了畲族由广东入闽,由闽西南向闽东北迁徙的外在动因。“西区平原之农常种靛,清乾、嘉间最盛。其货能通于浙温,乡民有以贩靛而致巨富者。”^[4]同光年间,台湾的靛输入,土靛渐渐失去市场。民国时期,洋靛输入中国,其色泽鲜艳,价格便宜,旧志载:洋靛的竞争力比土靛“强二十倍”,对土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洋靛易褪色,而土靛“永不退色,厥有特长”,若能改良方法,定能与洋靛一争高下,恢复销路。又有关于茶叶贸易的描写,特别是关于久负盛名的闽东坦洋工夫茶的描写,对于如今开发和推广坦洋工夫意义非凡。“桂香山,在坦洋,产茶甚美”^[5]“清同、光间,多办红茶,……绿茶售于京帮或天津帮,红茶售于洋商。其运赴也,从前以陆,其后以海,设行于三都、沙埕,茶季金融,颇足裨内山之生活,惜近来茶市衰矣。”^[6]

二、保存了许多闽东历代政治史料

闽东地区旧方志中诸如疆域、沿革、山川、城池、海防、军制、典礼、职官、选举等类目都是有关于政治的史料,特别是在“资治”情节的催生下,闽东地区旧方志中对事关政治的问题记载颇为详实。奏疏、公牒等政治史料的文献价值自然无需赘言,然而,那些从民间或地方的视角所保存下来的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显得更为真实,更为珍贵,甚至成为解决历史问题的唯一依据,可以补充、校正正史之不足。试举几例说明之。

[1] 卢建其修,张君宾纂:《宁德县志》,卷一,輿地志,物产,货属,宁德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83年12月点校本,第94页。

[2] 卢建其修,张君宾纂:《宁德县志》,卷一,輿地志,物产,货属,宁德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83年12月点校本,第94-95页。

[3] 卢建其修,张君宾纂:《宁德县志》,卷一,輿地志,物产,器物属,宁德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83年12月点校本,第95页。

[4]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之十八,实业志,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7页。

[5]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四,山川,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第5页。

[6]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四,山川,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第5页。

其一,明清闽东旧志中关于倭寇和海防的记载,可以补正史之阙,纠正史之谬。根据每个时代的政治关注点不同,志书的记载内容也会相应的有所偏重,从而保存下反映一个时代政治特点的丰富史料。嘉靖《福宁州志》修于嘉靖二十七年,彼时倭寇尚不猖獗,志书中关于海防的记载不多,自嘉靖后期,倭扰愈炙,志书中关于海防和倭寇的记载明显增多。明万历四十四年所修《福宁州志》中就单列五、六两卷为兵戎志,专记海防。卷五详述卫署、屯所、厂隘、烽燧、关隘、粮饷情况,卷六详述兵戎。据卷五记载,可以还原当时福宁卫的指挥使司的驻防情况。“福宁卫指挥使司,《正统志》在县治东,今儒学左,旧资寿寺也。洪武十三年,江夏侯周德兴为防倭设。成化五年,指挥同知张武撤,新之。正堂五间,经历司在正堂左,镇抚司三间在仪门西,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在东西六房后,每所有百户十所,今废。经历宅六间在堂东;知事宅六间在堂西;军器局五间在堂西北。旗纛庙在堂东,今改卫堂后。千户所,后左右耳房各二间,东北一间仪仗库,西二间货藏库。后堂五间在正堂后,仪门五间在正堂南,谯楼五间在仪门南,六房十八间在堂前,东西厨舍二间在堂西。嘉靖四十三年重建鼓楼,万历七年分巡李公乐檄指挥朱珪重修耳房。公馆三间仪门东,仓廩三十座,教场在西门外均桥。”^[1]根据是志记载,可以全面了解闽东海防设置情况。详细叙述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及教场的位置,从中可知,大金千户所在五十二都,教场在西门外周一里;定海千户所在连江地方,教场在东门外周一里;左营在西门外,右营在南门外,福宁营在东门外。也可以反映出为了抗击倭寇侵扰,福宁卫的驻防力量不断增强。不单州府志如此,在闽东各县志书均有丰富的海防、倭患的史料,较之正史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加之,由于“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使得闽东方志中的海防和倭患史料尤为珍贵,有些史料甚至可以纠正明代官修史书的谬误。如: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有一段关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的记载:“(嘉靖)三十九年正月,贼陷永宁卫。陷宁德县,参将王梦祺、知县李尧卿与战,死之。”^[2]而在万历四十四年版《福宁州志》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如下:“四十年三月倭据云淡门,十月防守宁德参将冯镇掣所部兵二千回福州。时参将冯镇、王梦麒帅兵四千守县北广福岭……梦麒遁入城。既而冯镇掣所部兵二千回福州……二十日,倭百船以三大车攻宁德,战三日,壮士林应桂、孙文璘、林文逵死之。十二日,宁德城陷,知县李尧卿死之,训导孙商伟骂贼而死。

^[1] 殷之辂修,朱梅纂:《福宁州志》,卷五,兵戎志上,第二-三页,见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73页。

^[2] 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3页。

十二月，倭寇复入县，焚余屋。署印，照磨。屠大贞被执。”^[1]显而易见，万历《福宁州志》中的记载更为详尽，除了详略差异之外，两段引文记述的时间和人物亦有出入：《筹海图编》所记此事发生的时间为“三十九年正月”，而万历《福宁州志》为“四十年十月”，相差两年多；《筹海图编》所记此时的参将为“王梦祺”，而万历《福宁州志》记为“王梦麒”。究竟谁对谁错呢？笔者查阅了《明实录》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嘉靖四十一年二月辛未）巡按福建御史李廷龙奏：‘去年十月中，海寇破宁德县，参将王梦麒、知县李尧卿自城上御之，皆死’”^[2]。《明实录》此条记录的是嘉靖四十一年二月福建御史李廷龙的奏折，奏折中所说的“去年十月中”与万历《福宁州志》一致，参将“王梦麒”亦与万历《福宁州志》一致。因此，应该可以证明关于此事的记载，《筹海图编》有误。这个案例正是地方志可以补正史之阙，纠正史之谬的生动注脚。

其二，闽东旧志中保存了明清天主教传播、“中国礼仪之争”、“禁教事件”等珍贵史料。明朝末年，天主教传入福建，由于传教士反对福建耶稣会尊重中国礼仪的做法，禁止当地天主教徒保留祭孔、祭祖等维护封建君权和三纲五常的礼俗，康熙年间，曾经在闽东福安境内引发震惊中外的“中国礼仪之争”。清政府下诏驱逐传教士，禁止传教。至乾隆十一年，以福安地区的“禁教”事件为导火索，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禁教”事件。这次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宗教事件在乾隆《福宁府志》中就有记载，是志中收录李拔的《晓谕福安民人崇奉天主教自首免罪教》一文，以白多禄、冯文子、林凤仪三个例子，告诫福安民众不要信奉天主教。“从前白多禄一案，斩绞大辟，囚系累累；又有冯文子一案，笞杖徒流，死亡相继。何物林凤仪，身列成均，乃胆敢于屡创之后，私藏教具，违例念经，现已拿获，身幽囹圄，窘辱万状。他日升天堂，尚未可必；此时入地狱，已无可逃。覆辙相寻，迷而不悟。哀此愚蒙，伊于胡底？”^[3]此外，李拔还在《福安学宫记》中号召士人要为乡民起表率作用，习圣人之学，以正风俗。“夫以崇奉天主教之故，干犯刑宪，是欲邀福于死后，而已贾祸于生前。人虽至愚，当不出此。然覆辙相循，迷而不悟，何哉？正学未明，民心陷溺，甘受其害而不知也。故欲正风俗，莫先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先于讲正学。”^[4]除了官方的奏折、批文和民间的谱牒外，这是唯一有记载这次“福安

[1] 殷之辂修，朱梅纂：《福宁州志》，卷十六，杂事志，第十七页，见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412页。

[2] 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92页。

[3] 李拔：《福宁府志》，卷四十，艺文志·教，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48-49页。

[4] 李拔：《福宁府志》，卷十三，福安学校·福安学宫记，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第37页。

禁教”事件的志书。记载内容可与《清史编年》等官方记载相印证：“是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福宁府福安县崇奉天主教者甚多，竟有西洋夷人传教，现已获到西洋人费若望、堂主陈廷柱等，并搜出画像、经卷，严审办理。得旨：‘办理甚妥’”^[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拔于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任福宁知府，乾隆《福宁府志》始修于乾隆二十四年，终于乾隆二十七年，距离“禁教事件”发生仅十年时间，记述内容非常之准确、可信。“中国礼仪之争”影响极为广泛，近年来学术界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并做了深刻研究。如张先清所著《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 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就是利用了大量闽东方志的史料，描述了 17-19 世纪福安天主教的发展状况以及官府、宗族和天主教传教士、教徒之间的互动。

其三，闽东旧志中关于畚族的记载，对于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畚族，自称山哈，哈是客的意思，即山里客人。畚族自唐乾符三年（876 年）起开始向闽东北山区迁徙，根据其分布的特点，畚族聚居地主要在人迹罕至、土地未垦、政府控制薄弱的县际、乡际、村际地带，这样的选择，一是以土地资源利用为导向，一是以躲避徭役为导向，因此，畚族向闽东北的迁徙地最先选在古田县，然而，闽东地区畚族却主要分布在福安、福鼎、霞浦、宁德四个滨海城市，而屏南、古田、寿宁等山区城市反而没有出现畚族大量聚居的现象。缪品枚先生在《畚族迁入闽东的两次历史契机》一文中，引用大量方志、族谱资料，提出康熙二十二年闽浙沿海“展界”是畚族由山区向沿海迁徙的历史契机。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六月十九日，清政府为断绝沿海居民给占领台湾的郑成功予以接济，采用浙闽总督屯泰意见实行“迁界”，据《霞浦县志》记载：“至十八年，督抚苏尚书，李部院疏请移民，以绝接济之根，编篱立界，滨海人民悉迁界内，越界者斩”^[2]。清政府的这一“迁界”政策对闽东地区的沿海贸易、沿海人民的生计造成巨大损失，以至于“田庐荒废，鱼盐失利，百姓流离，惨不可言。”^[3]至康熙二十二年，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祥、将军施琅，平定台湾，郑克爽归顺，海氛始靖。于是，清政府“下诏开界，民归故土，沿海居民，竞绘姚、吴诸公遗像祀之”^[4]，“福宁州复土流民，给照开界，内港复业采捕。时，竹江、沙洽、洪江、砚江、青山、台澳等处先后报复给照矣”^[5]。

^[1] 李文海：《清史编年》，第五卷，乾隆朝（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40 页。

^[2]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三，大事志，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 17 页。

^[3]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三，大事志，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 17 页。

^[4]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三，大事志，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 17 页。

^[5]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三，大事志，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 17 页。

于是,畬族民众纷纷向土地富足的沿海地区迁徙,这次山区向沿海的迁徙,基本上奠定了目前闽东畬族的分布格局,据光绪《福安县志》记载:乾隆年间,福安境内33个都,除去七都外,其余32都216村都有畬民居住,“二、三都:上下天里、铁湖、满洋、车头、白坑、岭门二宅、廉岭、牛角垄。……三十六都:马山、下林洋、王家墓、拓边、溪尾大茶洋。”^[1]根据这一记载,可以清晰的还原清代畬族人民在福安的分布情况。此外,闽东旧志中还有诸多关于畬汉民族融合的记载:如万历《福安县志》载:嘉靖三十八年,倭寇自福宁至柳溪,进犯福安。时福安改筑新城未完,北城垛墙未砌。再则官吏偷盗硝磺以矾代之,銃、弩等武器装备破败不堪,官员配备不齐等诸原因,福安城被攻陷,詹镐被捕后,“骂不就缚,被刎死;陈国初,骂贼,被肢解;上杭陈氏一族守北门,死伤无数。”^[2]这其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官员还下令“召畬人为战”^[3],体现畬、汉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侮。著名的抗清名将刘中藻麾下就有诸多骁勇善战的“菁寮”、“苳寮”、“畬寮”等三寮将士。

三、保存了许多闽东历代文化史料

闽东旧志中诸如风俗、祠祀、方言、选举、人物、古迹、艺文、书院、津梁等都是有关于地方风土人情、民居古迹、人物事迹的记述,均属于文化范畴。

1、闽东旧志中关于闽东方言的记载,在语言学上具有重要价值。“方言”,在辞海中解释为:“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4]。闽东地区在古代被称为蛮夷之地,最早为闽越族住地。三国时期,东吴以武力镇压越人后,吴人逐步从浙江会稽山南下到闽北开发,由此也带来了上古时期的南方汉族方言。此后,随着北方避难人口的逐渐增多及汉族和闽越族的互动,形成了如今的闽东语系,广义的闽东方言区包括现福州市、宁德市所辖行政区域,共18县市。本文仅以现宁德市所辖行政区域,即狭义的闽东地区来论述。闽东地区旧方志中关于方言的记载少而精,对于研究闽东方言与上古语的异同有重要作用,如:《福鼎县志》卷二“风俗”后附有“方言”一目,记录福鼎方言古音40余条,每条下附考证,多征引古籍,考订颇为详实。如:“俭

^[1]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之三,疆域,各都畬民村居,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第9-11页。

^[2] 陆以载修,陈晓梧纂:《福安县志》,卷九,杂记志·祥变,第十四页,见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2册,第21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3] 陆以载修,陈晓梧纂:《福安县志》,卷九,杂记志·祥变,第十四页,见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2册,第21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4] 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8月,第925页。

约曰作家”^[1]，下附按语：“《晋书·食货志》：汉灵帝言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私畜。”^[2]又如：“器用曰家私”^[3]，下附按语：“《续汉书》：灵帝造万金阁以为私藏，复寄小黄门常侍，家私钱至数十万。”^[4]又有“雨曰辅”、“来曰厘”、“火曰燬”等，均附有考证。旧志中记录的许多古音，现今仍在使用，对闽东方言中的古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又如：刘家谋《鹤场漫志》中也有许多方言的记载，如：“屋曰厝，音如判，考《汉书·地理志·五方杂厝》注：‘厝，置也。’《佩觿集》注：‘厝，安也。’皆与屋义合。庄子《逍遥游》注：‘义何厝，心于其间哉，厝心犹室心也。’”^[5]同时，因为刘家谋为侯官人，他认为两地方言大同小异，“今胪其异者如左，以俟志方言者。”^[6]后又列举“未曰昧，味亦曰昧也”、“闽曰蛮”、“呼舅如古”、“米一斛曰一箩”^[7]等条目，更是研究闽东语系中的南北差异的宝贵资料。除了闽东方言的通行区外，闽东地区还存在一些方言岛，如畲族聚居地通行畬语，福鼎县西北部乡村、霞浦县三沙渔村、宁德碗窑村等沿海村落通行闽南方言。这在闽东旧方志中亦有记载。乾隆《宁德县志》载：“本邑因由碗窑之业，漳、泉、兴等处无业之民萃二都，以造碗谋食”^[8]。漳、泉、兴均为闽南方言区，三地民众在二都碗窑村制造瓷碗、生活、定居，并与当地民众融合，从而使得碗窑村成为了闽东方言区的“插花地”。

2、闽东旧志中关于寿宁廊桥的记载，在古建筑尤其是桥梁建筑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廊桥是一种稀有的桥梁建筑形式，采用贯木拱廊，桥上还加了顶，可行人，可过车，也可在此避雨。廊桥主要分布在山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山区，当地先民为了生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崇山峻岭中留下一座座蜿蜒的彩虹桥。据统计，全国现存木拱廊桥还不到200座，且大量分布于闽东北的寿宁、屏南、周宁、古田、政和等地，又以寿宁最负盛名。目前，寿宁县境内保存有19座廊桥，有飞云桥、仙宫桥、升平桥、登云桥、溪南桥、四洲桥、单桥、小东上桥、小东下桥、杨梅州桥、红军桥、福寿桥、翁坑桥、张坑桥、中村桥、长濂溪桥、尤溪桥、杨溪头桥、鸾峰桥，数量居全国首位，而且年代古老，曾被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冠以中国桥梁史上的“侏罗纪公园”之美誉。近年来，廊桥的研究逐步引起学术界重视，寿宁还举

[1] 谭抡：《福鼎县志》，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卷二，风俗·方言，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第7页。

[2] 谭抡：《福鼎县志》，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卷二，风俗·方言，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第7页。

[3] 谭抡：《福鼎县志》，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卷二，风俗·方言，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第7页。

[4] 谭抡：《福鼎县志》，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卷二，风俗·方言，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第7页。

[5] 刘家谋：《鹤场漫志》，卷上，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刻本，第8页。

[6] 刘家谋：《鹤场漫志》，卷上，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刻本，第8页。

[7] 刘家谋：《鹤场漫志》，卷上，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刻本，第8-9页。

[8] 卢建其修，张君宾纂：《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器物属，宁德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83年12月点校本，第95页。

办了两届“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寿宁两部现存的县志中关于廊桥的记载颇多也极具史料价值。如：崇祯《寿宁待志》载：“升平桥至永清桥，溪水有鱼，或青或红，水清可数，名曰‘神鱼’。人不敢取，取之致疾。每淘米，群鱼趋食，全不畏人。若过桥，则取之无禁。”^[1]又如：康熙《寿宁县志》载：“仙宫桥，在城南外，懿政行祠前”，“懿政行祠”即马仙宫，祭祀闽东山地保护神马仙姑。“升平桥：在城东天顺年建，扁曰：‘东作桥’，后圯于水，知县梁元杲重建。”^[2]又“永清桥：在城西，正统年建，扁曰：‘西成桥’，后嘉靖二十四年改建城内。”^[3]——交代了寿宁县境内古廊桥的历史变迁、桥内祭祀神明等。

3、闽东旧方志中保留了大量关于民俗的记载。闽东地区旧方志保存了许多有关婚丧嫁娶、时令节序等习俗。闽东地区的婚俗保留了较多远古的习俗，“议婚纳币颇循古礼而独不行亲迎”^[4]，迄今为止，这种“嫁娶不亲迎”的习俗在一些地方仍有遗存，家中老人认为新郎、新娘结婚前一天起不宜见面，结婚当天新郎不亲迎，以免对冲，有些地方甚至规定在新娘进门的时候，新郎、公婆、小叔子、小姑子还需回避，以免“对冲”，日后容易斗嘴，影响家庭和睦。除了常态的婚俗之外，还有几种特殊的婚礼。即“从吉”和“阴配”，“已订婚者，于亲丧百日内草草迎娶，不受贺，不宴宾，谓之‘从吉’”^[5]，“阴配”即冥婚。节序方面，《霞浦县志》中有关于中秋夜曳石之俗的记载，相传明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倭寇扰宁，戚南塘参将援兵出安、宁两邑，殆尽，倭寇拟于中秋夜乘虚攻城，参将不得已以曳石计疑之”^[6]，这一计谋使得倭寇闻风胆丧，而城得以保全，为了纪念戚将军以曳石计保城护民之功，每年中秋夜，中下层民众将平面石用麻绳系好，石上坐一健儿以号令禁止，由百数十人纤之快跑，民众沿街呐喊，观者塞途，“间或两石对冲，则互相争道，摩拳擦掌，甚至各受重伤而不恤。”^[7]《甘棠堡琐志》中亦有关于曳石的记载，“中秋夜妇女月下奉供，丁男街道拔驴”^[8]，所谓“拔驴”其实就是曳石。

4、闽东旧志中保留了许多有关民间信仰的史料。闽东历来就有“崇神信巫尚鬼”的风气，在各县方志中均有是俗的记载，神明信仰之风颇盛。其中沿海各县以天后

[1]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之上，香火，第二页，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63页。

[2] 赵廷珣：《寿宁县志》，卷二，建置，津梁，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刊本，第9页。

[3] 赵廷珣：《寿宁县志》，卷二，建置，津梁，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刊本，第9页。

[4] 侯谨度修，陈从潮纂：《福安县志》，卷十一，风俗·婚姻，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刊本，第2页。

[5]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二十二，礼俗志，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2页。

[6]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二十二，礼俗志，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9页。

[7] 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民国霞浦县志》，卷二十二，礼俗志，民国十八年排印本，第9页。

[8] 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下，《十二月乡俗》，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第65页。

妈祖等海神信仰为盛，而山区各县以林忠平王、江夫人等山神、猎神信仰为盛，此外，还有城隍、齐天大圣、临水夫人、马仙、火神等信仰，许多神明往往是从会巫术的巫师演变而来，相当有趣。以临水夫人信仰的记载为例。如万历《古田县志》《艺文志》中保留的《临水顺懿庙记》，由古田人张以宁撰于明洪武年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临水夫人陈靖姑记载的最早的文献。“古田东去邑三十里，其地曰临川，庙曰顺懿，其神姓陈氏，肇基于唐，赐敕额于宋，封顺懿夫人。英灵著于八闽，施及于朔南，事始末具宋知县洪天锡所树碑。皇元既有版图，仍在祀典，元统初元浙东宣慰使都元帅李允中实来谒庙，瞻顾咨嗟，会广其规，未克就绪，及至正七年，邑人陈遂尝掾大府，慨念厥初状神事迹，申请加封，廉访使者亲核其实，江浙省臣继允所请，上之中书省，众心颺颺翹俟嘉命……”^[1]。从是篇史料中可以了解到陈靖姑生前为巫，能够呼风唤雨解救旱灾，为祈雨而坠胎，过度劳累致死，死后在古田临水乡显灵，发誓要为女性助产，成为“扶胎救产，保赤儿童”的妇女、儿童保护神，从临水夫人的传说和演变中，可以觅见闽东“信巫尚鬼”的遗风。从是篇史料中可以得知，古田县临水庙建于唐代，由此可以推出，关于临水夫人的信仰在唐代后期就形成了。在宋代的时候，朝廷赐予庙额和“顺懿”夫人的封号，从而使得临水夫人从地方的女神上升为官方的神明，自此，临水夫人的信仰逐渐从古田向福建、台湾、东南亚各地辐射。临水夫人在闽东的信仰非常之盛，是仅次于妈祖的第二女神，几乎各个县均设祠祭祀，香火鼎盛。

综上所述，可知，由于地方志体例上的横排特点和编修上的延续性，使得地方志既可横陈百科，又可纵观千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有些甚至可以补充校正史书典籍之不足。当然，由于旧方志多出自封建社会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官员之手，受到阶级和时代的限制，多有歌功颂德、隐恶扬善之弊端，加之，受到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地方志多有附会鬼神、压抑人性的恶俗。如：《甘棠堡琐志》“孝行”条目下，张舜一、繆月娥、刘维金、陈秀玉四位孝子，均以“割肉”这一自残身体的方式表达孝意。其实，“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2]，“生事奉养”才是一位孝子最核心的责任，但在方志编修者看来，越是极端，作为榜样，其昭示的力量就越强。兼及志书中“孝子”、“列女”、“节妇”等条目的设置，完全可以看出统治者用一种极端方式，达到压抑人性、维护统治的企图。然而，

^[1] 刘日昉修，陈荐夫、林春华等纂，王继续修，丁朝立、魏炆等续纂：《古田县志》，卷十二，艺文志·临水顺懿庙记，万历四十三年刊本，第26-27页。

^[2] 胡平生译注：《孝经译注》，庶人章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8月版，第11页。

瑕不掩瑜，闽东旧方志的文献价值是不容掩盖的。因而，我们在对待旧志时，应该以一种“扬弃”精神对待之，挖掘其有益于现代化建设的“精华”，舍弃其有悖科学、迷信无知的“糟粕”，就必然能使地方志在科学发展和经济建设上发挥巨大的效益。

结论

本文根据预期的论文架构，大致完成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闽东地区历代旧方志的概况进行梳理，形成了一份《闽东地区现存旧方志目录提要》（附录1），并对《福建地方文献和闽人著述综录》、《福建省地方志普查综目》所载方志目录有所增补；二是精选三部具有特色的旧志，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对其成书背景、体例特点、学术价值及作者的修志思想进行研究探讨，达到了以个案管窥全貌的目标；三是基于与同时期的省志、州府志、县志、部门志的比较，结合时代、地域、编纂者以及方志本身的演进规律，分析总结出闽东地区旧方志的特点；四是在分析史志关系的基础上，对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文献价值给出中肯恰当的评价。由于受到文章篇幅和笔者能力限制，本文研究尚不够深入，如在价值方面，主要探讨了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文献价值，对于其现实价值涉及较少，所幸笔者对地方志研究兴趣颇浓，暂且留待日后再深入，亦可略为弥补斯憾。

由于地方志体例上的横排特点和编修上的延续性，使得地方志既可横陈百科，又可纵观千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有些甚至可以补充校正史书典籍之不足。闽东地区现存的旧方志作为闽东自然和社会发展历史的载体，保存了闽东地区的山川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尤其是自然领域的天象、物候、水文、地震、旱涝、灾异以及社会领域的经济、风俗、民情等，是对闽东历史进行微观研究最有效、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其功用价值已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然而，笔者以为，这种关注热度还远未接近沸点，一则反映为“读志”、“用志”的普及性不高，目前方志利用仍限于专业研究人员领域；二是当前的方志队伍良莠不齐，后辈力量匮乏，专业素养有待提高，这反映在方志整理上就体现为志书中出现数数据有差错，前后事实叙述矛盾，时间、地点、人物不符合事实等情况，严重影响修志工作效率和志书的质量；三是政府的重视不够，旧方志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缺乏强大的后盾支持和必要的经费保障，发展举步维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也是闽东地区旧方志利用方兴未艾的根本原因。这就需要政府将方志事业纳入整个文化建设范畴，在经费、人员、政策、制度上予以支持。

尽管，由于旧方志多出自封建社会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官员之手，受到

阶级和时代的限制，多有歌功颂德、隐恶扬善之弊端，加之，受到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地方志多有附会鬼神、压抑人性的恶俗。然而，瑕不掩瑜，闽东旧方志的“资政、教化、存史”的功用价值是不容掩盖的。近年来，随着闽东地区旧方志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对解决“中国礼仪之争”、“清末禁教”、“三都澳历史”、“廊桥古建筑”、“倭寇”、“海防”、“甘棠港”等学术问题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促进作用，其功用不可忽视，对闽东地区旧方志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必将有益于弘扬闽东的优良传统和资源优势，必将助力于闽东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附录 1 闽东地区现存旧方志目录提要

方志提要约发轫于宋代，一般认为以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为鼻祖，但并非专记地方志的，最早的方志提要专目当属清乾隆年间周广业《两浙地志考》，今已佚。现存最早的为瞿宣颖的《方志考稿（甲）》，目录提要专目主要是对志书的卷数、作者、内容、得失进行评价。降至清代，在考据之风的影响下，方志提要以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独特功能而备受推崇，形成了许多综合性方志目录提要书，特别是大家熟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收录各类方志 417 种，每种前均有提要，综合介绍志书的名称、卷数、版本、体例、价值、得失等诸多内容，犹如一台台的方志“导航仪”，为用志者提供一个概况性的了解。笔者才疏学浅，初探方志，今效仿前辈学者为经眼之闽东方志做一提要，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嘉靖]福宁州志十二卷

（明）谢廷举修，陈应宾、闵文振纂

明嘉靖十七年（1538）刊本

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由知州谢廷举主修，学正陈应宾、宁德县训导闵文振纂修。全书共 12 卷，卷首附图 13 幅，依次为州县总图、州境图、福安县境图、宁德县境图、州城图、福安县城图、宁德县城图、州治图、福安县治图、宁德县治图、州学图、福安县学图、宁德县学图。全书分元、亨、利、贞 4 集装订出版，每集 3 卷，缺卷四至六卷。元集载地理民事，亨集载营度制置，利集载职制科贡，贞集载人事文物。是志为宁德地区现存最早的全区性地方志，门类基本完备但较为混乱，如“人物”之外单列“寓贤”、“仙释”、“列女”，“选举”之外又列“科贡”、“荐辟”、“恩例”，实属体例失当。

今宁波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刻本 9 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刻本 7 卷，福建省图书馆存胶卷，上海图书馆藏胶卷本。

[万历]福宁州志十卷

（明）史起钦修，林子燮等纂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知州史起钦，延邑绅林子燮等在嘉靖志和隆庆志（今已佚失）基础上增补成书。是志卷首附图 13 幅，前有史起钦序，后有林子燮《福宁

州志后序》，全志共分十门，依次为輿地、营缮、兵卫、食货、历官、选举、名宦、人物、艺文、杂记，类目删繁就简，体例得当，尤其难得的是增加了兵卫一门，弥补旧志之不足。

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各藏刻本 1 部，上海图书馆藏胶卷本，福建省图书馆藏复印本 1 部。另见于《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 册。

[万历]福宁州志十六卷

（明）殷之格修，朱梅纂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本

明万历四十四年，知州殷之格主修，朱梅、俞有益纂修，全书 16 卷。分輿地志、建置志、祀典志、兵戎志、食货志、官政志、选举志、人文志、艺文志、杂事志 8 类，下设子目。卷首为历代州府志旧序、修志姓名、凡例、目录、府及属县图。

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1990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此影印出版。上海、北京、福建和福建师大等图书馆藏残本（10~11 卷）。

[乾隆]福宁府志四十四卷首一卷

（清）李拔纂修

清光绪庚辰郡署刊本

《福宁府志》由分巡道朱珪修，知府李拔撰。李拔，字清翹，号峨峰，四川犍为州人，乾隆辛未进士。是志始修于乾隆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付梓，是志记载起于东汉末年孙吴置温麻船屯到清雍正十二年升州为府以来一千七百多年间宁德全郡的历史。全志四十四卷首一卷，分十门一百一十目。卷首为府及属县图、序、旧志序、修志姓名、修志凡例，正文部分依次为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食货志、学校志、秩官志、选举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诸志前皆有论，论述颇为精辟。李拔乃一代名流，颇工于地方志乘，他主张修志要“贵效用、重经济”，因此是志资料翔实、粲然可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志“有详核赅善之称”。

故宫博物院明清部、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存有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本。福建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存有光绪六年（1880 年）张其曜重刊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据乾隆二十七年修光绪六年重刻本钞本。另见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 74 号。

[嘉靖]宁德县志四卷

(明) 闵文振纂修, 陈^復订正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刻本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 宁德县训导闵文振纂修。卷前有邑人骝山陈序、目录、凡例、图等。全书四卷, 卷一目次为建置沿革、分野、邑名、疆域、形胜、风俗、城池、乡都、山川、土产、户口、田赋、贡办、徭役; 卷二目次为公署、学校、宫室、坊表、津梁、坑冶、坛壝、祠庙、墓冢、寺观、古迹; 卷三目次为历官、科贡、荐辟、恩例、武功; 卷四目次为名宦、人物、烈女、仙释、文籍、景物、祥异、杂志。是志在类目设置上, 大体皆备, 唯阙水利、兵防, 不重海防, 未免有损志书的完整性, 类目完备但层次安排欠妥, 如卷四收名宦、人物、列女、仙释、文籍、祥异、杂志, 颇感体例杂乱。

北京、上海、南京图书馆存胶卷。浙江天一阁存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第41册。

[万历]宁德县志八卷

(明) 舒应元修, 陈琯纂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刊本

明宁德县知县舒应元修, 邑人陈琯等纂。舒应元, 字及吾, 南昌人, 隆庆元年丁卯科举人, 万历十一年由副将除授直隶池州府建德县儒学教谕, 十七年己丑三月, 内升宁德县知县。是志始修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 志首列舒、陈二序, 咸谓县志首创于嘉靖初年闵兰庄所修, 厘为八卷, 首舆地志, 次食货志, 次建置志, 次历官志, 次选举志, 次人物志, 次艺文志, 次杂志, 凡八纪五十八目, 时号信史。此志门类, 悉依《闽志》, 又略有创新, 体例严谨, 搜罗宏富, 纪风土、田赋、秩官、人物, 其间盛衰耗废之故, 增益前志之缺略甚多。如: 旧志未立艺文志, 是志始立, 下附宸翰、表疏、经训、文籍。进一步完善体例, 一改旧志以目统例, 今皆以纲领目, 如灾祥载舆地, 宦绩入历官, 文籍归艺文, 遗事、旧迹、异闻等事无统属, 并收入于杂志, 条理清楚, 层次分明。然, 是志不载武备、兵事, 征引文献均不标明出处, 亦属有乖著作之法。

[乾隆]宁德县志十卷首一卷

(清) 卢建其修, 张君宾、胡家祺纂

清乾隆四十六(1781年)刊本

清宁德县知县卢建其修, 晋江县举人张君宾等纂。卢建其, 号莲浦, 浙江仁和

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举人，四十四年任宁德知县。是志是宁德现存的年代最近最完整的一部志书，始修于乾隆四十五年，次年付梓，记事止于四十八年。全书四十余万字，记载了自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建县以来宁德一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十卷，首一卷有序、修志姓名、发凡、起例，正文分九门，依次为輿地志、建置志、秩官志、赋役志、学校志、兵防志、人物志、艺文志、拾遗志。其中，篇幅上较侧重于人物、建置、輿地、艺文等，赋役、拾遗、兵防较为简略。《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云：此书“于纪事之载于通志、府志、旧志者，皆注明见于某志；又于各志之立异者，并注明某志作某，以便考核，皆深合著述之法。惟典礼附之学校，选举附之人物，方志之体，似有未妥。艺文不载书目，仅杂录奏疏、诗文、又不尽属于一邑之事，皆斟酌未当者也。”^[1]

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清乾隆四十六（1781）刊本。1983 年宁德县志编纂办公室据此点校出版。

[万历]福安县志九卷

（明）陆以载主修，陈世理主纂

明万历二十五（1597 年）刻本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福安知县、举人陆以载主修，县人陈世理主纂，全书 9 卷，藏日本前育德会尊经阁文库。是志前有序、修志姓名、修志文、修志凡例、图经，正文依次为輿地志、营缮志、兵食志、历官志、选举志、名贤志、人物志、文翰志、杂记志。是志为福安县现存最早的县志，全志以九卷为纲，列卷以类编开条为目，众目中或以都图远近相次，或以年代先后相次，或以人物品格高低相次，颇具条理，然惟纲目较为混乱，如：人物志之外又单列名贤志一卷，改营建志为营缮志，职官志为历官志，亦属有乖志体。

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另见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崇祯]福安县志九卷

（明）巫三祝主修，陈晓梧主纂

崇祯年间版

是志由福安知县、进士巫三祝主修，县人陈晓梧主纂。巫三祝，广东龙川人，崇祯元年戊辰进士，崇祯四年辛未入守斯邑。是志初修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重修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至崇祯十一年戊寅成书。凡九卷，卷一輿地志，卷二营缮志，

^[1]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 20，齐鲁书社，第 282 页。

卷三兵食志，卷四历官志，卷五选举志，卷六名贤志，卷七人物志，卷八艺文志，卷九杂记志。是志搜罗较为详备，然在体例编排上略失精当，如：以差役列入市镇，人物之外又单列名贤志一卷，亦属体例失当。此外，易职官为历官，改营建为营缮，亦属有乖志体，为明季地志之痼疾。

现北京图书馆存有 2 部。

〔乾隆〕福安县志三十卷

（清）程志洛主修，张伯漠主纂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稿本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福安知县陈志洛主修，教谕张伯漠主纂，全志 30 卷，未刊行。

今存于北京市图书馆。

〔乾隆〕福安县志二十六卷首一卷

（清）侯谨度主修，陈从潮主纂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刊本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福安知县、举人侯谨度主修，县人、解元陈从潮主纂。全志 26 卷、首 1 卷，卷首图考，正文依此为分野、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田赋、物产、学校、祀典、礼仪、风俗、职官、公署、军制、祠庙、名宦、选举、人物、列女、古迹、艺文、祥异、摭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编参稽《闽书》及通志，颇称该备。”^{〔1〕}

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均有刻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有手抄本。

〔道光〕福安县志十二卷

（清）刘之藹主修，陈拔、杨进才主纂

清道光十二年（1832 年）刻本

清道光十二年（1832 年）福安知县、举人刘之藹主修，县人贡生陈拔、杨进才主纂，全志 12 卷，卷一：图考、分野、建置沿革、疆域；卷二，城池、海道、桥梁；卷三：山川、田赋、恤政、物产；卷四：学校、祀典、礼仪、风俗；卷五：职官、公署；卷六：军制、武职；卷七：祠庙、名宦；卷八：选举、人物；卷九：列女、古迹；卷十：艺文（上）；卷十一：艺文（下）；卷十二：祥异、摭遗、杂记、氏族。

^{〔1〕}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 5，齐鲁书社，第 69 页。

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大图书馆均有残本和抄本。

[光绪]福安县志三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张景祁、徐承禧主修,张景祁主纂 黄锦灿纂

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

是志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始修,光绪十年付梓,由福安知县、进士张景祁、主修,张景祁主纂。张景祁,钱塘人,翰林院庶吉士。是志分为六册本和十二册本,十二册本为首刊本,六册本为补刊本,增加了氏族志,因此,六册本全志38卷,加首、末各一卷,共为四十卷,目次为星野、沿革、疆域、山川、城池、田赋、物产、学校、典礼、军制、风俗、职官、公署、名宦、选举、人物、孝义、文苑、流寓、隐逸、列女、方技、古迹、艺文、祥异、杂记。是志博采史料,大量汇集了《大清一统志》、《福建通志》、府志、州志中的资料,颇为详实;编目次第编排合理,体例完备。加之纂修者张景祁等颇具文采,使得是志文史并茂,流传较广。但是,也存在裁删不当等问题,如崇禎志的兵食志、艺文志等颇具史料价值之内容被部分删减,实属白璧微瑕。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云:“是书搜集既富,考核尤精,且逐条皆注出典”^[1]。如杂记类所引用书籍,若闽书、全闽诗话等多达数十种,参订之富,于此可见。而“其最足使人惬意者,尚不在其能增新,而在其且能补旧与订误”^[2]。艺文志所载书目极繁,且有考证,皆此书精审之处。

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均有藏书。1986年4月,福安县地方志编委会整理重印。

[光绪]福安县乡土志二卷

(清)周祖颐编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师京华书局排印本

是志由周祖颐编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京华书局排印出版。全志二卷,上卷为历史部,人类部;下卷为地理部、物产部。历史部以政绩、兵事、耆旧等门隶属之,人类部以户口、氏族、宗教、实业等门隶属之,地理部以山水、道路等门隶属之,物产部以动植物、矿产等隶属之。因乡土志定位为启蒙用书,内容较为简单。

北京大学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均有存书。

^[1]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0,齐鲁书社,第271页。

^[2]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0,齐鲁书社,第271页。

[万历]古田县志十二卷

(明)刘日旸修,陈荐夫、林春华等纂,王继祀重修,丁朝立、魏炆等续纂
万历四十三年刊本

是志是古田现存最早的县志。明万历年间,由古田县令刘日旸原修,全书共十二卷(志),80余目,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纂成。万历三十年(1602年),县令王继祀续修,对前志加以增补完善,于万历三十四年编修成《古田县志》十四卷,志前有张以宁、刘日旸、王继祀三篇序言,正文目次为封域志、山川志、经略志、食货志(2卷)、官师志、秩祀志、文教志、选举志、人物志、恩遇志、艺文志(2卷)、杂述志,共88个编目,约11万字。后附《本县修志申文》、《本县重修志申文》、《后序》2篇。

据郑宝谦先生考证,是志藏于北京图书馆,福建省、北京、上海、南京图书馆均有缩微胶卷本收藏;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有刻本,其中,《官师志》为抄配;福建师范大学藏有手抄本六册。1987年,古田县方志委据福建省图书馆藏胶卷手抄成全志,分五册装订收藏。

[崇祯]玉田识略八卷

(明)杨德周纂修

明崇祯刻本

玉田,即今古田县。明崇祯六年(1633年),由县令杨德周编纂,除杨德周、余文龙等写的三篇序言外,全志38个编目,10万余字。门类偏窄,从四卷到八卷尽是题咏、文集、传略、补遗,记述地方史实资料较少。

“文化大革命”前,丁桃溪藏有手抄七至八卷残本。今收藏于福建师大图书馆。1986年,县方志委办公室以省图书馆所藏胶卷放大手抄全书一至八卷,分订四册收藏。

[乾隆]古田县志八卷

(清)辛竟可总修,林咸吉、蓝孙璇等纂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刊本

是志由县令辛竟可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修纂成书,全志除卷首序言、凡例、目录外,正文共计8卷,47个编目,约25万字,卷一曰星野,曰建置,曰疆域;卷二曰城池,曰公署,曰山川,曰风俗,曰物产,曰水利;卷三曰户口,曰赋役;卷

四曰学校；卷五曰坛庙，曰兵制，曰职官，曰名宦；卷六曰选举，曰人物；卷七曰寓贤，曰孝义，曰文苑，曰乡行，曰隐逸，曰艺术，曰列女，曰释老，曰艺文；卷八曰古迹，曰祥异，曰杂记，凡三十门。志前附有县境全图、城图、县治图、学宫图4幅。是志在前志基础上补遗考订，增加了水利、艺术等门类，体例更为完备，难能可贵的是重视保存水利资料的功用和价值；将诗文附列于各门，艺文志一门专载著述，编排更为合理。资料翔实，颇为精审。

福建师范大学藏有台湾的缩印本，福建省图书馆藏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木刻版本，另外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西等省、市图书馆亦有收藏。另见于《中国方志丛刊·华南地方》第100号。

[光绪]古田乡土志略不分卷

(清)曾光禧总纂，徐应麟、林炳光、陈蔼等编辑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排印本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县令曾光禧编纂。全志不分卷，内容仅陈述乡土、历史、人物、政绩、姓氏等，共1.8万字。

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均藏有木刻版本。1986年古田县方志委办公室向福建省图书馆复印一本收藏。

[民国]古田县志三十八卷首一卷

黄澄渊修，余钟英等纂

民国三十一年震文江记印务局排印本

民国九年(1920年)，古田县成立修志局，发起修志，几经周折，未成。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县长黄澄渊主持编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成书，全志共38卷，40多万字，卷首附录新旧序言9篇，目次依此为疆界、纬候、大事、山川、水利、城市、建筑、名胜、户口、赋税、物产、度支、职官、学校、选举(上、下)、武备、实业、交通、刑法、外交、礼俗、惠政、祠祀、艺文(上、下)、金石、列传、儒林、文苑、独行、孝友、忠义、方技、循吏、列女、流寓、方外、杂录、小史(跋附)。是志除学校、选举、杂录外，其余门类与乾隆版相比，增补不多。

今见藏于古田县图书馆、档案馆，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

[民国]霞浦县志

(民国)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

民国十八年排印本

是志由县知事罗汝泽于民国六年(1917年)始修,几经断续,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由县长刘以臧继续修,徐友梧总纂而成。全志凡8册,40卷,50多万字。全志目次为疆界表、纬候表、大事志、山川志、水利志、城市志、建筑志、名胜志、户口志、赋税志、物产志、度支志、职官志、学校志、选举志、警察志、武备志、实业志、交通志、司法志、外交志、礼俗志、惠政志、祠祀志、艺文志、金石志、循吏传、宦哲传、武功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孝友传、义行传、隐逸传、流寓传、方技传、方外传、列女传、杂录。霞浦历史上为福宁府治所在,曾多次编修州府志,然是志为霞浦名县以来唯一的县志,实为创修。是志体例上大抵遵照福建通志局所颁志例,体例较为完备,类目较为齐全。卷首诸图皆以新法绘制,较为科学、准确,疆域、沿革、关隘、潮汛等,除文字表述之外,皆以表格辅之说明,一目了然。是志增设大事志记录乾隆二十七年以来县内大事,增补水利、科名等内容,内容丰富,体例新颖,资料翔实,深受国内外方志专家所推崇。

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藏有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另见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102号。

[嘉庆]福鼎县志八卷

(清)谭抡修,王锡龄、高昊纂

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

是志为福鼎建县以来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旧志,由福鼎县令谭抡于嘉庆十一年(1807年)召集文人修纂成书,全志共8卷,计28万字,志前有序、纂修姓氏、凡例、目录,记载福鼎县疆域沿革、山川名胜、风俗物产、艺文人物等方面情况,是研究福鼎历史的珍贵史料。

南京图书馆存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存抄本。另见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23号。

[乾隆]屏南县志八卷

(清)沈钟纂修

清乾隆五年(1740)刊本

屏南知县沈钟主修,沈钟,号鹿坪,江南武进人,康熙戊子举人,乾隆元年来宰斯邑。此志成于清乾隆五年。卷一曰分县始末,曰绘图,曰星野,曰建置沿革,

曰疆域，曰城池，曰公廨；卷二曰学校；卷三曰坛庙，曰铺递，曰官邸，曰官师，曰兵防，曰山川；卷四曰桥梁，曰都图；卷五曰风土，曰赋役；卷六曰职官，曰武弁，曰名宦，曰科目，曰人物，曰列女，曰古迹，曰墓宅；卷七曰寺观，曰物产，曰节序；卷八曰艺文，曰杂记。是志是屏南县建县以来第一部方志，有清一代，屏南县曾4修志乘，而刊行的仅此一部，其余的或毁或仅存稿本，因而是志对于研究屏南一邑政治、经济、历史沿革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志卷首为序文、原题部复、宪纲、附录《治屏管见》、凡例、姓氏、目录，正文共八卷，计四十多目，其中卷一附图13幅。福建省图书馆存沈宗良增修本，内容、下限与是志无异，只加沈宗良自序《小引》，据学者考证，通志、州府志中并无沈宗良其人，疑问无从稽考。

故宫博物院明清部存清乾隆五年（1740）刊本，福建省图书馆存清乾隆十七年（1752）沈宗良增补刊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抄本。

[道光]屏南县志六卷

（清）梅鼎臣修，陈之驹纂

清道光九年（1829）稿本

是志修于清道光六年（1826），分四十目，依次为图考、建置沿革、疆域、山川、海防（无）、户口、田赋、水利、城池、关隘、津梁、古迹、公署、学校、祀典、祠庙、兵制、武功、驿传、铺递、监法、钱法（无）、榷政（无）、蠲政（无）、土贡（无）、蕃市（无）、职官、选举、封荫、政绩、人物、列女、隐逸、塚墓、寺观、典籍（无）、金石、风俗、物产、祥异（原书误作“产”）、杂识。是志在沈志基础上有所增补，颇为翔实。然而，是志杂陈四十目，尚未统成门类，稍显杂乱，其中海防、钱法、榷政、蠲政、土贡、蕃市、典籍七个目有目无文，又以著述附录于政绩，流寓附录于人物，在人物之外又别立列女、隐逸等目，亦不合方志体例。

福建省图书馆存清道光九年（1829）稿本，本馆存抄本。

[光绪]屏南县志十卷

（清）江若干修，黄学波纂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抄本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屏南县令江若干主修，黄学波纂。全志共十卷，依次为天文、地理、建置、食货、学校、职官、选举、祠祀、艺文、杂志，凡十门，三十余目，其中人物志缺略，志后附有沈钟《治屏管见》一文。是志在继承沈氏志书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删裁，门类齐全，体例完备，是屏南县志中资料最丰富、最完

整的一部志书。但是，江氏《屏南县志》卷七“职官”中“训导”只记到道光七年，卷八“选举”中的“科目”，优贡 43 人仅列入 17 人，缺略较多；艺文志所录不够精审，连篇累牍，滥竽充数，亦是白璧之微瑕。

故宫博物院明清部藏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抄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存复印本。

[民国]屏南县志三十一卷

何树德修，黄恩波、张宗铭纂、陆章铨续纂

民国三十年（1941 年）稿本

是志民国九年（1920）由何树德始修，三十年（1941）由陆章铨续修，全志三十一卷，依此为纬候表、地理志、大事志、山川志、水利志、城池志、建筑志、名胜志、户口志、赋税志、物产志、度支志、职官志、学校志、选举志、武备志、实业志、刑法志、礼俗志、祠祀志、人物志、杂志。

福建师范大学藏有稿本抄本。

[崇祯]寿宁待志二卷

（明）冯梦龙纂修

明崇祯十年（1637）刊本

是志为寿宁县令、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宦游寿宁期间所作，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志书。不以“县志”命名，而称之为“待志”，体现了冯氏的谦逊和严谨。全志共两卷，卷上依次为：疆域、城隘、县治、学宫、香火、土田、户口、升科、赋税、恩典、积贮、兵壮、铺递、狱讼、盐法、物产、风俗、岁时；卷下依次为里役、都畝、官司、贡举、坊表、劝诫、佛宇、祥瑞、灾异、虎暴。志后还附有旧志考误，颇具考据之风。是志保存了寿宁县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土人情，是研究寿宁县历史和冯梦龙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颇具文献价值。

是志今仅见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1984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据此排印出版。另见于《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 册。

[康熙]寿宁县志八卷

（清）赵廷玑修，柳上芝、范大廷纂

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刊本

清寿宁县知县赵廷玑修，教谕王锡鹵等纂。赵廷玑，浙江山阴人，康熙二十四年来守寿邑。是志共八卷，分八门，四十八目，依此为地輿志、建置志、食货志、

官守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云：“此书仓卒成编，未免失之潦草。分列类目虽无巨谬，然叙述则简略特甚。志学校，但有学宫、义学、学田，而无书院学额；纪风俗，则但列岁时，无关民俗；纪官守，则但举其姓氏，而不载其任期；又无武备志，致兵制、兵事皆不可考，则尤其疏漏也”^[1]。

上海市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有清康熙间刻本。

[民国]周墩区志六卷

郑谟光修，陈赞勋纂

民国二十七年（1938）排印本

周墩区，即今周宁县。是志始修于民国六年（1917），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成书，是周宁县唯一的志乘。是志记述时限止于民国六年，共分六门，每门下注小引，目次为舆地志、建置志、秩官志、人物志、艺文志、拾遗志。

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市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七年（1938）排印本。另见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23号，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抄本。

[光绪]甘棠城志

刘廷赞主纂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修纂，为甘棠镇第一部地方志。由甘棠刘廷赞主纂，手抄本宣纸书写，布封面，14开本。1990年6月在外塘首次发现残本。

甘棠堡琐志

（清）陈一夔主纂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

甘棠例贡陈一夔主纂。陈一夔，号金华居士，世居甘棠。《甘棠堡琐志》所载内容长则千言，短则片语，事无巨细，无不备载。其中尤详于氏族、祠堂、宗庙、信仰等，是研究甘棠堡的历史重要参考史料。但是，作为民间组织编修的志书，《甘棠堡琐志》亦有其较为不科学的方面，如篇目设计方面略显杂乱，对迷信的记载笔墨较重，有些内容主观色彩较浓。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本，该志分上、下册。印行300部，铅印本。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各藏1部。

^[1]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0，齐鲁书社，第281页。

长溪琐语一卷

(明) 谢肇淛撰

民国二十二年(1933) 福建龚氏大通楼抄本

谢肇淛, 字在杭, 长乐人。明万历进士, 官至工部郎中, 以广西右布政使终, 为知名藏书家、文学家。《长溪琐语》著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为作者于闽东游历时所作。长溪即福宁的古称, 治所在今霞浦县内。是志仅一万多字。记载了闽东的山川风物、名胜古迹、民风民俗、逸闻轶事等。《四库提要》称其曰: “是书杂载山川名胜及人物故事, 间及神怪, 盖亦志乘之支流也。”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福建龚氏大通楼抄本一册。此书未见刊本, 即抄本传世亦属罕见。(古学汇刊第二集輿地类)

鹤场漫志二卷

(清) 侯官刘家谋纂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刻本

鹤场, 今宁德县。是志为刘家谋在宁德教谕任上所作, 分上、下两卷, 收录前人遗事、时贤佚闻、风俗物产等共 157 条目, 志前有黄宗彝、谢章铤序各一篇, 自序一篇。后人对其评价甚高, 称其可补宁志之不足。

福建师范大学馆存抄本一册, 另收录于《芑川先生合集》。

支提寺志六卷

(明) 谢肇淛纂

清同治十一年(1873年) 刊本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存有清同治十一年(1873年) 刊本。

支提寺山志六卷

(清) 崔嵒修, 清释济明增补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刻本

崔嵒字殿生, 号五竹, 尝修宁德县志。支提寺在宁德境内。《支提寺山志》记述了支提山的渊源, 系列山峰中四十八峰峰名之由来和形胜, 支提山华藏寺自北宋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 建寺以来千余年的兴衰史, 历代住持高僧的传记, 达官显贵、骚人墨客吟咏支提的诗文等, 为我们留下了解和研究支提山名胜和佛教传播的重要史料, 同时提供了研究宁德县人文历史的珍贵的资料。

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存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刻本二册。

太姥山志一卷

(明) 史起钦撰

太姥山在福宁州境，传尧时有老母采蓝，后得仙去，故以为名。中有钟离岩、一线天诸胜迹，起钦因创为此书，成于万历乙未。前列图，次列记序及题咏之作。然山以岩壑、寺宇为主，法当分门编载，起钦但为总绘一图，悉不加分别论次，非体例也。

太姥山志三卷

(明) 谢肇淛纂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本

太姥山位于福建东北端福鼎县境内。古名才山，相传尧时有老母种兰于山中，逢道士得仙去，故以太母名之，后改名太姥。是志修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全书3卷，2.9万字。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卷上为太姥山历史、沿革、景物，卷首附六图；卷中为记，多为名人游太姥山后记，如《太姥山游记》、《慧名塔记》《岩洞庵置香灯田碑记》，其中乾符中林嵩记为最古之作；卷下为诗，篇幅约为全书二分之一，多为古近名人吟咏太姥风光之作。书中附图十幅，书前有万历乙酉谢肇淛《修太姥山志引》，是为序。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有存目。

福建省图书馆存三种版本：清嘉庆五年(1800)福州慕园书屋刊本、清光绪十五年(1889)莲川望云居刊本、清光绪江本侃抄本；1964年，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据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本抄一册；《国家图书馆藏中华山水志丛刊》，山志卷，第33册。

太姥山续志三卷

(清) 福鼎王孙恭辑

清光绪江本侃抄本二册

王孙恭，字恪亭，福鼎人，任政和县训导。是志修于清光绪辛丑年(1901)，全书三卷，卷上为名胜、物产、寓贤、方外、艺文(古体诗)；卷中为艺文(今体诗)；卷下为艺文(赋、序、记)。是志仿明代谢肇淛《太姥山志》所作，并对谢氏志书详加考订、纠错补遗，如：增加物产一目，介绍太姥山特有的物产，特别是介绍了许多常用中药品种。

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存清光绪江本侃抄本二册。

太姥山指掌一卷

(清) 邱古园辑

清光绪江本侃抄本

是志修于清乾隆甲子年(1792), 全书 7000 余字。书前有王世昌序和自序各一篇, 正文部分介绍游历太姥的路线、景点以及从各种不同角度所领略风光等。读此书犹如在一位资深导游引领下饱览太姥风光。

福建省图书馆存清光绪江本侃抄本抄本一册。

游太姥山图咏

(清) 林树海辑

清道光十三年(1833) 同安林树海刊本

《游太姥山图吟》由林树海修于清道光十三年, 收录多为好友应邀之作, 以游记、吟咏为主。

福建省图书馆藏清道光十三年(1833) 同安林树海刊本一册。

太姥山全志十八卷

(民国) 卓剑舟编纂

民国 31 年(1942 年)本

卓剑舟, 福建福鼎人, 闽东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太姥山全志》修于民国 31 年(1942), 全志共十门: 名胜、寺宇、志目、金石、仙梵、田赋、人物、方物、杂缀、艺文, 全书 18 卷, 12 万字。是志前有序 5 篇, 题词 13 篇, 自序 1 篇, 凡例 1 则, 书后附录清邱古园辑《太姥指掌》及王栻等人的题跋。是志编纂历时五年, 参考明万历谢肇淛《太姥山志》、曹学佺《輿地名胜志》、州府志、县志等凡七十种, 并对其考证修订, 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记载颇为精审。

福建省图书馆存民国 31 年(1942 年)本。

参考文献

一、方志

- 1、[明]陈应宾修，闵文振纂：福宁州志十二卷，明嘉靖十七年（1583）刊本。
- 2、[明]林子燮纂修：福宁州志十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本，省图存卷9-10，又有胶卷，另见于《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
- 3、[明]殷之辂修，朱梅纂：福宁州志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本。本馆存卷10-11，另见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 4、[清]李拔纂修：福宁府志四十四卷首一卷，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本，光绪六年重刻本。另见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第74号》。
- 5、[明]闵文振纂修：宁德县志四卷，明嘉靖十七年（1538）刊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1册。
- 6、[明]舒应元修，陈琯纂：宁德县志八卷，明万历十九年（1591）刊本，藏于宁德市蕉城区方志委。
- 7、[清]卢建其修，晋江张君宾、胡家祺纂：宁德县志十卷首一卷，清乾隆四十六（1781）刊本。
- 8、[清]卢建其修，晋江张君宾、胡家祺纂：宁德县志十卷首一卷，清乾隆四十六（1781）刊本，1983年宁德县志编纂办公室据清乾隆四十六（1781）刊本重印本。
- 9、[清]刘家谋纂，鹤场漫志二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刻本。
- 10、[清]谭抡修，王锡龄、高昊纂：福鼎县志八卷，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23号。
- 14、[民国]罗汝泽、刘以臧修，徐友梧纂：霞浦县志四十卷首一卷，民国十四年（1925）修，十八年（1929）福州排印本，另见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102号》。
- 15、[明]陆以载等纂：福安县志九卷，见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
- 17、[清]侯谨度修，福安陈从潮、陈坊纂：福安县志二十六卷首一卷，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刊本。
- 18、[清]刘之蔼修，陈拔、扬世材纂：（续修）福安县志十二卷，清道光十二年

(1832) 刊本。

19、[清]张景祈修,福安黄锦灿纂:福安县志三十八卷首二卷,清光绪十年(1884)刊本。

20、[清]周祖颐编:福安县志乡土志二卷,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京师京华书局排印本。

21、[民国]陈一夔纂:甘棠堡琐志二卷,民国十六年铅印本二册。

22、[明]刘日旸,闽县陈荐夫、林春华等纂,王继祀续修,丁朝立、魏炆等续纂:古田县志十四卷,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增补二十八年(1600)本。

23、[明]杨德周纂修:玉田识略八卷,明崇祯六年(1633年)纂,崇祯间刊本,存卷7-8。

24、[清]辛竟可修,林咸吉、蓝孙璇等纂:古田县志八卷,清乾隆十六年(1751)刊本,另见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区第100号》。

25、[民国]黄澄渊修,余钟英等纂:古田县志三十八卷首一卷,民国三十一年(1942)震文江记印务局排印本。

26、[清]曾光禧纂:古田乡土志略不分卷,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排印本。

27、[清]沈钟纂修:屏南县志八卷,清乾隆五年(1740)刊本,清乾隆十七年(1752)沈宗良增补刊本。

28、[清]梅鼎臣修,陈之驹纂:屏南县志六卷,清道光六年(1826)修,清道光九年(1829)抄本。

29、[清]江若干修,黄学波纂:屏南县志十卷,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抄本。

30、[民国]何树德修,黄恩波、张宗铭纂、陆章铨续纂:《屏南县志》,民国三十年(1941年)稿本。

31、[明]冯梦龙纂修:寿宁待志二卷,明崇祯十年(1637)刊本,另见于《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

32、[明]冯梦龙纂修:寿宁待志二卷,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32、[清]赵廷玠修,柳上芝、范大廷纂:寿宁县志八卷,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刊本,另见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第218号》。

33、[民国]郑谟光修,陈赞勋纂:周墩区志六卷,民国六年(1917)修,二十七年(1938)排印本,另见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23号》。

34、[明]谢肇淛撰:长溪琐语一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福建龚氏大通楼抄

本一册。

35、[明]谢肇淛纂：太姥山志三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修，另见于《国家图书馆藏中华山水志丛刊》，山志卷，第33册。

36、[清]福鼎王孙恭辑：太姥山续志三卷，清光绪江本侃抄本二册。

37、[清]邱古园辑：太姥山指掌一卷，清光绪江本侃抄本一册。

38、[清]福鼎王孙恭原辑，佚名选：太姥山续志艺文选录，传抄本一册。

39、[明]谢肇淛纂：支提寺志六卷，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

40、[明]陈希拯等撰，清释照微增补：支提寺志六卷，清康熙三十三年汪大润等刊本二册。

41、[清]崔嵒修，清释济明增补：支提寺山志六卷，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二册。

42、[清]林树海辑：游太姥山图咏，清道光十三年（1833）同安林树海刊本一册。

43、福安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福安县志》，福建：南海印业有限公司，2003

44、福建省福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安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45、陈赞勋：《周墩区志》，周宁：编者，1987。

二、专著

1、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

2、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

3、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

4、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5、上海古籍书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

6、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7、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8、殷梦霞：《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9、金恩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10、孙学雷：《地方志·书目文献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11、秦其明：《中国新编地方志总目提要》，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12、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黄山书社，1988年。

- 13、清华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78
- 14、王德毅：《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85
- 15、福建省天象资料组：《福建省地方志普查综目》，福建省天象资料组，1977年。
- 16、福建师范大学古籍组：《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1986年。
- 17、方宝川，陈旭东：《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 18、福建省文史研究馆整理：《万历福州府属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 19、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春天出版社，1930年。
- 20、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3年。
- 21、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 22、洪焕椿：《浙江地方志考录》，科学出版社，1957年。
- 23、洪焕椿：《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 24、时晓峰：《山海关历代旧志校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 25、高峰：《陕西方志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
- 26、何金文：《西藏志书述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
- 27、张维：《陇右方志录》，北平大北印书局，1934年。
- 28、林平，张纪亮：《明代方志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 29、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 30、刘尚恒：《安徽方志考略》，编者，1985
- 31、方品光：《福建省九十六种地方志传记艺文志索引》，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2007。
- 32、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历史地图集》，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
- 33、黄苇：《方志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 34、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35、唐唯目：《方志学常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 36、王复兴：《方志学基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8。
- 37、林衍经：《方志史话》，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 38、黄苇：《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 39、曹子西，朱明德：《中国现代方志学》，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
- 40、邱均平：《文献计量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 41、罗式胜：《文献计量学引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 42、柯平：《文献目录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 43、中国地方志协会：《中国方志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 46、来新夏，齐藤博主编：《中日地方志比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 47、沙其敏，钱正：《中国族谱地方志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 48、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49、王晓岩：《分类选注历代名人论方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
- 50、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5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 52、仓修良：《仓修良探方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53、宋天瀚、刘廷祥：《论章学诚的方志理论与「方志学」》，台北县：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
- 54、张天禄：《福州方志史略》，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
- 55、宁德地区社会科学联合会，宁德地区历史教学研究会：《闽东史话》，宁德：编者，1989
- 56、福建省宁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宁德文史资料·第七辑：中国支提山专辑》，宁德：编者，1995。
- 57、福建省宁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宁德文史资料·第九辑：南祭山专辑》，编者。
- 58、宁德县人民政府编：《宁德县地名录》，北京：中国图书馆学会，1981。
- 44、诸葛计、银玉珍编著：《闽国史事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45、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三、期刊论文

- 1、职方氏：《东南方志经眼录》，东南，1943年1月，第1卷第1期。
- 2、薛澄清：《闽南图书经眼录》，中大图书馆周刊，1928年7-10月。

- 3、庄为玠：《泉州方志考》，厦门大学学报，1936年7月，第七册。
- 4、何万年：《漳州府志述略》，漳州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44-47页。
- 5、陈忠纯：《学风转变与地方志的编撰——道光《福建通志》体例纠纷新探》，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74-79页。
- 6、杨文新：《宋代方志〈淳熙三山志〉述评》，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76-80页。
- 7、庄琳芳：《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研究综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6期，第118-121页。
- 8、庄琳芳：《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研究范围、现状及方向简述》，新世纪图书馆，2007年第2期，第58-60页。
- 9、黄秋梨：《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研究范围、现状和未来走向考》，河南图书馆学刊，2007年第1期，第127-130页。
- 10、高金山：《地方志的起源与发展》，新疆地方志，2008年第3期，第3-6、12页。
- 11、衡中青：《中国地方志索引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4期，第120-122页。
- 12、巴兆祥：《明清时期地方志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期，第151-160页。
- 13、冯玉荣：《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2008年第7期，第43-49页。
- 14、王兆辉：《地方志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前沿，2008年第6期，第168-170页。
- 15、梁滨久：《地方志的性质》，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5期，第5、6、45页。
- 16、张廷银：《民间及地方文献的文学史意义——以地方志家谱资料为例》，齐鲁学刊，2008年第2期，第108-113页。
- 17、陈昊琳：《论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志》，云南档案，2007年第7期，第84-86页。
- 18、朱煜峰：《长兴县地方志概述》，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7年第4期，第81-73页。

- 19、王德庆：《论传统地方志中“八景”资料的史料价值——以山西地方志为例》，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0期，第47-52页。
- 20、胡树滨：《浅议地方志与地方史》，黑龙江史志，2007年第5期，第15页。
- 21、范家全：《略论徽州地方志的特色》，沧桑，2007年第3期，第180-181页。
- 22、来新夏：《地方志与文学研究》，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2期，第5-7页。
- 23、张晓梅：《方国瑜对云南古代地方志目录的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16-120页。
- 24、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0期
- 25、王世兰：《浅析地方志资料的社会功能》，广西地方志，2006年第3期，第15-19页。
- 26、吕秀莲：《清代东北地方志对赫哲族历史的研究价值》，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91-92页。
- 27、张颖：《略谈地方志在岭南文献辑佚工作中的作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4期，第114-115页。
- 28、孙文飏：《略论地方志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江苏地方志，2006年第2期，第14-16页。
- 29、林衍经：《地方志旅游资料的价值及其利用》，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期，第29-31页。
- 30、罗志欢：《地方志修纂对整理传播文献的作用——以岭南地区为例》，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期，第42-45页。
- 31、石玫：《西北地方志善本古籍叙录》，图书与情报，2005年第5期，第42-43页。
- 32、隆清华：《湖南省地方志利用概况》，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3期，第36-38页。
- 33、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1期，第5-8页。
- 34、王迎喜：《明清时期安阳地方志的编修》，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130-133页。
- 35、勾学海：《东北地方志(1949年前旧志)收藏状况调查与校核目录》，图书馆

学研究, 2004 年第 8 期, 第 80-90、74 页。

36、陈蕴茜:《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 江海学刊, 2004 年第 4 期, 第 135-140 页。

37、巴兆祥:《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 中国地方志, 2004 年第 4 期, 第 45-51 页。

38、巴兆祥:《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宁夏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3 期, 第 67-73 页。

39、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4 年第 1 期, 第 138-158 页。

40、李文田:《论地方志的特性及社会价值》,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1 期, 第 46-47 页。

41、张莹:《地方志与地方文化建设》, 中国地方志, 2004 年第 2 期, 第 10-11 页。

42、张英聘:《日本现存中国大陆缺、残明代地方志考录》,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1 期, 第 87-91 页。

43、张岚:《方志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5 期, 第 71-73 页。

44、马晴云:《地方志及黑龙江地区地方志概述》, 图书馆建设, 2002 年第 2 期, 第 37-38 页。

45、李淑文:《中国古代地方志的著录》, 图书与情报, 2002 年第 3 期, 第 70-71 页。

46、王卫平:《日本地方史志的源流》, 中国地方志, 2001 年 Z1, 第 141-145 页。

47、孙天胜:《地方志的乡土教育功能》, 中国地方志, 2001 年第 6 期, 第 53-55 页。

48、林衍经:《再论地方志的兴利功能》, 中国地方志, 2001 年第 6 期, 第 49-52 页。

49、武星斗:《新疆地方志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疆地方志, 2001 年第 3 期, 第 3-7 页。

50、张弘:《谈明代运河区域地方志的纂修》,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2 期, 第 50-51 页。

- 51、任小燕：《山西古今方志纂修与研究述略》，晋阳学刊，2001年第5期，第82-89页。
- 52、张雪梅：《重庆市地方志纂修的源流、现状及问题》，重庆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76-77页。
- 53、林德忠：《略论地域文化和地方志》，保山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第73-74页。
- 54、邹华享：《湖南方志通论》，图书馆，2001年第2期，第11-17页。
- 55、邹华享：《湖南方志通论(续)》，图书馆，2001年第3期，第21-31页。
- 56、朱冠艾：《明代安徽地方志编写的热潮和成就》，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55-94页。
- 57、胡巧利：《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兼与“官修性”说商榷》，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1期，第16-21页。
- 58、王希龙：《官修地方志制度的形成及盛衰》，文史杂志，2001年第5期，第62-63页。
- 59、黄桂枢：《思普区明清以来地方志修纂史考说》，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第55—60页。
- 60、马建和：《广东旧方志研究——兼评本届修志组织形式》，广东史志，2000年第2期，第14-25页。
- 61、宋永平：《民国时期云南怒江地区的三部方志》，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67-71页。
- 62、刘世锋：《浅谈地方志的价值与作用》，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4期，第11-13页。
- 63、李文静：《浅谈地方志的价值与作用》，现代情报，1999年第3期。
- 64、杨宪光：《山西地方志及其珍贵价值》，三晋测绘，1999年第3期，第20-23页。
- 65、胡政平：《简论中国古今方志与编修》，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131-136页。
- 66、刘云军：《20世纪宋代方志研究、出版综述》，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第41-47页。
- 67、米彦军：《日本藏中国方志及研究综述》，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7期，第

56-61 页。

68、江凌：《试论明清方志的特点及其国土学价值》，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第 55-58 页。

69、李志：《冯梦龙和〈寿宁待志〉》，福建乡土，2003 年第 3 期，第 38-39 页。

70、何万年：《漳州府志述略》，漳州职业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第 45-47 页。

71、陈忠纯：《学风转变与地方志的编撰——道光《福建通志》体例纠纷新探》，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第 74-79 页。

72、杨文新：《宋代方志〈淳熙三山志〉述评》，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76-80 页。